

刊首语 | 2

年度特稿 | 3

大学怎样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 3

北大2016 | 16

李克强总理回母校视察 16

北大迎来新书记 17

北京大学改革“瞄准”四大差距 18

中国女排进北大，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20

董强教授当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 22

谢晓亮当选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22

曹文轩教授获国际安徒生奖 23

李零俞孔坚教授获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3

张平文、郑晓瑛教授新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4

周德敏、张礼和课题组在病毒疫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5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 26

北大举办2018珠峰攀登活动启动仪式 26

北大被授予“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27

北大新增2个ESI前1%学科 总数达21个 27

北大两项成果入选2016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

科技进展” 28

北大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落成启用 28

北大，118周岁生日快乐！ 29

大师学者 | 32

林毅夫VS张维迎：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 32

对“维迎战毅夫”的麻辣点评 39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43

厉以宁：回忆周炳琳老师 46

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 50

毕业 | 53

北大，我行走一生的徽记 53

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 55

那些年，青春正好 58

挥手告别之前，赴一场青春盛宴 59



北大的核心使命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培养人，我们认为要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另一条，是希望在北大能够产生新的思想，前沿的科学和未来的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使命。

校友风采 | 60

屠呦呦捐赠百万元设立北大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60

马宗明汪璐两校友荣获2016年斯隆奖 61

梁晓晖校友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称号 61

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62

北大走出的电影追梦人 67

“天上军营”里的北大国防生 70

呼唤郭川，致敬英雄 73

创业说 | 76

既然选择了前方，必定风雨兼程 76

留洋博士养牛记 79

学子回乡，复活古村古宅灵魂之美 82

戴威：共享精神成就ofo共享单车 85

博雅情怀 | 88

少年爱乐在北大 88

北大，带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91

1986年那场青春，永不散场 94

洛兵：吟游歌手的“北大情结” 96

沙滩红楼 | 97

新青年：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 97

严复与北京大学 101

陈平原：西南联大之精神 103

燕园风物 | 106

北大图书馆——读书，也读你 106

见证燕园初建时 107

读书 | 110

买书这“病”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110

如何培养读书习惯：多读熟读细读 111

怎样让人生的幸福感最大化？ 113

120校庆征集 | 116

捐赠|钱伟长：《忆龙翔教授》 116

口述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119

老照片|80年代国家男排女排进北大 122

北大120周年校庆系列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121

聚焦校友会 | 123

北大校友会第八届第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京举行 123

“北大校友企业服务联盟”正式启动 124

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在深圳举行 124

第七届北美校友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 125

亦庄健康产业大会2016在京召开 126

第六届校友企业招聘会暨创新创业校友分享会举行 127

老校友新春联谊会 127

2017校友新年音乐会圆满举行 128

2016年北京大学校友会备案组织达114个 129

回馈母校 | 130

我给母校发红包，北大明天更美好 130

校友捐赠名单 131

公告栏 | 136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校友会

顾问（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文申 迟惠生 丁石孙 海 闻 郝 斌 郝 平

柯 杨 李安模 林建华 罗豪才 闵维方 王德炳

王恩哥 吴树青 吴志攀 许智宏 周其凤 朱善璐

编委（按姓名拼音排序）

邓 娅 高 超 王丽梅 王 宇 肖 渊 张向英

主 编 李宇宁

责任编辑 刘学红 韩 雪

编辑（按姓名拼音排序）

白 帆 黄 赟 贾玆扬 李存峰 李 森 乔淑芝 沈 娟

王 恒 王 玮 袁 远 张 莹 赵 琥 周建涛

发 行 赵 琥

美 编 梁秋实 张雅文 于小凯

商务运营 北京大学校友会合作与运营中心

运营总监 王 健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地 址 北京大学43号楼225室

邮 编 100871

电 话 010-62758419

传 真 010-62763363

投稿邮箱 bdr@pku.org.cn

网 址 http://www.pku.org.cn

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赐稿。来稿形式不拘，记叙、回忆、纪念、传记、专题采访、通信报道、散文、诗词、照片等均欢迎，只要和母校、校友活动、校友生活等有关。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校友事迹的文章，亦希望您能向我们推荐（所投稿件希望能附上相关照片，纸质版照片使用完毕我们会尽快返还）。

更 新

如您的个人信息（单位、职务、电话、邮箱、地址等）有变更，请及时告诉我们，请发邮件至pkuaa@pku.edu.cn或致电010-62750363 010-62758419，传真010-62763363。

（封面题字：季羡林）

为提高办刊水准，扩大发行量，我们欢迎校友赞助赠阅《北大人》。捐赠100元，获赠四年《北大人》年刊；捐赠1000元，终身获赠《北大人》刊物。赞助者名单将在《北大人》及北京大学校友网上刊登。汇款时请在附言中注明“赞助赠阅《北大人》”。

国内账号

户名：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人民币账号：0200004509014477781

人民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营业室
（可缩写为：工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网上捐赠：http://www.pku.org.cn/dingdan/donate.jsp

► 刊首语



《北大人》2016年刊组稿之际，正值蔡元培先生接掌北大校长100周年。这几天，微信朋友圈被纪念蔡校长的文章刷屏了，其中有两篇令我印象深刻，一篇题为《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文章回顾了元培先生对北大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作者还用一小段生动的文字重现了当年蔡校长履新北大的一个细节：1917年1月4日，蔡校长到任，跳下马车之后向迎接他的北大校工们脱帽鞠躬。文章说“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另一篇纪念文章同样在校友中广为流传，文章出自一位80后的北大青年教师之手，题目是《世间再无蔡元培？北大处处可见君》。从标题上看，似乎是对前一篇文章的回应，内容则是讲今天的北大，无论从办学理念、学术活动、校园文化、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对元培先生“抱定宗旨”的坚守。这是一篇原创文章，据说是夜半突发灵感，一蹴而就。文章的作者既非身居高位的学校领导，亦非挥斥方遒的学术精英，而只是一位和我一样普普通通的北大“校工”。这“普通”却恰恰反衬出一种可贵。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新一代的北大人仍然有这份北大情怀、有这样的北大坚守！当年，元培先生曾有一言嘱蒋梦麟校长，曰“自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千年尚早，百年已过，先生之言并未落空，若蔡校长泉下有知，他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2017年的师生新年晚会上，林建华校长以“改变中的成长”为题发表了新年演说。改变与坚守是这所119岁的大学所每天要面对的课题。2016年，北大发生了很多改变。新的本科生教学计划开始实施，从此学生可以在学部范围内自由转专业、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新的《教师手册》颁布施行，明确了教师职责和职业操守；学校加强了学部职能，建立了跨学科委员会，让学者主导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根据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数据库，北大在全球综合性大学排名中位列第11位，学术影响力可见一斑；28、32和35号学生宿舍楼改造工程竣工，至此，校园内的全部学生宿舍楼都改造一新，而大澡堂也终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如此种种，北大每时每刻都在一点一滴地进步。

北大有所改变，更有所执着。被称为“世纪之辩”的

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思辨会，通过网络直播，引得万众瞩目，这种“现象级”的学术事件已经有多多年没有见到了。马浩教授在他的“麻辣点评”中说，仿佛回到80年代在办公楼听厉以宁先生讲课，余颇有同感。这再一次印证了北大仍然是也将永远是那个自由的学术殿堂，师者如此，学生亦如此。校园自媒体“北大青年”一言不合就打开“天窗”，不平则鸣。今天的北大学生仍然个性鲜明，人格独立，自由表达。2016年，北大备受世人关注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仍是一次对元培先生“抱定宗旨”的回应。遥想当年，蔡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开篇即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非官员养成之所。100年过去了，北大人并没有因为“走的太远，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

时间从未停止，改变时时发生，而这些改变的背后却隐藏着坚守的执着。2016年是1952级本科学长毕业60周年，1973级毕业40周年，1986级入学30周年，也是我所在的1991级毕业20周年。各个年级的北大校友相约回到母校，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逝去的大学时光。耄耋老者执手相见，用当年的方式互致问候，共同回忆那些流传至今的校园故事。说到校园故事，我想起了陈平原老师的一段话，大意是校园流传的关于师生的故事，虽非学校的正史，却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的最好体现。本期《北大人》转载了吴志攀老师纪念汤一介先生的文章，文章追忆了两位学者多年交往的点滴故事，读来令人动容。在完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永恒的沉重的努力”之后，李佩先生终于可以休息了，这朵“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将永远盛开在她的学生们的心中。“没有远方、只有故乡”的郭川船长还未归航，也许他这一次离家的时间要比上次环球航行的138天还要更长，愿他这次远行最终能找到那个他所执着向往的、真正自由的、永远光明蔚蓝的心灵的故乡。

最后，新年伊始，谨代表《北大人》编辑部祝愿我们伟大的母校在新的一年里抱定“守正创新”之宗旨，既然接受改变，又泰然坚守执着！

李新

年度
特稿

大学怎样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

——北京大学深圳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发言荟萃

2016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建院15周年之际，由该院主办的“北大@深圳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十多所海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研究者与深圳市高等教育决策者，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路径以及如何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本文撷取了部分嘉宾的精彩发言和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北大的目标是要培养引领未来的人

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



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在深圳研究生院举办的论坛。我主要讲一下北大这段时间发展的概况和我的一点想法。

中国大学20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时间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我想先来分享一下中国大学的过去和未来。

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发展的过程分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2000年或者1998年到今天这样几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80年代，当时经济发展并不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还比较穷。但因为改革开放，大家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科学的春天”，大家都很兴奋。

9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困难的时期，市场经济对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冲击，大家都在经商。我是1993年回到国内的，当时想买一个简单的饭桌，看广告上说清华大学卖餐桌。这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例子，当时北大化学系做的公司是做汽车的防冻液。我后来工作过的重庆大学，他们有一个发明专利，是火锅底料。当时整个市场经济对学术、对老师的冲击是非

常大的。当时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出租汽车司机的一半左右。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状况可想而知。

从北大100周年校庆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当时乃至在整个过程中都能体会到的。首先学校的数目有了很大的变化，北京大学的排名也非常不错，北大的科研经费和发表的论文都有了明显的增长。

这里有一个规律，过去20年里，北大的科研经费、发表的论文，大概增长了10倍，国家总体的科研投入也增加了10倍。可以看出学校整个的活力是非常强的，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一直在问自己，中国的高等教育真像这些数字所显示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社会公众、老百姓对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学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想至少我们的教育质量或者教育，并不像科研那样改变得那么显著。比如说我们的教育仍然是以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模式进行的，学生的好奇心、创造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有，我们现在非常

担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未来中国的责任。

在过去大概20年时间里，中国出国留学学习的学生人数也是增长了10倍左右。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出国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国内读了本科之后出去读研究生，后来才有些学生出去读本科。现在看到很多家长都开始把初中

学生送出去了，每年出国学习的人数接近50万人。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很多家庭现在比过去更有钱了，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另一方面是我们要深思的，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不是能够满足学生的多样化要求。中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种新的要求，我们应该去为学生多样化的要求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一方面的确是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又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的高等教育对现在的学生需求、社会需求还是存在差距的。如果面对未来，这个差距就会更大。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上，既要把过去的事情解决好，同时要面对未来全球化的挑战。现在不光是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趋势也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需要面对现在的知识、信息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对整个社会、对全球的冲击。这些问题是我们将来的教育都要考虑的。



图为北大 @ 深圳国际高等教育论坛现场

如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我发言的第二点，是要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这里主要谈北大，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衡量它？首先，作为一所学校，它的根本使命是要推动国家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常说要成为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可以说有一定的标准，但是什么是中国特色可能是我们学校要认真考虑的。一方面中国特色可以说我们要立足中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北大当然是在中国，我们研究的问题更多的是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吗？哈佛大学是在美国，它解决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特色了吗？可能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还是要有更进一步的探讨。

环顾世界上的大学，不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虽然我们在东方，但是我们的文化基础、科学基础，还是西方的文化基础，因为现代大学都是从西方起源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建立一所在东方文化基础上具有世界水准的大学？这个答案是未知的。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或者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在100年前就中断了，现在完全用的是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模式。这是对于我们在全球也好，东方也好，提出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东方文化的传承和在东方文化基础上的教育，这可能是一所大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含义。这个特色不仅是它的地点，不仅是它解决的问题，而是它在文化上的

一个特色。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共同去探讨。

另外，如何评价大学？你要想真正知道一所大学的好坏，最简单的办法是进入到这所大学当中，跟老师、学生谈，看看他们怎么想问题，在想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判断这所大学是一个优秀的大学还是一个一般的大学。真正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大学，还是要摒弃数字思维的方式。

任何一个大学的发展，都要和它的环境相互作用。一个学校在社会里，我们要把与它利益相关的层面都分析清楚。比如北京大学在中国，它和它相互作用的利益群体，有党和政府，社会公众，大学自身。这些利益群体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社会公众最大的诉求，是要提供好的教育，要促进社会公平；对大学来讲，是要追求卓越，有很好的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党和政府首先希望高等教育能够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学术和人才的支撑，同时也会要求大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所有要求都是合理的，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提出的要求，最后要形成一个好的大学发展的氛围，必须是各种要求的平衡。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在任何国家都是大致相同的。

刚才讲的是大学和外部的关系，大学内部



图为参加“国际合作办学的苦乐年华”分论坛的嘉宾在发言

也要按照一个大学内部的逻辑来运作。我们要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提升的是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这些影响力的构成是在思想上、科学技术上、经济上对社会的贡献。过去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争议，特别是我刚才讲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大学过去的发展，花了很多时间关注学术，关注学术研究。一方面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这对大学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质疑自己，我们的老百姓、学生是不是对教育满意了。从大学的角度来说，学生的满意与否，还有教育水准如何，不仅是要满足社会需求的事情，而是大学自身发展或者自身声誉提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所大学做学术研究，同时去培养人，如果我们培养的人都能够成为优秀的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一批人，就会成千上万倍扩大一所学校的影响。你自己的科研做得再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不成器，这个学校是不可能成为世界水准的学校的。换句话说，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来讲，人才培养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使命。任何一个学校，如果人培养不好，这个学校是不可能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

目标是要培养引领未来的人

真正把人才培养好，把队伍建设好，把教学改革做好，学术体系调整好，体制机制做好，是中国的校长最花时间、最头疼的事情。在这里我主要讲一下下面这些工作。

最近两三年时间里，北大在综合改革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教育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学术体系调整、学校治理体系调整、资源配置调整等。中国大学的制度体系到今天为止并不是很完善的，不完善的地方就需要改革或者是调整、改善。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学制度上的变化在全球的大学里应该是变得最多的。

我简单讲几个例子，比如人才培养。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所以

把整个课程体系做了调整。课程体系的调整是要建立一个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为通识教育树立的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找到他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挖掘出自己的潜力，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要懂得中国也要懂得世界。对于专业教育，是希望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专业教育体系。将来北大的专业教育并不是只有数理化天地生或者文史哲这样的专业，有更多学生自己选择甚至自己设计的专业，让他们更好的发展。这样做的中心目的是要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更有动力去学习。

在专业教育方面，对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在全校范围内实行自行选课，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双学位和优等生学位都在推进。本科教育一定要改变现在普遍存在的以知识传授、课堂讲授为主的教育模式。这是必须要改变的，必须让学生有参与感，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更加主动的学习。要能够激励学生，让学生得到更多的乐趣。这是本科教育改革的总体方针。

另外，我们也在推动学校学科结构的调整。大概30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北京大学相当于现在一个文理学院，主要是文科和理科。现在北大完全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综合型的大学。这些年新成立的学院很多，比如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等都建立起来了，还有工学院、医学院。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在这样一个综合型学校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建立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北大已有十几个像纳米中心、理论生物学中心、分子医学中心、数学研究中心这样的研究机构。最近我们推进的是院系调整，还有人文社会科学院，特别是推进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北大下一步学科调整重点要放在学院层面。

北大的核心使命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培养人，我们认为要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另

一条，是希望在北大能够产生新的思想，前沿的科学和未来的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使命。另外，还有服务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的外延性的任务。我们对外延任务的定位，是希望学校能够聚集社会资源，服务学校的核心使命。同时，把在学校产生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推进到社会当中，推动社会发展。学校自己的资源一定要集中在学校的核心使命上，外延

的任务主要通过聚集社会资源来完成。

面向未来的中国大学，首先要能够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同时，我们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学术和人才支撑，要努力培养扎根于中国，有中国文化根基，同时又有全球视野的一代人，能够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挑战。这是北京大学将来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

从多样化校园到融合性校园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 杰弗里·雷蒙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参加这一次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同时，借此机会我们集聚一起庆祝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成立15周年。

15年过去了，我们回顾过去可以非常自豪，因为我们看到成千上万名从这里走出去的毕业生们，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栋梁，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们今天集聚在这里，任务之一就是要回顾过去并且为未来的发展做计划。北京大学需要继续发展，就需要北大深圳校区，中国也需要北大深圳校区。所以我们未来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个校区怎样能够继续它的发展。我们要依靠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才能够持续

的去开放，去改革。

我建议这一个校区应该成为一个典范，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模型，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进行不同国别间文化差异的弥合。我在美国、法国、中国办学的经验当中，一直重复强调我们需要不停的去学习，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和事实，不仅仅是探索世界的一些理论，还需要一些能够更精确的解决世

界问题的技巧，以及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世界的

能力。在北大国际法学院，这些学生也在学习成为跨国界的律师，他们学习从外界来理解中国的事务，而不仅仅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法律诉讼。人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而在这里不是说一个角度是对的，另外一个角度是错的，或者说一个角度更好，另外一个角度不够好。而是当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一个问题的时候，立场会不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利益，这是当然的。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某一个人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另外一个人

也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是采取不同角度的原因还不仅仅是这个自我的利益。这不仅仅是说人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欲望，同时还因为我们会通过借鉴不同历史的经验，包括个人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来看待同一件事情。

我们是通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理解现实的，而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却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有不同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们才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每一个文化都会有一个独特的参与世界的方法。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共性的，那就是人性。人性是共同的。在这里人性包括一些诚实、信任、爱等天然的优势。但是同时，不同的文化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心理学家里斯本曾经发现在西方长大的人，他们的关注点和在中国长大的人的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同时快速的看一个图画的时候，我们所记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记住的都是那个图画里面与自己的文化相关的部分。

几个月前我看到一本新的书，这位作者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小说家，他是在美国长大，但是他父母来自于中国，所以这让他能够深刻的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他这本新书叫做《拿行李的小女孩》，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讲到西方的文化怎么样教育我们有自我的意识，有边界感，而东方文化教育起来的自我意识，

则是边界不清的。事实上，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文化，给我们一个启迪，就是独立和依赖，这两种状态怎么进行一个结合，或者叫做模糊边际。

在一个人的想法当中，同时包含有两个自我，这两个自我一个在说这个是对的，另外一个说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人不需要选择一个坚定的立场，你可以是摇摆的，可以满足自己不同类型的需求，同时能够意识到其中的边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就是要利用东西双方的优点，用东西方文化的能量让学生建立起这样一个模糊边界。我相信这是我们使命的一个核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非常渴望得到这样模糊边界的人。

这个世界希望建立起桥梁，互相理解，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是在过去。而现在全球的人民都希望建立起更多的墙而不是桥梁，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自己的国家之上，而不是放在那些看起来奇怪的外部文化当中。这个新世界不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而是一个充满恐惧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信任感会大幅上升，并且会有大量的理解错误。你如果理解我，你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的乐观告诉我，我们的世界能够避免这样一个后果。这个世界当中的人是能够避免互不信任的情况，而成为一个拥有模糊边界的人。这些拥有模糊边界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学院所需要进行培育的人。

要培育出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这里建立一个多样性的校园，多样性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是要帮助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在同样一个环境中学习，这是不够的。我们评估的标准不应该只是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来自于国外。除了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要有融合性。来自于不同文化的学生，不仅仅是要

坐在一起学习，而是要相互携手，要主动和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深交，并且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复杂度和美丽，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处和不同之处。

我们的评估不仅仅是这个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个学生在日常学习当中所获得的不同的文化体验。这里的体验包括不同文化的相似处和不同之处。在学习的几年中，这些学生将会理解到自己文化当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且理解这些文化的不同之处是怎么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问题和一些冲突，能够让学生一起找出方法，解决这样的可能存在的误解和冲突。这个学校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我认为是可以的。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是能够建立

起拥有模糊边界文化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北大需要这样一个融合性的校园，我们需要的校园不仅仅是过去15年所获得的成就，而是要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跨越。中国也需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来让中国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我们的世界也需要这样一个融合性的校园，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享受到科学带来的繁荣。

演讲者简介

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法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前任校长，中美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怎样让学生想做、能做、做得更好？

法国里昂商学院副院长 王威廉（William Wang）



我想跟各位来分享里昂商学院在创新方面的三个理念。我讲三点，第一点，解决原动力的问题；第二点，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第三点，社会责任的问题。

第一点，原动力的问题。无论是国际的学生，包括中国的学生，当他迈入大学的时候，

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何要读书？据一些报道，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辛辛苦苦进入高校之后并不想学习。这个原动力的问题怎样解决？里昂商学院的文化基因就是企业家精神。当我们面对更为不确定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更鲜明的提出了创客精神。未来的世界变得

越来越不确定，所以我们要要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所谓的风险。这种创客精神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精神的原动力又来自于什么地方，由什么来驱动？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老板，但是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你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是你的资



▲ 图为参加“健康中国 2030”分论坛的嘉宾在发言

产，可以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当原动力问题得到解决，学生就会有激情探索他所喜欢的知识领域。

第二点，未来公司的组织架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有可能你上午在一家公司做这份工作，下午就成为另外一家公司的咨询顾问。当这个组织发生高度变化的时候，对于未来的人才，什么是核心竞争力？今天的核心竞争力是以学科为代表的，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等。这是核心竞争力最为内核的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延部分，就是软实力部分。比如项目的管理、人际的交流和沟通、最基本的财务观点 and 理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重新思考跨越传统学科领域限制的混合式教育的做法，就是跨学科的学科体系打造，这个未来帮助学

怎样让学生有创新力

IMD 南亚及大洋洲区域主任 聂冬 (Winter Nie)



怎样让学生有创新力，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其次是内容，第三个是方法论。

第一个，环境背景。所有人包括我们自

生打造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2016年我认为会被载入世界史册，因为这一年是黑天鹅满天飞的一年。英国的脱欧、意大利的问题、美国新任的总统，我们可以感到全球有一股民粹主义的思潮在显现，还有反全球化的现象。我认为，我们依然没有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的智慧，东方的文化，能否为全球贡献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于东方的文化、智慧，是否和西方的管理做一个结合，来共同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里昂商学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怎么帮助学生想做；二是怎样帮助学生能做；三是怎样帮助学生做得更好，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己，我们坐在这个教室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比普通人更有创造性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思想比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要开放一些。但事实上你在这个盒子里面的时候很难跳出盒子来思考，很难意识到实际情况是怎样的。首先重要的是环境，让环境把这个人从舒适区拉出来，如果你在舒适区，就会自动以这个平常的想法思考。我们的环境就是在开始任何一个类型项目之前都有一个

申请项目。让企业高管去印度、巴西、中国、硅谷，让他们看到不同的企业，看到初创企业，看到金字塔底端。给他们看到这个环境，让他们能够打开思维再去到教室。

第二个，让人们在内容方面比较有创新性。内容依赖于你的行业和企业。这里面会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案例，这些案例不仅仅是成功的案例，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一些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我们从失败案例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比成功案例更有效。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仅仅是跨国企业的案例。到中国、印度和非洲，会收集一些这里成功的案

例。说到创新要想得比较大一点。对于金字塔底层的创新，也是一个创新，这就是内容的创新。

第三个，怎样让人们创新？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法论，是基于硅谷的设计。这个方法论的重点是快速打样快速试错，会在教室里进行反复的训练。

我认为，这三个方法就是让学生能够比较有创意的教育方法。

引领未来的人需要有领导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陈春花



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最重要的方向上。一个是他对于组织的高效运营起着绝对的作用。我们在做领导力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当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的时候，跟这个组织没有太大的关系，跟他的直接领导者却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很简单地说，是不是组织的吸引力不够，

我想从培养企业领导者的角度来谈教育跟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今天对于企业的领导者来讲，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面对未来。我们所有的经验可能在今天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怎样能够面对未来反而变成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或者训练。

1987年《时代周刊》封面问“谁在掌管美国？”答案很直接，说这个国家需要卓越的领导者，却没有人能够担当大任。很早以前人们就非常渴望卓越的领导者，而且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卓越的领导者非常少。为什么人们会对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很大原因是因为领导者

使得这个优秀的人离开？不是，是因为他的直接上司让他离开这个组织，这个因素占了超过70%的比例。这等于说，领导者对于组织的效率运行影响是非常直接和具体的。

我们说领导者重要，因为他对方向指引、鼓舞人心和重振希望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今天一切在变、在混沌、在撕裂或者在不可确定的时候，你能不能让人家坚定信心充满希望，这是领导者能做的事情。领导者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可以摆脱危机。

我个人有一个研究，研究中国5家领先企业到今天已持续超过20年，我自己的研究设计是

做30年。我在1992年决定研究这5个企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5家企业是不是一直活着。所以我第一个10年报告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这个研究为什么老研究比较大的企业？我自己就笑了，我说我不是偏爱大企业，是因为大企业死起来没那么快。我的书出来的时候，它还活着，书就有用。我运气比较好，1992-2002这10年间这5家企业都保持非常好的增长。2002-2012这10年间这5家企业中间出现波动，我现在在等2012-2022这5家企业的情况。我现在介绍的是在2002-2012这10年间这5家企业做的一些事情。

海尔，中国最大的一家家用电器公司。这家公司在这10年当中做了巨大转型。我非常佩服张瑞敏这个企业家，他做了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是把一家6万人的公司改成3个人一组的，有两万个组织单元的公司。一个领导者管两万个组织单元还能让它高效运转，这就是海尔做的事情。使得它今天有应对市场的应变能力。

第二家是华为，华为这个企业今天在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华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一直会有一个不断的自我批判的过程。用华为的语言讲，它没有成功只有成长。这是任正非推动这个企业进步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第三家是TCL。这家企业在研究的第二个10当中遇到巨大亏损，2006年的亏损超过20亿，非常紧张。但是这个企业比较好的的是在最低谷反弹回来，做了一次自我否定，这个否定使得它非常成功。这是李东升作为领导者所做的努力。

第四家企业是联想，也是中国企业当中很优秀的企业。它的方法是不断向世界学习，不断超越自己，不断跟别人竞争。

我当时选择5家企业的时候，会选民营企业、国营企业、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有一家国营企业叫宝钢，它第二个10年也遭遇了调整，就是更换领导人，也走出了一条他们自己的路。

这5家企业很稳定的持续走了20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他们的领导者有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让他能够走20年最根本的原因，我给了一个词叫做“英雄领袖”。英雄领袖意味着在做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情是真的对行业进步、社会进步、市场进步做出贡献，不是伤害市场、行业，不是只求得自己企业的增长和利润。第二件事情，他们会培养人。5家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培养投入非常大，当这些企业能够花费这么大努力做人的培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企业是能够持续领先的。

我之所以认为这些企业非常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责任感的认识、使命感的认识非常明确。这5家企业都有清晰的理念、使命、责任。这就使得这5家企业在过去20年当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第一个10年，他们做规模就可以了；第二个10年，经历了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全球经济变化的调整，一个是技术变化推动的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能保持领先，他们的领导者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在研究中，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很多人认为领导力或者领导者有天生因素，但我发现不是。我看到领导力不是天生的，是自我造就的。中国有一个人很出名，叫褚时健，80岁创业依然可以成功，让我们很震惊。另外一个人是日本的稻盛和夫。这些人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创造力、影响力？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定力。

今年是我从教30周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大学的意义》。我写这本书是要让每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的时候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聊天说，你应该创办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并介绍他上一门课有500万人在听。他说当你在线上上课的时候就把围墙拿掉了，你们传统的大学就要被淘汰了。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在线上上完课和在北大校园走过，两个人长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我承认线上

可以传递知识，但是教育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教育还有更多的东西是要内嵌下来，内嵌下来需要一些互动，需要一些氛围，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沉淀。

我之所以认为大学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是我认为在大学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第一点，相信的力量。今天教育上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让我们质疑比较多，相信比较少。当你没有相信的力量时，是不太能够做成事情的，而大学恰恰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一点。

第二点，让你可以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我喜欢北京大学，是因为这个人，他是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叫陈生，他现在卖猪肉，叫一号土猪，在全中国卖得最好。后来我一看他是北大毕业的，就觉得北大很好，竟然培养出学生卖猪肉也卖得这么好。好大学的心性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让大学生胜任任何学科和任何职业。

第三点，让我们可以思辨。不仅仅发现问题，一定要去求证。大学最好的地方是具有想象力。我一直很喜欢保留教师身份的原因是因为当我在商业里面混沌、迷糊或者看到很多人很功利，想不到新东西就回校园走走，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好的想象力。

很多人问我对2017年怎么看。我说我不

看，你创造属于你的，就是2017年。今天创造未来一定比预测未来更重要，而这个创造能力在大学是可以给予我们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大学里得到，就是爱。要懂得爱，有同理心，慈悲和怜悯以及对宇宙和自然的关怀。懂得爱，你就会变得非常好。

学会独处，这个非常关键。我一直跟学生讲，大学四年不要太忙，安静的待四年，尽可能把各个角落都看够，一个人多走一走，这个最重要。只有足够的静才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动。越静的时候就是越动。这也是我觉得大学能给的东西。

大学教育对领导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四个功能上。让人有洞见；让人驾驭变化；让人真正理解、交流、沟通；具有更强的定力。

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有四个关键词要很认真的对待：技术、数据、创造和智慧。必须调整自己的认知，调整创造和调整智慧。直面未来，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相信答案应该是回到学习当中来。我去埃及别人问我你最想看什么，我说我最想看的不是埃及金字塔而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是人类第一个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影响了支持了地中海人民200年至800年的发展历史，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期待创新的基因

北大深研院院长 吴云东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已静静走过15年，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零开始的北大深研院，与鹏城深圳一样，期待着创新的基因。

2001年北京大学与深圳市签约共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02年第一批全日制研究生入学，至今培养了7400多名毕业生。目前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有8个学院，在校研究生近3000人，198名全职教师中外籍教师占30%以上。

2016年8月北京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举办北京大学深圳校区的合作备忘录，决定在现有的深圳研究生院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本科学院和一个医学院，这标志着北京大学在深圳的办学将迈向更高的台阶。

北大深圳校区的本科学院是一个小而精的文理学院，致力于探索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与模式，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领袖。医学院将致力培养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医生，发展成为引领中国比肩世界的国际一流医学中心。

然而，我们在这些办学方面，经验不多，



需要认真学习。在原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现上海纽约大学执行校长杰弗里·雷蒙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一个5人国际顾问小组。其成员都是具有丰富的国际化办学经验的著名学者，他们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导。趁着深研院庆祝15周年的机会组织这次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探讨世界一体化背景下、如何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全新视角出发，融合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积淀与深圳市的城市特征，探索出一条协作创新共赢的国际化办学之路。

守正创新 引领未来

北京大学副校长 高松

今天我们相聚在北大深研院，要感谢深圳市人民和深圳市领导对北大的信任。因为深研院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北大的深圳校区将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全新视角，将北大深厚的科学人文积淀与深圳的创新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新的人才培养之路。深圳校区

的本科教育将秉承小而精的原则，站在东西方文化之巅，融汇东西方文化智慧，充分激发学生的动力与创造潜力。

北大在深圳的拓展，特别是新的本科和医学教育，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是北大发展史上一项非常重大的决策，也代表



了北京大学对于国家和人民一项重大承诺和勇敢的担当。年轻的深圳校区将继承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进步不断探索，并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大学正集体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国家，社会，人民需要更好的教育质量，还需要更好的教育公平，需要更多的精英人才供给，也需要全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前瞻性的思考与研究，还需要经典的传承与发展。有人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给民众带来诸多困惑，社会财富不均衡正在加剧，老龄化社会与年轻

得更加关键起来。

约翰·杜威曾经把北大与其他世界名校进行比较，他说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今天或许还不能完全清晰的定义教育的变和不变应该以何为分界点、但我们坚信爱与责任是教育的永恒出发点。北大从来都是新思想，前沿科学与未来技术的摇篮，北大人要“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背景链接

北京大学与深圳市签约共建北大深圳校区

2016年8月29日上午，北京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合作举办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备忘录签字仪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深圳市市长许勤，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常务副校长柯杨、副校长高松、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海闻，北大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吴云东等出席

签约仪式。

根据备忘录的内容，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将在现有深圳研究生院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本科生学院和医学院；本科学院是一个小而精的文理学院，致力于探索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与模式，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领袖；医学院将致力培养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医生，发展成为引领中国比肩世界的国际一流医学中心。

李克强总理回母校视察



4月15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母校北京大学考察工作。

时值暮春，暖意融融，总理的考察之行从未名湖畔拉开了序幕。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的陪同下，李克强首先经未名湖北岸来到国家发展研究院，了解了北京大学智库建设成果以及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发展概况。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向总理详细介绍了学院动态，林毅夫等14位国家发展研究院著名学者与总理进行交流。

随后，李克强总理来到自己硕士、博士期间就读的经济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和党委书记章政陪同。1988年至1994年，李克强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学习，师从萧灼基、吴树青教授，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在经济学院，总理倾听了学院发展情况，观看了短片《北大学术故事》。吴志攀常务副校长向总理介绍北大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概况和

成果。随后，李克强向学院的老先生们送去了问候，并与经院学子们握手交谈。

从经济学院出来，途经山鹰社攀岩中心，总理同山鹰社同学交流，并应邀在山鹰社社旗上签名。

经过光华管理学院时，同学们热烈欢迎李克强回到母校，总理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第三站，总理来到本科期间就读的法学院。1978年至1982年，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并同时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历经燕园4年磨砺，他更是名列全校27名优秀毕业生之列。学术上，由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成为后来的教学参考；他参与翻译的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填补了当时中国法学著作翻译的空白，并在此后多次再版。

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向总理介绍了法学院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在李克强毕业后的34年间，

法学院在QS世界大学法学专业排行榜中，已位列全球第18位，居我国（含港澳台地区）第一、亚洲第二。期间，总理视察了法律诊所，并与正在为小微创新企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师生进行了互动。

第四站，总理来到了数学科学学院。高松副校长介绍了学校理工科的科研工作，田刚院士与张平文院士汇报了数学学科的发展近况。期间，李克强总理与青年数学家许晨阳教授的科研团队进行了亲切的互动交流。

随后，总理一行来到英杰交流中心，参加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副总理刘延东主持会议。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介绍了北大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理念，提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破解发展瓶颈。

最后，总理一行来到北京大学农园食堂，

与北大学生共进晚餐。他在食堂一层的自选区选取饭菜，并热情问候食堂的工作人员。随后，总理端着饭菜，来到学生中间坐下用餐，边用餐边和同学们热烈交谈。

总理的晚餐有凉拌木耳，清蒸小鱼，清炒河虾和一只冬菜包，一共18元。用餐结束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向总理赠送纪念册：“印迹——北京大学校园媒体记录李克强学长与母校”，表达北大学子对李克强学长的敬爱之情。

暮色渐渐降临，同学们的热情依然高涨。总理在同学们的簇拥下走出农园食堂，并微笑着与夹道欢送的同学们挥手道别。

原载北京大学官网

摄影：王天天

北大迎来新书记！



2016年12月13日下午，北京大学在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大学宣布，任命郝平担任新一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郝平，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78级本科生，1982年6月入党。毕业后留

校，先后在校办、学生工作部工作。1992年赴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95年回到北大在外事处、教育基金会工作，其间担任过校长助理一职，还获得了北大国际关系学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他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会常委。

2005年，郝平离开北大，出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2009年，赴任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成员，并担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

郝平在就职发言中表示，会尊重教育规律，守住办学根本，坚持师生的主体地位，拿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上下求索，砥砺前行。

原载北京大学官网

北京大学改革“瞄准”四大差距

王庆环

- 学部内可自由转专业
- 鼓励建设有特色的跨学科本科人才培养项目
-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体系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市被确定为“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以来，他们出台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并被解读为未来教育改革的风向标。

201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在校内信息门户网站公布了《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及《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试行）》，改革直指本科教育。

可自主申请转专业，鼓励自主选修

总的来看，北大此番改革瞄准的是自己在“培养引领未来的人”上存在的四个差距。根据《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试行）》的表述，这四个差距分别是：学生在自主选择和跨学科学习中受到诸多限制，个性化发展需求未能得到更好地满足；教学方式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存在师生互动不足，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和素质培养等问题；通选课体系侧重学生知识的拓展，在价值观、批判性思考和人格素质的全方位养成等方面，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学校的资源配置还不尽合理、高效，院系和师生在教育工作中的创造活力和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那么，针对这四个差距，北大将采取哪些改革措施呢？

首先，是给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除教育部规定和北大



招生录取时明确不能调整专业的情况外，在校本科生可以在第一学年末或第二学年末自主申请转专业。原则上，学部内可以自由转专业。所谓学部，是指人文、理学、社会科学、信息与工程、医学5个学部。另外，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各院系本科必修和限选课程在教学资源许可的前提下，向全校所有本科生开放。全校本科生在专业教学计划和院系导师指导下自主选择课程。显然，这些措施为学生提供了开放和多样化的专业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发现志趣，发挥潜力。

其次，是给学生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的动力。一方面，设立学生自主选修学分，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跨学科学习。学生在完成各专业毕业所需最低专业学分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开展自主性深度学习，建立个性化知识体系和能力素养结构。同时，条件成熟的院系可通过设立“荣誉学士学位”和相应的制度，激励学生选修更具挑战性的荣誉课程并积极参与实践创新。

这些改革措施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非常关注兴趣、个性、激情、潜力这些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

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融合，支持跨学科

为了实现这些改革，整个教学系统和培养方案都要发生重大的变革，而本次改革方案中也有大量的篇幅来构建这些任务。这包括：

修订完善专业培养方案，凝练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要加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融合，在专业教育中贯穿通识教育的理念。修订后的培养方案包括四个部分，即通识课程与公共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与专业限选课程、专业选修课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必修或限选课程（四部分比例原则上为3：2：3：2）。

设立多层次的跨学科本科教育项目，培养跨学科人才。鼓励学部、院系、研究中心及教师团队建设多层次、有特色的跨学科本科人才培养项目，包括跨学科专业、双学位、辅修专业、微专业、跨学科系列课程或课程模块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空间。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体系，推动教学

方式改革，实现卓越教学。鼓励院系通过开设平行班、滚动开课等措施，减小班级规模，加强教师对学生的针对性指导；鼓励教师在教学各个环节创造性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批判性思考、阅读、写作、表达能力的训练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强学生的交流与沟通能力；学校将进一步加大教学经费投入，设立“北京大学卓越教学奖”，将其作为学校教学领域最高荣誉，以表彰为北大本科教育积极奉献、教学水平优异的教师，分享推广优秀的教学实践经验，形成追求卓越的教学氛围。

北大此次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以“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为理念，使学生在北大获得最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为此，北大提出要把本次本科教育改革的关键放在院系，核心则是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学生的内在潜力。

“总的来看，这些改革措施符合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也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适应，是人才培养理念与制度上的重要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如此评价。

原载2016年05月03日《光明日报》



中国女排进北大 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2016年8月20日，北京时间11时01分，随着惠若琪最后一记扣杀，奥运会女排赛的冠军争夺战尘埃落定，中国队以3:1战胜塞尔维亚队，观赛会场顿时沸腾，无数观众登时落泪！

2016年9月5日，夏末秋初的燕园迎来了充满好奇与期待的新学子，载誉归来的女排队员们来到北大为大家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课程”在《红旗飘飘》的歌舞中开场，瞬

间将全场气氛点燃。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致辞，他首先代表全体北大人向女排队员致以敬意，随后他带领大家共同回忆了中国女排与北大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的渊源，深刻阐释了女排精神与北大精神的共通之处，号召全体北大人传承精神，建设北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王圣博作为学生代表发言。随后山鹰社社长赵万荣、红十字会学生



▲ 1972级无线电系黑良杰校友将当年全体女排队员签名的排球捐赠给母校

分会会长李晓丹、北大排球总队总教练黄建滨教授与女排姑娘们相坐对谈。他们表达了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其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内核，与科学研究、登山探险、社会公益所崇尚的精神都不谋而合；女排姑娘们在里约的壮举，为北大、也为时代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游戏互动环节，女排姑娘们与北大女排代表和在场幸运观众展开了激烈的对决。一直处于下风的北大队请出北大十佳歌手冠军献唱，北大工学院博士生表演魔术和北大自主研发的机械臂作为三个“小锦囊”化解大分差的尴尬，也为互动环节增添了不少趣味。

最后女排姑娘们与北大互赠礼品，并带来一曲《年轻的战场》引发全体大合唱，活动在欢快活泼、催人奋进的氛围中完美落幕。

为纪念“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提出35周年，北京大学校友会专门邀请了亲历口号

提出的校友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1980级法律系吴妙琳校友组织参会代表们专门为此次活动搜集了当年的文字资料 and 老照片，为中国女排制作了一本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精美画册。

当年为女排队员献花的1979级法律系张雪校友再次为女排姑娘们送上了鲜花。校友们带来的对北大、对中国女排满满的回忆和浓浓的感情，让35年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瞬间变的恍如昨夜。北大人的传承与坚守，在中国女排的一路陪伴下，始终熠熠生辉。

活动结束后，校友代表又就“弘扬女排精神、筑梦伟大梦想”这一主题进行了座谈。继往开来，校友们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母校的发展。座谈临近结束，专程从宁夏赶来的1972级无线电系黑良杰校友还拿出了女排第一次来北大时的签名排球，正式捐赠给母校，作为永久留念。

摄影：北大校友摄影俱乐部

董强教授当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2016年11月14日当选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成为该学院200余年来首位华人通讯院士。

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授予外籍人士，与院士一样为终身制，只有在有通讯院士去世的前提下，才可增补。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是通称为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的五大学院之一。这五大学院分别是法兰西学士院、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古文献学院、法兰西艺术学院和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院等并列为全球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学院。

董强教授是著名学者、翻译家、中法文化比较研究专家、文学史家、中法文化交流使者，现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2009年获法兰西政府“教育骑士”荣誉勋章，2013年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年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2015年，法国三任总理同台授予其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6年，获颁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称号。

据悉，董强教授是我国人文艺术领域内继吴冠中（法兰西艺术学院通讯院士，已故）、饶宗颐（法兰西古文献学院外籍荣誉院士）之后，第三位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杰出人士。

原载201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谢晓亮当选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10月17日，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谢晓亮，当选为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此前，谢晓亮曾于2011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美国国家工程院（NAE）以及美国国家医学院（IOM）三院组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医学院院士，代表了这三个领域的最高荣誉。此前，华人学者钱煦是唯一一位华人三院院士。谢晓亮此次成为美国“两院院士”，在华人学者中亦属少有。

作为室温下单分子荧光显微技术的开拓者之一，谢晓亮教授推动和带领了单分子研究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他是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开创了活细胞中的单分子研究。他主导研制的以快速拉曼散射为主的高灵敏、无标记光学成像技术，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原载北京大学官网

曹文轩教授获国际安徒生奖



当地时间4月4日下午2点50分，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公布，中国首位入围短名单的作家曹文轩最终成功折桂，成为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曹文轩以《草房子》《青铜葵花》《火印》等众多广为传诵的作品为读者所熟知。“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曹文轩此番获奖，既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享誉国际的一大步，更是中国儿童文学迈向世界的一大步。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省盐城市农村，197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代表作有《草房子》《红瓦》《细米》《天瓢》等。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等40多种奖项。

“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里面是首屈一指的，既具艺术品质更具艺术含量和分量。他的作品主题厚重，不单单带给孩子们欢乐，还教会他们有责任、有担当。”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张明舟看来，曹文轩获奖，既是对他全部作品文学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他以儿童视角，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悲悯情怀的认可。这将对今后儿童文学创作，对作家，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方向和价值取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综合自多家媒体

李零、俞孔坚教授获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李 零

2016年10月7日，美国艺术与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AAAS）在哈佛大学Sanders纪念礼堂举行了2016届院士授衔仪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和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教授正式授衔院士。作为来自中国的外籍荣誉院士，本届新晋院士中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著名音乐指挥家余隆、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医学教授叶玉如、台湾著名艺术家刘国松等共6位。



俞孔坚

原载北京大学新闻网

张平文、郑晓瑛教授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6年11月14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7届院士大会在卢旺达基加利市举行，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科技部长以及其他科学团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高层决策者等300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宣布了40位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增院士名单。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北京大学-APEC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教授在本届大会中荣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称谓为第三世界科学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TWAS）是在已故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萨拉姆教授倡导下于1983年11月10日创建的，总部设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进步，促进南南科技合作。



张平文：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数学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学术期刊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计算物理》副主编。MMS等10余种国内外杂志的编委。先后获得北京市“五四”奖章、北京市“师德标兵”、首都劳动奖章、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青年教师奖”、冯康科学计算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项目“复杂流体的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与汤涛、李若和汤华中合作的项目“基于调和映射的移动网格方法及其应用”，获得教育部高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复杂流体和复杂流动的计算方法与数学理论”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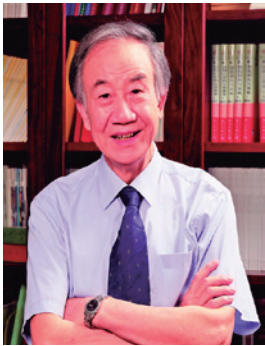
郑晓瑛：现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和人口科学合作中心教授、所长，北京大学-APEC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两次担任国家人口健康领域“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出生缺陷干预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专家组组长。主要学术兼职包括APEC生命科学创新委员会委员、国际残疾华盛顿小组中国代表、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优生优育科学协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环境与健康，医药卫生工程管理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

原载北京大学官网

周德敏、张礼和课题组在病毒疫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周德敏



张礼和

2016年12月2日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发表了北京大学周德敏、张礼和课题组的突破性研究进展，题为“Generation of Influenza A Viruses as Live but Replication-Incompetent Virus Vaccines”。鉴于该成果在预防和治疗病毒性传染病方面的重大医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全球最大的科技新闻工作站SciPak将该发现作为亮点，于美国东部时间12月1日下午两点向全球媒体发布。随即新华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加拿大广播公司和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对这一重大发现进行了专题报道。《Nature》杂志也对此突破性进展给与了高度评价，认为周德敏及其北京大学同仁们建立的方法将被广泛用来制备更高效的病毒疫苗。

流感、艾滋病、SARS和埃博拉出血热等致命性传染病及其周期性爆发，时刻危害着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其幕后黑手是结构多样、功能复杂且变异快速的病毒，而疫苗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手段。当前临床使用的疫苗或因病毒灭活致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差，或因制备工艺复杂而不通用，或因病毒突变致免疫逃逸失效，从而使人们往往谈病毒色变。周德敏、张礼和课题组以流感病毒为模型，发明了人工控制病毒复制从而将病毒直接转化为疫苗的技术，即在保留病毒完整结构和感染力的情况下，仅突变病毒基因组的一个三联码，使流感病毒由致命性传染源变为了预防性疫苗，再突变三个以上三联码，病毒由预防性疫苗变为治疗病毒感染的药物，并且随着三联码数目的增加而药效增强。这一“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不仅使疫苗研发不再复杂，而且摆脱了对病毒生物学知识获得的依赖，适用于几乎所有病毒。这一发现颠覆了病毒疫苗研发的理念，是活病毒疫苗的重大突破。

周德敏教授和张礼和院士来自于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司龙龙和徐欢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原载北京大学官网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2016年9月20日 上 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揭牌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青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以及兄弟院校、中外学者的代表共同参加了此次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北京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小南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揭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宣布人文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朱苏力教授和张辉教授分别代表学术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接受聘书。

林建华校长在讲话中阐释了北大人文社会学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北大一方面要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另一方面在学术上也要产生可以影响社会的思想——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做的工作。他表示，北大文研院是一个学者主导的机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机构之中，希望文研院可以聚集国内和全球的优秀学者，共同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

北京大学举办2018珠峰攀登活动启动仪式

2016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118周年校庆之际，北大2018珠峰攀登活动启动仪式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大山鹰社队员将联合富有登山经验的部分校友于2018年5月，即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西藏自治区政府、中国登山协会、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团市委等单位负责人，北京大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老师、学生代表以及各界校友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原载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京大学被授予“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2016年12月23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吉林长春联合召开2016年全国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创业现场推进会，为52家获评“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称号的代表单位授牌。受学校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委托，北大团委书记陈永利出席会议授牌，并代表学校在推进会上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

北京大学新增2个ESI前1%学科 总数达21个

2016年9月23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的最新数据显示，在ESI总计22个学科中，北大已有21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继续保持中国大陆拥有前1%学科数最多高校的记录。此外，北大按总被引数指标排名全球127位，稳居中国大陆高校首位。

ESI是基于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或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ESI数据库以学科分门别类（共分22个学科），采集面覆盖全球几万乃至十几万家不同研究单位的学科。ESI数据统计是以10年来计算的，每两个月滚动更新一次。

北大进入ESI前1%学科的基本情况一览

年度	北大进入全球前1%的学科
2002	4个：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
2003	6个：新增 临床医学、数学
2004	7个：新增 地球科学
2005	8个：新增 动植物科学
2006	9个：新增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2007	10个：新增 环境生态学
2008	12个：新增 社会科学、药学与毒理学
2009	14个：新增 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2010	15个：新增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2011	17个：新增 神经病学\心理学、经济学与商学
2012	18个：新增 农业科学
2013	19个：新增 免疫学
2016	21个：新增 微生物学（7月）、多学科（9月）

北大两项成果入选2016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2016年12月29日，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在京揭晓，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郭雪峰教授负责完成的科研成果“世界首例真实稳定可控的单分子电子开关器件”和物理学院孟杰教授负责完成的科研成果“发现原子核手征对称性和空间反射对称性的联立自发破缺”入选。截至目前，北大共有27项优秀科研成果入选每年的“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原载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大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落成启用



▲ 第二教学楼地下原为自行车停车场。
▼ 下图为整修后的二教“双创中心”大讲堂

2016年10月9日，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正式落成启用。校长林建华、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校友代表俞敏洪共同为“双创中心”落成揭牌。

“双创中心”位于北大第二教学楼地下一层，占地近5000平米。包括新青年创客空间、创业大讲堂、新青年咖啡馆、创新创意设计展示中心等区域。作为北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它的落成既是北大服务创新创业国家战略的关键举措，更是探索全方位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优化校园创业氛围的有益尝试。



北大，118周岁生日快乐！

——“家·年华”校友返校日活动特写



纪念跑先后鸣枪，一千余名北大校友从全国各地赶来，与在校师生一起风雨无阻，在全力以赴的奔跑中致敬母校118周年校庆。

那些和母校一起经历岁月长河的老学长，在农园、在办公楼礼堂重聚，回忆着当年的琐事，倾诉着如今的开怀

与眷恋，谈论着熟悉的老地方。“母校重聚”让北大的历史在这里沉淀，让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更加醇厚。岁月如宁静的未名湖水在这里静止，青春永远，北大不老！

淅沥沥的小雨没有浇灭校友回母校的热情。2016年5月2日校友返校日当天，众多校友回到了久别的未名湖畔、青春燕园，参加母校为校友们举办的各种活动，共庆北大118周岁生日快乐！

从早上7点志愿者在赛道就位，到深夜《未名湖是个海洋》曲散；从在雨中的校园漫步，到奔跑在五四体育场；从又一次穿上学位服，到重温母校浓厚的学术气氛和文化底蕴；从半个世纪同窗重聚，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亲子诗会。相信，每一位归来的北大人都在感受着母校的温情与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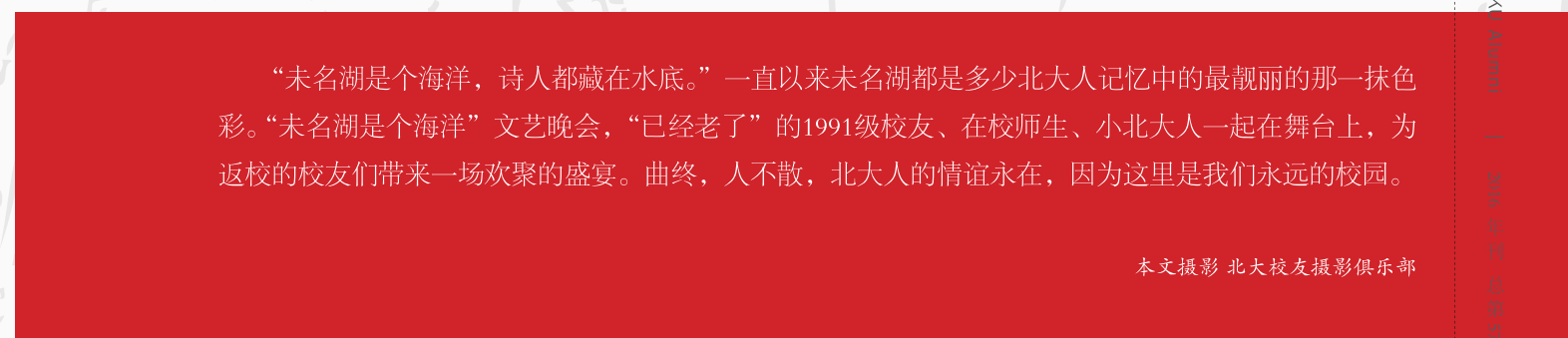
一大早，体育馆北广场的总服务台就开始了忙碌。办理校友卡、为母校捐赠、办理中银北大信用卡、领取返校礼物，校友们冒雨来到返校日活动的第一站。“燕缘小师妹”帮助大家通过微信办理校友卡，体现了科技的进步与暖人的关怀；憨头憨脑的“毕业熊”和神秘出场的“燕缘君”机器人，则让跟着爸爸妈妈回母校的小北大人们欢呼雀跃。

北大人在燕园曾经东风桃李，又从未名湖畔走向海角天涯。无论离开多久，离去多远，永远惦念的依然是这个园子。回到母校，支持母校！无论是“我爱母校”小额捐赠，还是“爱归燕园，砖注奉献”，又或是“九一剧场”筹款，点滴汇聚北大发展，倾力支持师弟师妹成长。30楼，在校友们捐赠的微波炉前，师弟师妹们用自制马克杯蛋糕，和返校的师兄师姐们共同分享燕园生活中貌似不经意的惊喜与温暖！

第二届校友羽毛球联谊赛在北大体育馆隆重开拍，30余支北大校友队伍在赛场上奋力扣杀。场下欢声笑语，场上挥洒汗水的比赛见证着北大人的健康、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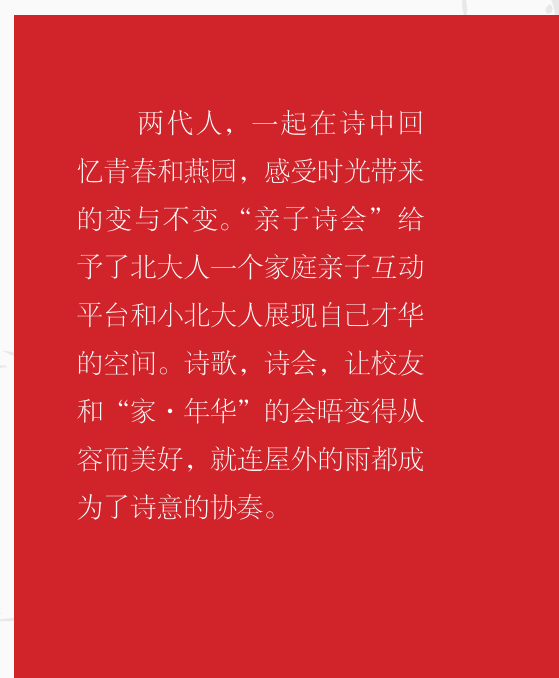
在五四体育场，“年轻”的91级和自认更“年轻”的80年代校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足球友谊赛，时光在这里交汇，足球让我们重聚赛场，重新回味年少的奔放与自由。

原载北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一直以来未名湖都是多少北大人记忆中的最靓丽的那一抹色彩。“未名湖是个海洋”文艺晚会，“已经老了”的1991级校友、在校师生、小北大人一起在舞台上，为返校的校友们带来一场欢聚的盛宴。曲终，人不散，北大人的情谊永在，因为这里是我们永远的校园。

本文摄影 北大校友摄影俱乐部



两代人，一起在诗中回忆青春和燕园，感受时光带来的变与不变。“亲子诗会”给予了北大人一个家庭亲子互动平台和小北大人展现自己才华的空间。诗歌，诗会，让校友和“家·年华”的会晤变得从容而美好，就连屋外的雨都成为了诗意的协奏。



林毅夫vs张维迎：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

银昕 徐豪 陈惟杉

2016年11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围绕产业政策展开面对面的辩论。8月底以来，两人已经围绕产业政策“隔空对话”数个来回。

这已经不是这两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始终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经济学家的第一次辩论。从90年代两人围绕国企改革方向进行的“北大交火事件”，到21世纪两人就是否存在“后发优势”展开的激辩，两位经济学家的每次辩论都因与中国经济现实与未来的紧密关系而备受社会关注，此次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依然如此。

林毅夫、张维迎两人此次观点交锋，之所以不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还演变成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中了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林毅夫、张维迎如何交锋？

造势已久的“世纪之辩”11月9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这不是林毅夫与张维迎的第一次交锋，也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此次“世纪之辩”的主办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题目定为“‘产业政策’思辨会”，可以看出其背后减少火药味，强调“思辨”的用意。《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前约一小时到达现场时，未名湖以北的朗润园万众楼周围已聚满人群。由于面积不大的主会场吸引了近千名听众，主办方不得不在主会场外另设两个分会场转播主会场情况。

担任主持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黄益平教授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讨论，甚至会载入历史。

辩论会由林毅夫的发言开场，随后张维迎发言，紧接着是自由辩论环节，以问答形式展开。整场辩论中，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两人对有关产业政策多个方面的问题：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的成效、政府是否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及比较优势该如何发挥等问题，分别亮出



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对方激烈辩论。

这两位同样拥有“海归”背景，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共同见证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的学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都保持了“君子之争”的学者风度。

什么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

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林毅夫强调，虽然一些具体的产品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但产品创新背后基础层面的研发成果是不会有企业家愿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须要靠政府资助的各项科研项目来完成，而这一部分研发投入理应算作产业政策。

张维迎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张维迎强调，关键的两个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他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公司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就属于产业政策了。”

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林毅夫举例说，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林毅夫认为，“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有5个特征：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有效市场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林毅夫表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林毅夫表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张维迎

“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张维迎说，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

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林毅夫表示，“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

首先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制，张维迎对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提出的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可以预见，进行了批驳。“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

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路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张维迎说，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无耻”。“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张维迎表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张维迎表示：“林毅夫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不是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这两种观点何其相似！”张维迎认为，“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是否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补贴在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或者劳动力供给上的限制问题时才需要，如果企业想要让创新和风险资本出现，就要有与之匹配的政策环境。“我基本是反对补贴的，我（提出的）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是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进行激励的补贴之

外，所有的优惠就是税收上优惠几年，量是很少的。”

张维迎

张维迎说：“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都是基于边际分析。但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张维迎认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不是为了政府的补贴，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美味佳肴的向往，甘愿冒风险，为了政府补贴才去吃螃蟹，根本算不上企业家。“政府不用鼓励任何人吃螃蟹，也不必为任何吃螃蟹的行为买单。许多拿着吃螃蟹姿势的人，实际上是在啃馒头！”张维迎说。

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林毅夫

林毅夫表示，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也要强调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果，要想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的竞争者，使他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与他之前付出的成本和风险是不对等的。发达国家要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林毅夫强调，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理应帮助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等。“如果中国企业家要想进入航天业，没有国家补贴，大概就不会有人愿意进入了，肯定会亏本。”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在市场中生存，天生的本能就是发挥比较优势，而不是靠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比较优势不是国家的事，而是企业的事，个人的事。每个普通人都懂得利用

自己的所长，同时让他人也从事各自擅长的工作，这就是管理学上讲的‘核心竞争力’。”张维迎认为，他与林毅夫两个人在现场辩论有关经济学的议题，而不是去辩论量子物理、航天科技等议题，就是在自发地本能地利用比较优势，这与国家政策无关。

辩论20载，林毅夫、张维迎到底在争什么？

或许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还没有画上句号。

已经争论了20年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均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教授，多年来是对手也是同事。

1952年生的林毅夫和1959年生的张维迎，他们此番关于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是双方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解正名，更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命题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就曾就学术观点数度交手。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9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10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

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7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林毅夫与杨小凯有过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一个月后，林毅夫发文阐释观点，指出他和张维迎乃至国内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此后在2014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的《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研讨会上，林张二人又围绕着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激辩。林毅夫认为，如果没有“绝对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持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张维迎认为，如果研究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

2016年8月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针锋相对地提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9月13日，林毅夫发表观点鲜明的反对文章。之

后，张维迎和林毅夫又分别在多个场合一再阐述各自观点。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此轮争论暂告一段落。

林张之争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双方围绕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存在、该不该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买单、怎样利用比较优势等方面展开交锋。这其实不只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更深层次地来看，背后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在此次现场辩论过程中，张维迎就曾表示，“我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张维迎说，“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作出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对此，张维迎的观点是，这些理论所说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失灵，他认为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更好的分析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市场竞争是使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合作机会的过程。”

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林毅夫在美国留学期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而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维迎早年在英国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后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学说十分推崇，他也曾公开表示受杨小凯影响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8年，中国的发展一直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在当前面对发展中的各种困境时，中国更是要向改革要红利。

以杨小凯、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源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废除管制，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张维迎甚至表示，“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机遇，因此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他还曾公开表示，政府在其中的做法“95%是正确的”。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增长模式遭遇挑战，传统动能作用减弱，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而现有产业政策也确实存在不足的地方。产业政策之争，与其说是两方各持己见，不如说是对今后经济发展之路的不同思考。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此，在需要汇集各方智慧、向改革要红利来发展的中国，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尤为可贵。

产业政策的“是与非”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二人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还“惊动”了发改委。

9月14日，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并指出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坦言，“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在定时定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林张辩论”的问题，足见这场辩论已经超乎学术层面，而是折射出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真正有效、产业政策的边界究竟何在等问题的关注。

近几年，从光伏产业政策到新能源汽车骗补，人们看到了不少“失败”的产业政策。在此次辩论中，即便不像张维迎那样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也认为多数的产业政策是以“失败”告终。

产业政策带来的“惨痛记忆”

就在9月14日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伊始，赵辰昕通报了国务院在全国对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情况。

而如果查看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其中有一些便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列。

2009年，国务院曾陆续出台10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包括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规划意在通过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但国务院的规划似乎并未改变各行业产能扩张的趋势。2013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表述开始出现在政府高层的讲话与文件中，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及，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张维迎在辩论中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也撰文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

对“维迎战毅夫”的麻辣点评

马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被媒体大肆渲染的“林张之争”11月9日下午如期在朗润园上演。北平无战事。除了一些superficial(肤浅)的相互反诘,基本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交锋。

5、毅夫参加辩论,主要不是为了辩论产业政策或者有为政府,而是为了推广其“新结构经济学”。维迎参加辩论,真的是痛恨任何的产业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无知”与“无耻”。双方的目的动机、问题定义、分析单元不在一个层次。

6、因为上述原因,双方并无多少“交锋”。林张之争主要是维迎批毅夫。毅夫企图整合维迎,强调同和之处。有没有维迎的批判,毅夫的理论都基本上能够自圆其说,虽然不那么sexy(性感)。维迎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可供毅夫批评。

7、正如双方都认可的,一个好的理论都要能够自圆其说。但对于国家政策和解决问题而言,不是所有好的理论都relevant(有作用)。我们必须选择或者发展那些靠谱而又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理论。

8、维迎说:毅夫一面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照搬,一面却自己又扎进新古典的范式,这种做法难以自圆其说。毅夫说,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实,主流经济学家(包括管理学家)也在发展普适性的理论。比如,对于cluster(集群)的研究。

9、毅夫书中有一个例子:瞄准一个比你国家年人均GDP高两倍左右但快速发展的国家,然后准备在某些行业进行补位。维迎说,以中国为例,各个关键时期,能找到的都是非洲一些小国家。毅夫说,但它们不符合我说的快速发展条件。维迎说,这是能够找到符合第一个条件的所有国家!穷尽世间所有样本都无法找到检验一个理论的sample(样品),不能说这个理论就是错的,因为你还没证伪。但没有相应的sample,至少可以说,对于中国这个focal

1、听完了所谓的辩论之后,估计双方的拥趸都不会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都会认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完胜。其实,基本上没有多少新东西。毅夫再次清晰全面地勾勒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维迎再次充满激情地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2、有一点可以肯定,继19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风光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依旧风光。当年真的是指点江山,而今他们仍然自认为是指点江山。很多人也跟着认为国家发展离不开经济学家。

3、今天唱大戏,其实双方出场之应工,主要都不是经济学家。毅夫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正工的“政府管理”和“政治学”。维迎的角色,则主要是“道德哲学”。只是这两个学科在中国要么发展太烂,要么没有话语权。也许是经济学家要包揽整个社会科学。

4、双方的理论背景都并无太多新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200年了。新古典100年了。维迎信奉和推崇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与熊彼特)也100年了。都是老革命,都会遇到难以化解的新问题。

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他在文中直言,“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

光伏产业政策也被张维迎视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的典型案列。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而政府补贴的范围涵盖了从初始投资补贴到光伏电站补贴、分布式光伏补贴等各项内容。

国内“光伏基地”也一度遍地开花,全国31个省份均把光伏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基地超过100个。

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削减光伏补贴,欧洲、美国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调查等因素,中国光伏企业开始普遍陷入亏损泥潭,无锡尚德、赛维LDK等行业巨头相继陷入困境。

外国也有产业政策,乔布斯是受益者?

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林毅夫也指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也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还有“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有

人将之称为“制造业回归”。比如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些都是不同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具体体现。

奥巴马政府投入超过5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包括投入3亿美元用于合作投资与创新技术产业,投资超过1亿美元使美国企业发现、开发和应用先进材料的速度提高到目前的两倍,耗资1.2亿美元开发创新的制造工艺和材料等内容。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也援引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马里亚纳·马祖卡托的经典研究著作《创业型政府》论证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使乔布斯的iPhone如此‘智能’的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触摸屏显示器和最近的Siri语音助手等技术都是政府资助的。这种蕴含着极大风险的慷慨投资绝不会因‘风险资本家’或者‘车库创业者们’的存在而出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成了这些创新的发生。假如我们坐等市场或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而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仅提供基础服务,创新就不可能发生。”

林毅夫也曾分析道:“美国联邦政府在全部分研发经费中所占的份额,在1930年仅为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在50%~66%之间。经济学家常建指出:‘美国在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行业仍保持国际优势,尽管其总体技术领先水平正在下降。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对国防相关性研发活动的投入,上述行业都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支持对医疗等其他重要经济行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政府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扶持了生物技术机构的研发活动,这对美国保持其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原载《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4期

concern（关注焦点）来说，这个理论在这一点上是irrelevant（不恰当）的，至少没有relevant（确切）的证据。但对一个非洲小国而言，这个理论可能makes sense perfectly（讲得通）。所以毅夫要老去非洲找证据。

10、产业政策，失败和成功的，全球都有案例。对案例事实的选择性地感知和应用都是偏颇的，可能既不是无知，也不是无耻，但肯定是有些别有用心的成分，方便自己，诋毁他人。这是辩论和行文的基本套路。

11、毅夫多次希望澄清自己不是一味为政府辩护，并认为把“替政府说好话”的标签贴到他身上是冤枉他。听到过其他场合毅夫最牛的解释：政府也没问我，也没照我说得去做，但它做得符合我的理论预测（与解释）呀。

12、在有些经济学家（或者自称的经济学家）与公知眼里，凡是观点刻意或者碰巧支持政府的都是没有独立观点的，都是被收买的。凡是反对政府的，都是有骨气的，值得称道的。这通常很解气，但也只是解气而已。

13、维迎说：所有的产业政策都终将失

败！我反对任何的产业政策！这种categorical（绝对）的论断，要么过于武断，要么对产业政策的定义peculiar（很特殊）。就像是说“所有的坏人都是坏人”一样。或者说，所有的恶人都将因为作恶而失败。事实判断中的construct（概念）已经埋下了价值判断的种子和倾向。

14、具体而言，维迎基本上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穿了马甲的计划经济”，这有失偏颇。当然，理论归理论。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肯定有别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而实践中，确实会有人以产业政策的名义想去做“计划经济”。所以，维迎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15、维迎有很多insightful（有洞察力）和revelatory（启示性）的观点和想法，也会有很多的非常机敏睿智的anecdotal evidence（经验之谈）。但除了认为哈耶克等基于优雅高贵的道德哲学的市场理论比新古典更完美之外，难以拿出一个coherent（合乎逻辑）的理论框架去抗衡毅夫的理论。但维迎对很多细节的判断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毅夫理论的潜在缺陷和大家不假思索赋予它的confounding

understanding（混杂理解）或者attribution（归属）。这是毅夫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并可以从维迎的批评中受益的。当然，毅夫的理论很容易让你陷进去，他也千方百计想让你陷进去。

16、我坚信维迎的另外一个categorical（绝对的）论断是错误的：没有市场失灵，只有市场理论的失灵。市场失灵是肯定会存在的。如果我住在深山老林，给另外一个住在千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的朋友写信，肯定没有任何一家私人公司用非常经济的成本给我按时投递的。这个美国邮政就可以做到。维迎说联邦快运等是由于美国邮政的低效才应运而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应运而生的盈利性公司注定是cherry picking（选择最有利的投资），谁也不会管深山老林。正是有了美国邮政这一全球效率和均等兼顾的非常好的政府机构（不是国企，而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分支，比美国建国还早一年），才有后来企业家cherry picking的可能性。

17、在赞扬和承认George Mason（乔治梅森）学派“政府失灵”概念的同时却否认“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是没有道理的。但同时，我欣赏维迎将市场的不完善和各种的不对称看成是一种常态。否则，我们这些做战略管理的就没饭可吃了。如果市场机制完善，信息完全公开，竞争充分自然，大家只要出场亮相就完了，哪还需要啥战略？！

18、辩论的焦点和由头貌似是产业政策，其实是关于“有为政府”“有限政府”“中性政府”等背后的思想脉络。问题的焦点，其实应该是下面一系列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分别可以做什么（外部空间的conditioning—条件作用）

政府和市场分别能够做什么（自身能力的enabling—条件）

政府和市场分别想要做什么（主导势力的aspiration—愿望）

政府和市场分别应该做什么（制度安排的

legitimacy—合理）

现在关于市场和政府，大家是把各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分不清功能界定、实际作用和结果归因。

19、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都可以用是否有效（Efficacy：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和是否有为（High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来描述和评判。前提是首先要按照全社会中各个constituents（组成部分）的collective arrangements（集体安排）去界定各自的角色定位。

20、维迎喜欢讲的一个企业家倡导的重大自主发明是蒸汽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二百年前。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发明，都是来自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军工技术领域的，也包括博弈论等社会科学进步。你不能说，没有美国政府越俎代庖，企业家们自己可能做得更好。这些超重大投资、极端高风险、通常低回报的事儿谷歌都做不了，别说任何其他私企了。没有政府支持的源头的元技术创新，硅谷车库创业是异想天开，顶多也就是互联网卖肉夹馍。我曾有专门论述，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中50—60%来自联邦政府！不管你管这叫不叫产业政策，这肯定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府（比大多数企业家高明的多）的作为。

21、朗润园至少有3个经济学家（无论用什么标准）都是排在中国前10位的（周其仁躺枪）。周其仁曾经写了个东西叫“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我估计画外音是，小平在哪些方面有为？小平是不是代表了政府？1977年小平推动立刻恢复高考，是不是一项明智的产业政策？！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恢复计划经济。见仁见智吧，退一步说，即使不是产业政策，是不是有为政府的行为？

22、中国政府自己决定把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连市场本身都是政府强行引入的，你说（当时那届）政府是不是有为政府？当然，



维迎一贯喜欢比喻：把你本该应有的东西拿走，再一点一点地还给你，或者还给你一些其他的替代性的东西，这不地道，不道德。问题是，任何国家和机构都不是白板，可以从假想的理想状态出发，这是道德哲学层面关系的问题。那些必须在有限资源和限制下对国内外事物accountable（负有责任）的政府，没有奢侈去顾忌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至少没有priority（优先权）。

23、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增强，国际竞争与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要求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要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有责任感）。不能迅速反应（swift and prompt），不够有实力（ability to mobilize its people），或者不够有耐心（patience, finesse, and maneuver），都不能圆满地满足国际社区的要求。总之，从real politik（现实政治）的观点看，政府必须有作为。

24、在经济领域内，政府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监管、补充、替代市场机制，这才是争论的焦点。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可能会干预市场，市场也可能侵蚀政府。企业家可能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也可能欺行霸市，操纵政府。这些都是正常的。You have to live with it（你必须和它生活在一起）！

25、无论是市场、政府还是企业，失灵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干了不该干的事儿。第二，该自己干的事儿没干。第三，干自己该干的事儿没干好。

26、我喜欢双方都把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职能）看成是一种可以存在于多种机构和人士中的“企业家精神”或者创新精神与意识。这包括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制度企业家）和policy entrepreneur（政策企业家）。但维迎在辩论中更多的是强调企业间的entrepreneurs（企业家）。

27、作为管理学教授，所有经济学家中我

自然最认同Joseph Schumpeter（约瑟夫·熊彼特）以及后来的Bill Baumol（比尔·鲍莫尔）和David Teece（大卫·提斯）等。但给定当代创新的复杂性和规模性，我倾向于认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与资金承诺，至少在大方向和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必要的。否则，划时代的企业家创新可能是天方夜谭。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既兴奋又凄迷。首先，仿佛回到80年代，当年在办公楼听厉以宁老师讲改革前28点和后28点。热血沸腾。那时，经济学家从名份上和实际影响上确实风光。现在，经济学家们依旧拥有话语权，吸引了众多眼球，但感觉与当年相比，进步没有想象的大，说话好像也没那么管用了。但更令人凄迷的是，相关的其他学科——政治学、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好像也没多大进步。我辈任重道远。

匆匆草就此文，随性而发，没啥章法与顺序。1987年考研想追随厉老师未果，出于对厉老师的尊仰，先整27点。如有拍砖，可能再弄后27点。

谨以此纪念一个管理学教授对经济学曾经的剩余好感。

原载微信公众号《马浩on战略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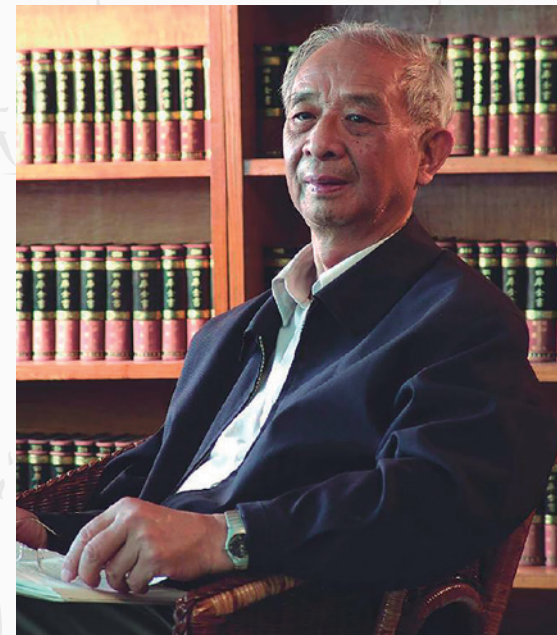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吴志攀（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句话，用来形容汤一介先生与《儒藏》，实在再贴切不过了。汤先生一辈子，立功、立言、立德，有很多工作可以写进学术史，有很多事情会被后人记住，他对我这样的后辈的关爱（尤其是在岁月艰难之时，雪中送炭一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也将持久地温暖这个世界。而在他晚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儒藏》，最大的心愿是编好《儒藏》，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情，我认为，也可能就是《儒藏》。

为什么要编《儒藏》，汤先生有过很多很深刻的说明。我作为外行，理解得比较肤浅，但汤先生提出这个大的思路之后，我马上就认定，北大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汤先生的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学术世家，几代人的积累，使得他的境界和判断力能够超越同侪。汤先生对“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传统，何为中国经典”，有着成体系的思想。他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状况，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他又在北大，北大有足够的人才，有很好的图书馆，有做大事的基础，所以，他来主持《儒藏》这个“工程”，是最合适的。

我还记得，向教育部申请这个项目之前，张岱年先生、季羨林先生、汤一介先生、何芳川先生及我，在静园一院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会，商量相关的事情。几位老先生都讲了话，我一条一条记了下来。那时我刚接何（芳川）校长的班，负责学校的文科建设。跟何校长比，我的水平差得太远，所以我就坚持一条，萧规曹随，按何校长的办法来做事情，而何校长是最尊重这些老先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张先生、季先生、汤



先生、何校长都是高人，他们讲话的神情我都还记得，老先生们虽然都走了，但他们共同倡议的《儒藏》还在，这就是学术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所在吧。

拿着老先生们的意见，我向学校办公会报告了一次，领导们都认同，于是决定向教育部申请《儒藏》立项，并由北大来做牵头学校，由汤先生作牵头人。

申请这个项目时，何校长、程郁缀老师和我陪着汤先生去开教育部的会。地点是在北三环马甸桥附近，高教出版社的一个内部招待所里。那天很冷，我扶着汤先生上下车、上下楼，一步一步走，印象深刻。人民大学也来竞争“牵头单位”，他们也很重视，但汤先生出面了，北大当然更有优势。

这个项目的经费，按后来的标准看，其实并不太多，但在当时，在人文学科，还算可观，所以应该感谢教育部社科司的时任领导。我始终认为，做学术的和做管理的，并不必然

有矛盾。很多学术事业的领导人，都是极其善于管理的，而且要有一点政治头脑。外行和内行，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事情才能办成，外行管得太过了不行，光是靠内行，也未必能行。

此后，汤一介先生在校内选了几个副手协助他工作，其中最后一名是我。前面几位助手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大教授，只有我是外行。汤先生要我参加，主要是要我帮他做校内资源的协调与研究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我十分乐意，虽然自己很驽钝，但却有心向学，平时也乐于读一点旧书，而且，到学校工作以后，要想为文科老师服好务，我正需要补文史哲方面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参加《儒藏》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自从担当了《儒藏》主编的重任，汤先生就专心致志地做事情，十几年如一日，把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做出了眉目、搭起了架子。这件事情太辛苦了，很不容易做好。毋庸讳言，我也听到过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因我身在其中，所以理解和外间就不一样。我知道，做成一件大事，总会有许多遗憾，甚至会有一些错误，做事情的人总比不做事情的人更容易犯错，但建设比批判更有长远的意义。汤先生带着大家做了十几年，认准了大的方向，久久为功，这功不仅在当代，还将传之久远。他给大家立起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因此受益的人会越来越多，影响也已经超出国界、超出时代，这就值得大书特书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专门看望了汤先生，聆听了他关于《儒藏》和儒学的见解，并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之后不久，汤先生去世了，我想，汤先生“做了一大事而去”，他的心里应该是特别踏实的。

这十几年来，汤先生多次招我到府上去谈工作，谈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儒藏》的事。非常惭愧，我也许做了一点点微小的服务工作，但很多时候，汤先生提出的要求，希望学校提供的资源，我没能办成，让他失望了。此外，他也谈一些对北大发展的思考。他在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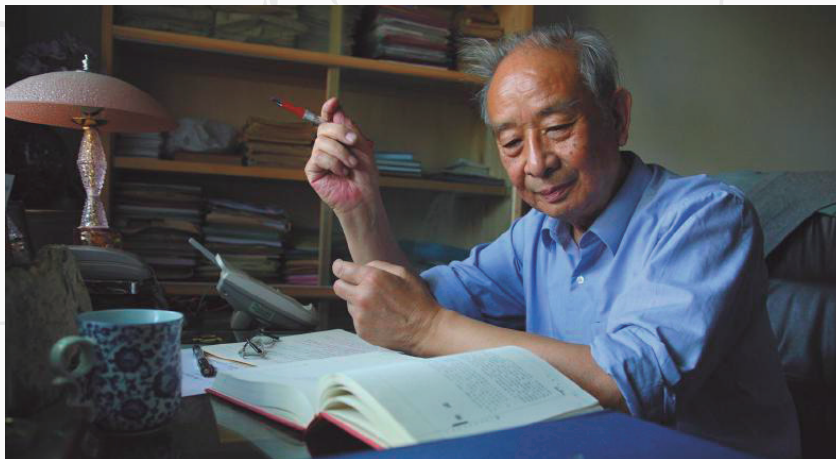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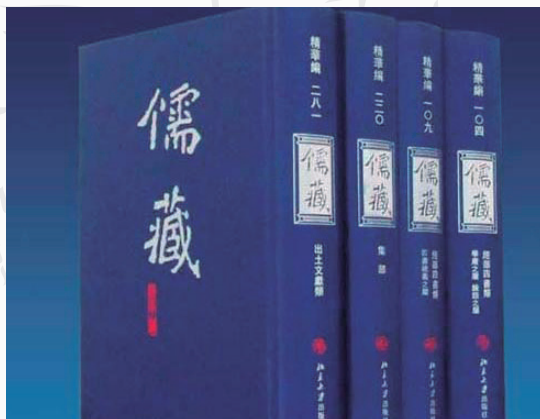
长大，后来又在北大读书和工作，一辈子都在这里，是北大培养了他，他打心眼里爱北大。在北大，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风风雨雨，所以他看问题也很准。

现在我回忆起来，汤先生主要谈了这么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北大办学，不能什么都搞，应该要有取舍。例如，有的学科，北大没有太好的基础，没有这方面的师资，连图书资料都没有多少积累，现在看到别的学校搞这个学科了，好像比较容易得到外面的资助，所以你们也要搞，这样恐怕是不行的。办学是百年大计，要靠几代人的积累，急功近利是大忌。

第二，北大的优势还是在基础学科，如文史哲，北大不能把看家的本钱丢了。现在基础学科的日子不好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注定要受冷落，但学校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发展基础学科。市场的选择，往往是短期的、表面的、直接粗暴的，但还会有社会历史的选择，所以要看长远。北大这个大学，和别的大学也许不一样，北大就适合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学问。北大赶时髦的本事当然也很大，但北大不能去赶时髦，一旦浮躁起来，是要吃亏的。

第三，评价基础学科的发展状况，标准更加复杂，不可能是数量化的。有的东西，同时代的人理解不了、接受不了，这在历史上常见。现在学校有些重理轻文，假如用理工科的方法来管人文学科会不合适，学校的管理者头脑要清楚。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可以也应该结合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是过去的主流。现在的时代，儒家又开始复兴，生命力很顽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不能完全脱离儒家。北大哲学系有着“打通中、西、马”的传统，北大应该来做这样的工作。

当然，汤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儒藏》，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可一天时间他都舍不得浪费。《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可惜，现在熟悉古文献的年轻人难找，愿意从基础的点校工作做起的年轻人更难找，但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儒藏》工程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人理解“功不唐捐”，愿意坐在冷板凳上，一点一点进步。要不然基本功都丢了，将来还谈什么做大学问。

汤先生还反复跟我说，志攀啊，你回去跟校长讲，你们要考虑，我以后《儒藏》谁来牵头啊？你们要找人，要多投入一些，要不然等我走了就来不及了。

我每次听他说到最后时，心中都充满伤感。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之人，或有后来的理念、办法，或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但要像汤先生这样，做成一生的事业，就太难了。

汤先生的睡眠，似乎一直不太好。自从承担这项重任后，他的心事更重了，睡眠更成为困扰他的一个大问题。有一次，他跟我说到睡眠问题，我是长期睡不好的人，所以同病相怜。他告诉我说，一般的安眠药吃了都不管事，又不敢吃太多了，因为对肝脏和肾脏都不

好。我那会儿的胆子也大，也许因为我心太急，所以当即就打电话约好了北医六院的张岱大夫，他是我的好朋友，也给我看过病，因此我特别信他。约好时间后，我陪着汤先生去医院，张大夫看失眠症非常有办法，他跟汤先生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又把我叫进去，给我

一点点药，对我说，让汤先生临睡前服半片就行，明天看看服药后的情况。

我将汤先生送回朗润园，拿出药叮嘱半天，您只能吃半片啊。当天晚上，我突然放心不下，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药，更不知道汤先生服药后会怎样。我辗转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上午我就来到汤府，看到老人家坐在那里，气色不错，我的心才放到肚子里。汤先生对我说，服药后一觉睡了9个小时，他从来也没有睡过这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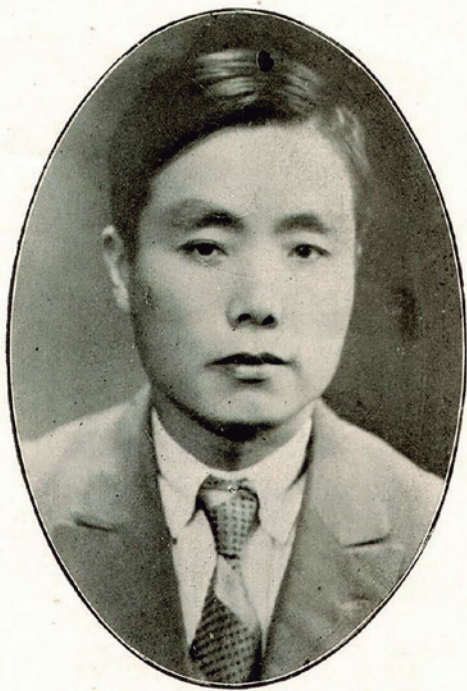
我听了非常兴奋，立刻与张大夫联系。张大夫说，这药很厉害，虽然管用，但不能经常服用。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偶尔才能用一点。他让我转告汤先生，他的失眠症状不严重，吃半片就能睡这么长时间，所以不用再服了，调理之后会好的。

汤先生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他生前就与学校签下协议，将他父子两代人的珍贵藏书都捐给北大，这很让人感动。和某些人利用“家学”或者并不符实的虚名谋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家风，这是君子之风。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者是为天下人的公益而生的。私心、私欲不是不能有，但总归应该少一点，多替别人考虑、多替未来的人考虑，如此，气象方能大。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回忆的文字，表达我对汤先生的崇敬、感激和怀念。同时，也真诚祝愿乐黛云先生健康长寿，祝愿《儒藏》能够按照汤先生的构想，一步一步做下去，成为惠泽千秋的“名山”工程。

原载2016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校报》

厉以宁：回忆周炳琳老师



法 學 院 院 長
兼 經 濟 系 教 授
周 炳 琳 先 生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接着1952年夏季开始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里的沙滩迁入西郊燕京大学校址，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那年秋季，我们就在燕园上课。我是先认识经济系的赵迺抃教授，再通过赵迺抃教师认识周炳琳教授的。记得

两位教授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两层小楼，赵老师住在楼上，周老师住在楼下。

他们两位都已是五十多岁的长者，学生们尊称他们为周老、赵老。赵老师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周老师专治外国经济史。在我上学期间，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没有开课。所以我并没有听过他们讲课。

我认识赵老师在先，那时他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我们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我是里面的常客，没有课时，我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赵老师也经常去。由于阅览室里学生很少，所以赵老师去久了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个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就问我是几年级的，我说是刚入学的，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那天我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的书籍，我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老师很感兴趣，就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赵老师还把他家庭的地址告诉我，他住在东四十条的宿舍里，欢迎我到 he 家里去。但当时我没有机会认识周老师。

学校迁到西郊后，赵老师和周老师同住一栋小楼，楼上楼下。大约是1953年放寒假期间，有一天我去赵老师家，谈完后他对我说：“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这样，我下楼到了周先生家。那天，刚好周老师在家，师母魏璧老师也在，我就同两位老人畅谈起来了。周先生问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说我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

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读过哪些书。周老师很高兴，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那以后，直到我大学毕业，我每次到燕东园教授宿舍，都是先到赵老师家，再到周老师家。但周老师的社会活动多，所以有时没有见到周老师。赵老师和周老师两人的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北大图书馆没有，我常在两位老师家中借阅。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二

1955年我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周炳琳老师经常在一起了。

分配工作后，我第一次到周老师家里去时，他十分高兴，对我说：“我知道你俄文不错，已经翻译了几本俄文书出版，你帮我翻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又说：“如果时间富裕，你不妨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供教师们参考，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

从周老师家里出来后，我又到了赵迺抃老师家中。他知道我留在北大经济系当资料员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

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名份算个什么？”还说：“周先生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赵老师和周老师是几十年至交，周老师年龄稍长于赵老师，他们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终身难忘。

稍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教师和学生。于是我先把该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老师看。他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列入了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工作计划。全书40万字，我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全部译出，并交给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当时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还不深。

在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以前，对于拜占庭的兴亡我是不了解的。这一章的翻译过程也是我学习拜占庭经济史的过程。译完这一章后，我照例交给了周老师审阅。他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我时，他对我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

的了解。”我记住了周老师的指点，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于1957年初译完，交给了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了。稿费是归学校的，但我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结婚、安家和把我的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

三

紧接着展开了“反右”斗争。会议越来越多，教师都忙于开会。这段时间内，教师为了避免惹麻烦，串门的少多了。我也没有到赵老师和周老师的家中去看望他们。到了年底，北京大学的教师分批到北京门头沟区（当时称京西矿区）的农村下放劳动，1958年初出发。我是第一批下放的，整整一年在西斋堂村。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京大学校园。这时，北大经济系设立了编译组，我转到编译组工作，从事英文经济学资料的编译，有空就又到赵老师、周老师家中请教。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我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两地分居。我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此外还有弟弟厉以平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难。幸亏我还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起，我到两位老师家中去访谈时，题材已经不限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了。我们都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主要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

而是政策的失误所导致。周老师认为我人品可靠，所以在谈话中没有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认识是有限的，我只认识到这些都是政策失误的后果，而政策之所以失误，则是由于下情不能上达，甚至基层隐瞒实情，才导致政策制定出了偏差。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是经济体制的弊端所致。大约10年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四

1962年，周老师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匆匆赶到医院，那时他还能下床走走，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我的工作上来。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仍在研究外国经济史，并且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老师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今天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在1965年就译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开始了十年动乱，拖到1985年才出版。至于《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一书，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从事翻译了，况且马雍同学也已在1985年《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出版后不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到哪里去找一位互译互校

的同龄合作伙伴呢？

1963年周老师逝世。在追悼会上，我痛哭失声。师母魏璧老师握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从1963年到现在，已经47年了。魏璧老师也早已谢世。当年参加周老师追悼会的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中，不少人也先后离开了人间，但追悼会的情景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因为周老师是最早把我领上西方经济史研究道路的恩师。

1993年，周老师逝世30周年之际，我曾经以一首七绝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怀念和崇敬：

七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外国经济史一直是我的第一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

1988年起，我连续担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转入全国政协，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我的研究重点在这些年内一直是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证券法和资本市场、就业、民营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城镇化、贫困地区发展等等。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始终未中断。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



▲ 厉以宁教授

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上卷《希腊城邦制度》、下卷《希腊化时期》，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原载《百年潮》2010年08期

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于1921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过了6年的学生生活，又从1946年到1964年在北大过了18年的教员生活，若是把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7年的教学也算在内，则共有25年，因为在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南开、北大三校中，我是属于北大编制的。论时间，我作教员的时期比当学生的时期多三倍甚至四倍；论地点，当年在闹市中不连接的北大一院、二院、三院，更不能与盛称湖光塔影、饶有园林之美的如今的北大相比。



但我经常怀念的是在简陋的校舍里学习的那6年。因为那时，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的彼时彼地，便好象感到一种回味无穷的“乡愁”。

人们常说，北大有光荣的历史，实际上北大早期的历史（即京师大学堂时与改称北京大学后的初期）并不光荣，而是很腐败的。学校里不知学术为何物，学生到这里来只为取得将来作官的资格。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盛传它们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其腐败的情况可想而知了。至于北大发生质变，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则是从1917年蔡元培来北大任校长起始的。读蔡元培晚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二文，便会知道，蔡元培是怎样

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改造北京大学的。他来到北大，一步也不放松，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进行改革，北大也日新月异，逐渐显示出新的风貌。蔡元培的为人则蔼然可亲，从容不迫，从来不表现他有什么赫赫之功。他延聘的教师，有的革新，有的守旧，有的反对旧礼教，有的维护儒家正统，只要他们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听凭他们在课堂上讲授，何去何从，让学生判断，自由选择。不同主张的教师们尽管争辩得不可开交，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可是对于蔡元培，都是尊敬的。作为一个校长，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力量！所以不到两三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我并不怎么进步，却也怀着仰望的心情走进北大的校门。

我不记得胡适在什么地方引用过龚自珍《己亥杂诗》里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表现他自己的主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诗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北大的校风。龚自珍写《己

亥杂诗》时，正当鸦片战争的前夕。他看到国是日非，读书人只一味地学讲师承，文宗流派，这都无益于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唤人觉醒，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内，跟龚自珍的时期有些相似。反动的封建势力步步不肯退让，接连不断地演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人们的思想窒息，生活麻木，在阴暗而闭塞的屋子里，迫切需要打开窗子放进新鲜的空气。北京大学的变革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我刚到北大时，首先感到惊讶的是，我旧日对《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的撰稿者都很钦佩，如今其中有不少人名列在北大教师的队伍中。我顿时觉得北大真是气象万千，别有天地，从此可以亲聆那些人的教诲了。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个教授或讲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学生程门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诚。我个人在北大6年也从来不曾想过，认谁为业师，更谈不上我是谁的及门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知半解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北大开放了的风给我的。

我说—知半解，不是自谦之词，因为我北大毕业时，回顾自己的学业，并没有掌握了什么万能的治学方法，占有什么研究资料，只不过在课堂内或课堂外，关于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得到过一些启发，而作人与作文又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

蔡元培认为大学里应培养通才，学文史哲与社会科学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学自然科学要有文史知识，这样不至于囿于一隅。当时北大的预科分文理两部，课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安排的。后来我入本科德文系，同时也进修国文系的课程，得以中西比较，互相参照。蔡元培提倡美育，在学校里建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我有时听音乐演奏，参观书画展览，开拓了眼界。懂得一点艺术，接受一点审美教育，对于学习文学是有所裨益的。

我是德文系学生，在那里主要是学德语和德语文学知识。在思想上给我影响较多的是国文系的教师。鲁迅在北大国文系，每星期只上一节课，讲“中国小说史”。后来利用这一节的时间讲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关于鲁迅上课时的盛况，以及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教益，我在《笑谈虎尾记犹新》和《鲁迅与沉钟社》两篇回忆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不再重复了。但是我不能不从中抄录一句：“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我还记得鲁迅讲《苦闷的象征》，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他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屏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象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我喜欢诗，常去听讲诗的课。沈尹默擅长书法，也是诗人，我听他讲唐诗，他有时离开唐诗本文，谈他个人写诗的体验。有一次他谈青年时写诗，很象辛稼轩一首《采桑子》里所说的“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并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我听了这话，不禁反思，我曾在晚秋时跑到陶然亭，春雨中登上动物园的畅观楼，寻词觅句，说愁诉苦，我又何尝懂得人世间的愁苦！想到这里，我对于我本来就幼稚的诗产生了怀疑。我也听过黄晦闻讲汉魏乐府和六朝诗。黄晦闻是反对新文学的，但他治学严谨，为人耿介，他在他的《阮步兵咏怀诗注》的“自叙”里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一天上课，讲到鲍照的《代放歌行》，这诗为首的两句“蓼虫避葵藿，习苦不言非”，我不记得他是怎样讲解的了，我那时却很受感动。尽管有的注释家说蓼虫指的是小人，不理解旷士的“甜味”，我则宁愿为了自己所要做的工作，像渺小的蓼虫那样，不品尝人间“葵藿”，去过清苦的生活。

我读大学的时期，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北京时而死气沉沉，时而群魔乱舞，可是北大所在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则朝气蓬勃，另是一番景象。尤其是1924年至1926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周刊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地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 and 个别的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其中不少文章，提倡改革，无所忌惮地批评中国的社会和国民性。周作人介绍英国蔼理斯《性的心理研究》，分析道学家们的肮脏心理。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揭开了“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我从正反两面读这些刊物，进一步体会着道貌岸然的道德家与装腔作势的学者往往是靠不住的人物。可以说，不只是在教室内，更重要的是在教室外，构成了我思想的雏形，培育了我作人的态度和作文的风格。

除个别教师外，我很少听了某教师的课以后还登门请教。至于蔡元培，我在北大学习的6年内，他长期在国外，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在校办事，其余的时间都由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我一个普通学生和他更无缘相见，可是我无形中从他那里得到的感召和教益，如前所述，是终身难忘的。

另一方面，我在北大结识了几个朋友，我们志趣相投，哀乐与共，互想砥砺，交流读书心得，共同创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沉钟》。这刊物在当时热闹的文坛上默默无闻，却得到讲授“文学概论”的张凤举的支持，受到鲁迅的称赞。我从事文学工作，可以说是从这里起步的。近来阅读鲁迅的《华盖集》，在一篇题为《导师》的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



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回想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情况，跟鲁迅的教导是相符合的。

关于我的教师生活，不属于这篇文的范围，但我也想附带着说两句话。在我当教员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内，我常常想到孟轲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话见于《孟子·离娄章句上》，与上下文毫无联系，不知孟轲为什么冒出来那么一句。后来在《尽心章句下》里又读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才恍然大悟，这句话正好是那句话的说明。因此我也告诫自己，我自知赶不上贤者的昭昭，但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写于1988年1月11日，时为蔡元培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原载《北京大学》2016年6月4日微信公众号

毕业

北大，我行走一生的徽记

李晓丹（2012级哲学系）



7月5日，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哲学系2012级本科生李晓丹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讲述自己逐梦燕园的故事。以下为李晓丹发言全文：

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2012级本科生李晓丹。今天是我们一生中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日子，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个隆重的场合，和大家一起回忆逐梦燕园的旅程。

从小我们就觉得，北大是一个有光的地方。1403天前，在做出于成府路口向西走的决定后，我们走进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园子，开始一场青春的远行，又像是赴一场久候的约定——因为前方有一束光，等待接纳一个个懵懂而有梦的灵魂。

初入燕园的我们曾在图书馆数不清的书架前迷茫过，在百团大战纷飞的宣传单里踌躇过，在柏拉图的理念和洞穴比喻里困惑过——可是就像洞穴里的人挣扎走到洞穴之外看到了真正的太阳，北大的光始终陪伴、指引着我们

摸索前行的方向，照耀着每一个北大人，在诸多选择中发现最好的自己。

我们可以选择广厦万间，也可以选择乡村热土、祖国边陲；我们可以选择一群人的经世济民，也可以选择一个人的古生物学；我们可以选择为往圣继绝学，也可以选择为校园开通小黄车；我们甚至可以选择一片星空，在批判与质疑的喧闹中、在夜夜难眠的困苦中坚持自己的热爱……

北大给了我们最好的实现梦想的平台，这个神奇的园子给每个终将离开这里的人无限的可能性。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怀，让我们得以选择并坚持自己的热爱。我不禁想起哲学系李猛老师曾说的话，“四年，北大为每个人灵魂磨砺的，不是轻薄快利的刀刃，而是笨拙钝重的刀背，让青春那些锐利的理想，能够坚持成为一生的事业。成为一个北大人，有比‘命运毫无道理的眷顾’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坚守一生来完成。”

于我，这不仅是在哲学系研读经典的四年，在北大肆意青春的四年，也是在公益道路上砥砺前行四年。我是一名红丝带志愿者，2014年暑假，我和6个小伙伴第一次来到了安徽阜阳，为50多个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举办夏令营。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希望帮助孩子们实现一些愿望，其中一个6岁的小女孩认真地写下：“希望明天是我的生日。”

起初我有些不解，后来我们了解到，那里好多孩子不清楚自己究竟生在哪天，也从没度过生日，小女孩觉得那几天的活动是她最快乐

的时刻，所以希望“明天是我的生日”。我看着她期待的笑脸，眼泪却流个不停——没有什么能比那一刻让我明白我该如何存在。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被需要。被需要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责任——不仅仅要用爱心去呵护、关心、反歧视，北大人更要通过思考、调研和行动为他们现状的改变做出努力、贡献力量。

之后的两年，我和同学们三次去到阜阳，三次邀请孩子们来到北大，我们争取每个月都给孩子们写信，也总能从回信里了解到他们最近身体和生活的情况。我把在当地调研的情况和所思所感总结成了报告，为“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正是在一次次志愿行动中，我重拾了自信，坚定了把红丝带志愿服务当做毕生事业的决心，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在与北大作别的离歌终将唱起的时刻，回头看看来路，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明白了很多道理，认识了很多朋友。倘若多年以后，我们再去回想这段高歌理想、奋力耕耘、求知若渴的时光，我们与北大的独家记忆究竟是什么？

也许我们忘记了与习大大和克强师兄握的是左手还是右手，但一直铭记“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也许我们早已忘记如何用拉格朗日法求解斯勒茨基方程，但在其中养成的理性与逻辑思维让我们终身受益；也许我们早已忘记刑法考试中多重的人物设定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一直铭记对法律的尊重和正义的坚信；也许我们早已忘记为国家活动志愿服务的艰辛，但一直铭记天安门广场的一抹蓝、鸟巢里的一株绿；也许我们忘记了2012年末日前的狂欢，但一直铭记与小伙伴们惺惺相惜的友谊。

北大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知识和能力，更是价值和情怀。我们的情怀不是任何空大虚妄的梦想，而是努力窥探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怎样的细微病痛，并用我们的坚持和热爱去证明思想的价值。并且，我们真正盼望的是，有一天接触到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伤口时，可以有治愈它的决心和力量。

北大的光，不但在过去四年中引领我们，更是未来漫长一生中最坚定的支撑。当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炽热的心走出学校，面对社会，我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北大人。

忆往昔，少年意气，心系未名水；盼来归，铁肩道义，不负燕园情。

最后，真心地感谢养育我们的父母，教诲我们的师长，感谢要用一生去眷恋的北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这份感激！因为有你们，这里才是我们最好的北大，当下才是最好的年华！

谢谢大家！

李晓丹简介

李晓丹，哲学系2012级本科生，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团委副书记，哲学系系刊《共青苑》主编，北大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会长。

她多次组织北大校内师生无偿献血活动、急救培训活动、防治艾滋病与反歧视宣传志愿活动、女生同伴教育等，用爱融化着人们心中对艾滋病人的隔膜与歧视，并因在防艾志愿工作上的杰出努力得到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的称赞。她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参加刘延东副总理主持的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座谈会，为“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

李晓丹是2014年首届北京大学“学生年度人物”，连年荣获北京大学奔驰奖学金。她还荣获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红十字会优秀个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天府高层次人才”优秀个人一等奖等多项荣誉。她是无私奉献的的志愿者，是执着、勇敢、敬业的红丝带志愿服务项目开拓者，是北大青年学子的杰出代表。

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

邵峰（1991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6年7月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91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校友邵峰先生在北京大学201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作为校友代表致辞——

今天能在同学们人生最重要的一刻回到母校，庆祝你们成功完成学业，分享你们的喜悦和辉煌，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24年前，青涩的我有幸踏进了美丽的燕园，在这里学习了知识，开拓了视野，结识了朋友；母校的历史沉积和独特的环境氛围也培养了我独立思考、追求卓越的品质，这些都使我受用一生，在此，我也向母校说一声感谢！

接受了毕业典礼讲话邀请后，我首先感到很荣幸，但随之而来的是紧张和困惑，不知道到底该讲什么。同学和朋友也给出了各种建议和考虑：同学们是否喜欢？会有多少掌声？能否抓人眼球？网上点击率会怎样？我感到无所适从。冷静思考后，我回归到了原点，回归到了这件事的本质，这个讲话的根本目的应该是

服务于在座的学弟学妹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的讲话，无论是否妙语连珠，激情澎湃，但只要对你们，甚至是你们中的极少数人，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道路上，哪怕能有一点点的帮助，就足够了，其他任何考虑其实都不重要。这正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同学分享

内容的核心，就是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

20年前的我，和你们现在一样，对前途既有憧憬，但也充满忧虑，在各种选择面前不知如何决断，彷徨和犹豫。因此，我觉得应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做出各种不同选择时的想法和驱动力。

大学毕业时，我给自己规划将来做一个大学老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做这个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知道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有定力和钻研精神，主动学习能力很强。既然决定做科研，作为北大人，我们当然要努力去做最优秀和最重要的研究。于是我决定离开化学，转行生物。做这个选择基于的考虑也很简单，作为人类，我们对自己生命活动的本质和对健康的追求一定是永恒的，但我们对这些却知之甚少，所以我认定，生物医学，相对于化学，应该更能够给我提供做出重要有影响力研究的空间。我当时的第二点考虑也很纯朴甚至天真，不管生命现象如何复杂，但最底层一定是各种化学分子的相互作用，所以作

为化学背景的我进入生物学研究，也应该有一些优势。

回想起来，当初这些朴素的、接近事物本质的想法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今天在生物医学研究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

在后来的发展中，我不断地、逐渐地朝着做和疾病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这个方向努力和前进，就像爬楼梯一样，不断学习和积累，扎实地迈向一个又一个台阶。大学毕业后，我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学习了生物物理和蛋白质结构，在密西根大学做博士研究期间我转向了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2005年回国后，我带领自己的团队先是建成了病原细菌感染的遗传研究体系，后来又拓宽至分子免疫学及相关疾病动物模型研究。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循序渐进的积累，我完成了从一个化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一个感染与免疫研究的领导者的成功转变。

回顾过去20年的职业发展经历，其中有被动的坚持，但更多地是自己主动甚至可以说固执的坚持。我坚持了最初的自我判断和事业选择；坚持做最优秀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坚持向疾病相关的基础医学研究方向不断拓展；坚持不投机、循序渐进和一步一个脚印。

当然，坚持也就意味着在众多选择或者是诱惑面前有所放弃。

我也有过多次放弃，我放弃了在生物物理所继续做一年即可拿到博士学位的机会；在密西根大学，我拒绝了两个强烈挽留并可以让我顺利博士毕业的优秀教授，而选择了一个不确定能否毕业但研究方向更符合我的目标的实验室；后来我放弃了留在美国，选择回到中国继续自己的研究，几年前我还将实验室的研究重心从已经做到国际领先的细菌感染方向转到了没有任何基础和并不熟悉的免疫学。这些放弃或是大胆的调整，都是由我想坚持的原则和目标所驱使，回想起来也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骄傲。其实，我的这些选择和放弃都是基于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判断，即简单又纯粹。

我也曾经做出或者差一点做出错误的选择。在国外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由于课题进展不顺，我差点就放弃了科研，而转行读生物统计的硕士。想放弃的原因不是我不想做研究了，而是我当时太急于求成，太害怕失败了。在选择博士后实验室时，我做了大量的调研，复杂地考虑，各方面反复权衡，但最终却还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差一点毁了我的学术前途。究其原因，就是在博士研究非常成功后，我渴望继续成功，担心失败，从而不再把科学研究内容作为选择的最重要依据，而完全受安全感和功利心所驱使。

同学们，和前人相比，你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加开放和自由，但也更加浮躁和急功近利。在大量有价值没价值的信息以及各种干扰和诱惑面前，你们也可能很容易迷茫、不知所措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作为学长，我想提醒你们的是，抓住事物的本质，排除干扰，做最简单合理的推断，你们就更有可能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事实上，最简单的、最纯粹的往往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持久永恒的。

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自己，这也应该是做人做事的指导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忘记自己的初衷，忘记自己的本职，忘记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忘记和迷失，我们不再遵循努力付出才有回报，总想走捷径或者故意绕弯子，从而把人和事弄得很复杂，导致

自己很纠结甚至痛苦，周围的人感到无所适从，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乱象丛生，是非观和价值观不清。同学们，回归根本，做一个简单纯粹的人，我相信这将有助于你们的成长，也会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有序和健康。

作为北大人，你们是天之骄子，有一种固有的骄傲，喜欢追求自我，这些甚至会使你们有些不那么合群，但我希望你们能保持这种骄傲，因为她也是一种压力和动力，会提升你的境界，使你变得更为完善和优秀。

最后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决定我来做这个讲话的另一个原因。在收到邀请后，我和跟我一样不善言谈甚至讨厌公开讲话的、不到10岁的儿子说，我不想来做这个讲话，但他却跟我说：“不，你应该接受邀请来讲话”。我吃惊

地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你是北大毕业的！

我突然发现这位就读于北大附小四年级的小北大人已经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作为老北大人，我感到羞愧也为他感到骄傲。他今天还主动要求来到了现场，来感受母校和同学们的成功和喜悦。说到这儿，我也希望同学们永远做一个骄傲的、有责任感的北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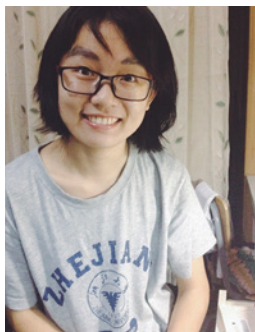
最后，再次祝贺同学们顺利完成北京大学的学业，也衷心祝愿你们一生简单纯粹、幸福有成。

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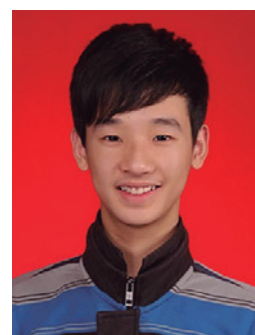
原载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那些年，青春正好



方若素



孙儒傲



万鹏程



李莹



带着希冀努力念书进入燕园。时间慢慢流逝，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成长，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离开。回头看看，如今的我们离我们最初的梦想，离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还有多远？也许我们已经比想象中变得更好，比如少了一份青涩，多了一份稳重！我们青春正好，我们创造并且拥抱着诸多可能。

我们的收获也许从不限于男神女神的蜕变史，也许还有更多，比如友谊。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的时候我们就拥抱着同样的梦想，来到燕园，万余人的同一级同学中，我们却可以遇见彼此，也许这就是缘分。我们青春正好，我们用心经营属于自己的缘分。

当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园子，我们也将带着北大教会我们的东西，继续前行，就像校长在毕业典礼中说的那样，“当你们将要从燕园走向世界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自己，北大人的一生都是努力使这个世界朝着好的、向上的、光明的方向发展。”北大的校友们这些年也一直都在让自己也让周围变得更好！

左图为上大学时与本科毕业后的对比照



挥手告别之前，赴一场青春盛宴

7月2日晚，北京大学2016年毕业生晚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隆重举行。时光流转，韶光易逝。燕园如旧，人影匆匆。勿伤离别，在你我挥手告别之前，赴一场青春盛宴。

毕业晚会在形式编排上力求创新，改变了以往主持人报幕的传统形式，邀请7位在不同领域获得优异成果的毕业生代表作为节目串讲人，用他们的北大故事将整场晚会连接起来。

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本科生邓君蕊演唱的歌曲《老楼》描绘着燕园内风物的变迁与时光的流逝，将北大学子对燕园的深深眷恋娓娓道来。

小品《征友》以校园BBS网络征友的故事为主线，让观众在欢笑中回忆起往昔的欢乐时光。

历史学系2012级本科生宋宛儒实现了让父母现场看一次自己演出的毕业心愿，弥足珍贵的亲情让一家三口难以抑制住激动的泪水，幸福温馨的场景也令全场观众动容。

在晚会的尾声，国标舞蹈《此间记忆》以多幕剧的形式，呈现出一届学生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合影挥别的全部历程。原创歌曲《永远》和《青春大概》则表达出学子们对青春的不舍与怀念。

最后，合唱团带领全场观众一同唱响《燕园情》，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晚会也在“毕业快乐”的祝福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屠呦呦为北大捐赠百万元

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2016年12月25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医校友会会长柯杨，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医学部副主任肖渊、药学院党委书记徐萍等一行16人来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教授家中，共同见证屠呦呦校友捐资设立的“北京大学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签约。

为支持母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优秀的医药卫生人才，激励医学部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鼓励医药卫生领域中青年教师不断进取、追求卓越，屠呦呦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100万元，设立“北京大学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

尽管腰不好，为了便于签约，屠呦呦还是坐到了茶几旁的沙发上，像小学生一样，一笔

一划地在捐赠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柯杨代表北京大学、詹启敏代表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捐资协议上签字。

屠呦呦一再表示，我有今天的成绩，要感谢母校的培养。我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是学校和老师

们培养了我，我要感谢学校、感谢老师。刘玉村代表医学部向屠呦呦老师颁发了证书。他说：“屠老师设立的这个基金，一定会激励我们的学生、中青年科研人员，积极进取，做出优异成绩。”在现场，韩启德将其墨宝“德音孔昭，示我周行”的题词送给了屠呦呦，他解释此句引自诗经“小雅·鹿鸣”。此诗也是屠呦呦名字的出处。

稿件来源：北京大学医学部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将自己题写的书法赠送给屠呦呦校友

马宗明、汪璐两校友荣获2016年斯隆奖

美国时间2月23日，艾尔弗·斯隆基金会(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公布了2016年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获奖名单，共有17位华人获此殊荣，其中有两位是北大校友，他们是马宗明和汪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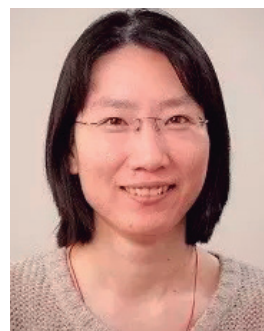
斯隆研究奖由美国斯隆基金会于1955年设

立，每年颁发。主要奖励物理学、化学和数学领域的杰出青年，以向这些“早期职业科学家和学者提供支持和认可”。本届获奖者共126名，虽然奖金数额只有5万美元，但该奖项自设立以来共产生了43位诺贝尔奖获奖者，16位菲尔茨奖获奖者，以及众多杰出人才。



马宗明

2005年获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自2010年至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统计学专业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维统计学推理，非参数统计，网络数据分析等。曾获2014年美国科学基金会职业成就奖(NSF CAREER Award)。



汪璐

2006年获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201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学位。目前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学系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几何分析与几何偏微分方程，特定几何流，极小曲面，调和映射和最小-最大理论等。曾获AMS-Simons Travel Grant (2012-2014)；Chapman Fellowship,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014-2016) 等奖项。

文章来源：知社学术圈微信公众号(zhishexueshuquan)

梁晓晖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称号



2016年6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评选出的第一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SDG Pioneers)，北大校友梁晓晖成为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称号意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长期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杰出人士。本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人物”共有10名，分别来自巴西、埃及、美国、中国等9个国家。

原载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一个月竟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

在她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个沙发的客人。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

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重重的努力”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13号楼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

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

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



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

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多年的交往中，马石庄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

北大走出的电影追梦人

卢媛媛

初次见面，是在北大学五食堂前的那个路口。黑色羽绒服和米白色圆领毛衣衬托着罗媛元精致的五官，没有围巾，没有首饰，简单干练。

午后在约好的咖啡厅里，一杯温热的牛奶，一杯浓缩宝石蓝咖啡。她笑着说，这样的忙里偷闲着实不易。

父母|陪伴

“儿子，快起床”，刚被闹钟惊醒的父亲边起床边顺手将枕头丢向儿子，“要不然该迟到啦！”一辆出租，一根油条，一对父子，满满的爱在空气里溢满香气。这是微电影《一次离别》中的一个场景，谈不上感人，却爱意满满。

2015年，《一次离别》开始筹备拍摄，罗媛元担任这部微电影的导演、编剧和剪辑。2016年2月2日，《一次离别》微电影正式在全网开播。但没有人知道，这部微电影从着手剧本编写到最后成片面世，她筹备了将近6年。

《一次离别》不负众望，在国内外各大微电影节上崭露头角，2015年12月，一举斩获第七届欧洲万象国际电影节最佳微电影、最佳新锐导演两项大奖；第五届北京国际微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国际微电影节（杭州）最佳配角奖，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男主角提名奖，并成为第十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参展作品。

罗媛元说：“虽然是微电影，但我们的团队是拿出了做院线电影的态度。”用主演宋楚炎的话来讲：“我们想说的话太多，但真的能表达的东西又太少，有遗憾”。《一次离别》是他们凭借着自身实力打造出的优质作品。

每年都会忙碌，但今年却有些不同，因为这是追逐梦想的过程。《一次离别》是一次父亲



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

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3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在她90多岁的时候，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原载2016年1月13日《中国青年报》，本文有删节

人物简介

李佩，江苏镇江人，1917年12月20日出生在北京。中学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93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2017年1月12日1时26分，李佩先生在京去世，享年99岁。

和儿子“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长情告白，同样也是罗媛元对父母的告白。

她回忆2011年写《一次离别》剧本时，每到傍晚时分，厨房里都会传来菜下油锅的刺啦声。窗外露出了北京的一角天空，夕阳西下，几段树枝映着余晖微微摇曳。母亲喊着“饭做好了，别过来，我给你端去。”说罢一托盘的菜品就摆上了书桌。“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了，这种亏欠只能用自己的大电影梦填补了”。罗媛元说。

北大|记忆

记得第一次见面谈到北大经历时，罗媛元的大脑似乎显得有些空白。整整7年的北大时光，好像与她没什么特别的关联。

后来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我好像又恢复记忆了”。

“现在29楼拆掉了，不知道那个顶着球的民主科学塑像还在不在？”29楼仿佛装满了大学生涯的所有回忆。就在29楼拆掉的前几天，她特地回到北大，又坐在雕塑前的那个花坛看了许久，想起了以前经常拎着洗澡筐穿着拖鞋走进宿舍的样子，想起了以前在楼下腻歪忘记了时间被蚊子叮得满腿包的样子，想起了楼门口每到春天都会盛开的两棵好看的玉兰花……回忆开始清晰。

罗媛元2005年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从本科到硕士，经历了7年北大时光，总有一些经历让人终身难忘。

“刚到北大那年，读的电影专业很难满足我对北大的想象，所以后来又选择了一个哲学双学位去读。还记得有个专业必修课是张祥龙老师的《哲学概论》，作业是让学生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然后写篇论文。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每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感觉。”

为了写论文她半夜混进勺园找自习室，找

了好久才在勺园找到一间。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到后半夜，短短十几页文字，耗了几个小时也没看进去多少。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她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醒过来的时候，好像做了一场和康德有关的梦。”

抻了抻已经酸痛无比的腰，揉揉眼抬头一看，“妈呀，太惊悚了，就剩我一个人。”不知是被吓得还是怎么的，当再次拿起书，突然间就全懂了，一下子思如泉涌奋笔疾书。“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经历，就在那天早上我读懂了康德。”后来跟老师交流这个问题时，老师对她说：“你读懂了康德，哦，那一定是幻觉吧……”

说到与电影的渊源，李苗师姐功不可没。当时李苗师姐是北大影视编导专业的学生。师姐的一句“你也试试”，让她有了尝试一把的欲望，这一尝试让她彻底“沦陷”了。

从大一选择影视编导专业起，罗媛元便迷上电影。跟电影所有相关的专业课、公共课、选修课她从头听到尾。直到后来进八一电影制片厂才渐渐领悟到，学校读再多的书都不如经历一次轰轰烈烈的电影梦来的实在。

刚到八一厂，像所有刚出道的导演系学生一样，罗媛元被分到场记组。虽然曾经涉猎过很多东西，但一上手还是被片场导演狠狠打击了一番：“我去，你怎么这样业余！”

在八一厂做场记那会儿的“囧”事，她说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好笑。做场记时每个场记都有一个箱子，但箱子里大部分东西她都不知道用处。

“比如说秒表，我纳闷了很久，这个秒表到底是做什么的？后来还好有一个场记带我，他说这是掐时间用的，只要镜头稍长一些你就要用秒表记下来。当时我还傻傻的反问，‘为什么要掐时间呢，摄像机上不是有监视器吗，监视器上不是有时间码吗……’”然后就是尴尬的四目相视。

虽然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技术环节

的错误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她得出结论，“你不在这个环境中实践就根本学不到东西。”再好的电影教育都抵不上满世界跑片场学的多。

启蒙|重生

“我是个女孩儿，我豁不出去；我家里没有做这个事情的，我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她内心深处，还是对这个职业选择有些疑惑。而扭转这个思想的人，是她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武林外传》导演尚敬。

1984年，尚敬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1994年，尚敬在参加完中央电视台第二届小品大赛之后被招入空军政治部话剧团，从此开始了喜剧小品创作生涯。可真正被大家熟知，应该是2005年和宁财神合作执导了章回体古装喜剧《武林外传》。

尚敬拍摄是追求极端杂糅的品质，涵盖了流行歌曲、综艺、网络词汇等五花八门的内容，就是这样多元化的导演风格让罗媛元对他非常感兴趣。就在罗媛元研究生实习阶段，她毫不犹豫的选择进入尚敬剧组，“哪怕是扫地也得去”。

“尚敬并不像是拍了那么多喜剧的腕儿，他也有非常‘静’的一面，而且在剧组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让平时嘴皮子利索的罗媛元有了“可乘之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和尚敬“混熟了”。

一次偶然机会，她和尚敬坐在片场聊天，当聊到导演这个职业时，尚敬问她为什么会选择导演这个职业，这时罗媛元就把憋在心里五六年的苦水一股脑倒了出来。

“我是不是该转行，我没有任何优势，我什么都没有，对电影一知半解……”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尚敬就问道，“你站在电影片场兴奋吗？”她点点头。

尚敬继续问道“那你坐在剪辑台上兴奋吗？”罗媛元又点了点头。

“那你还在疑惑什么呢？”尚敬跟她讲了自己年轻时北漂的经历，讲到他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但真的走到那一步才发现，其实除了导演这个活法，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能让自己活的这么精彩。从《炊事班的故事》到《武林外传》，再到《三枪拍案惊奇》和电影版《武林外传》，尚敬这些年在喜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收获不薄。但是，谁又注意到他早年遇到过的波折。一开始拍了很多严肃型的作品，可是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后来的喜剧风格才被观众认可。“有些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过了这个坎儿你就知道，那时候的想法都是多余的，自己的方向得自己找。”

这或许是同类人的相遇，或许是相似的经历，更或许是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有人推了一把，那个人可能就是尚敬。

在她执意进入电影行业前，几乎身边所有人都会劝她不要沾染这个圈子，有朋友甚至对她说：“你会没有工作，你会没有前途，你会像个男人婆，所有人都会嫌弃你，你会抽着烟像个女痞子，你会夜不能寐，会变的神经不正常……”

但事实证明，罗媛元是为电影而生的。任何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会用符合自己的节奏走下去。“只要是我喜欢干的事情我都会非常有激情的做下去。”罗媛元有着自己的准备和坚持。

“每一个7年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这些年的改变让自己震惊。”罗媛元的眼睛发亮。“可能是星座上升了，我是天秤座的，以前的自己好像什么都是无所谓，现在不行，我要什么，就一定要去做。”她越发的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由度更大、变化更丰富的工作——导演。

原载北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天上军营”里的北大国防生

李少峰 贾清召 全永涛



在同学眼里，他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国防生；在家人眼里，他是个“倔强”的孩子；在女友眼里，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在领导眼里，他是个得力的好助手。他就是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62218部队唐古拉山兵站的“暖神”副教导员李金柏。

稀疏泛黄的头发，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操着一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满脸的高原红，肩扛“一杠三星”。初见李金柏，我们不难想象出这个本是北大高材生的汉子在青藏高原上3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多少的沧桑。在面临分配选择的时候，李金柏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了远离家乡、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他要支援大西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在他金黄色的肩章上扛着太多的责任和荣誉，李金柏早在2004年7月上高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9月以国防生的身份进入北医

预防医学专业学习，2009年6月入伍。毕业后，他志愿申请到祖国艰苦边远的地方建功立业。2010年6月，他被评为“优秀任职培训干部”，2012年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干部”，同年10月，李金柏作为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和原总后优秀大学生干部，参加北京大学医学部“百年庆典”活动，并接受了相关媒体采访。2014年3月他荣立三等功一次。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默默的耕耘和无悔的付出。

接受来自“云端的挑战”

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李金柏刚一上到海拔5000多米高原就病倒了。“既然选择了高原，选择了奉献，再苦再累也要坚持走下去。”李金柏并没有被这当头一棒吓倒，而是在病情好转后，重新振作精神，不断激励自己一定要在这里扎根，干出一番事业。当时正是兵站接待汽

车部队的中心任务期间，一茬一茬的汽车兵轮流住进了唐古拉山兵站，平时沉寂的兵站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许多。为了帮助战友分担保障任务，第二天他就拖着仍有高原反应的身体走进了一班配菜间，不会切菜就帮忙削土豆皮，不会炒菜就帮忙清洗碗筷，他尽着自己最大努力为官兵分担着工作。他说，看到汽车部队能够在这么高的地方吃到可口的蔬菜，哪怕再病一次也值得了。

这一年的夏训期间，大部分山上兵站的官兵到山下的格尔木参加夏季阅兵训练，兵站只有一部分留守人员，而此时兵站却接到命令需要接待上千人的某集团军驻训部队，这样的情况在以往并不多见。李金柏意识到了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勇挑重担，积极动员留守的仅仅10名官兵，合理分配和开展工作。大家在他的带领下工作热情都很高涨，而李金柏更是哪里工作任务重便去哪里。那一晚，兵站所有人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半才将第二天需要的主食、菜肴调配出来。安排官兵休息后，他又独自一人把大家准备好的食材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任何差错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自己的卧室，躺下后又久久不能入睡，因为他还得筹划隔日的接待事宜。那一晚战友们鼾声阵阵，而他却一夜未眠。



“菜鸟”变“暖神”

青藏线上除了缺氧、缺雨之外，就是缺绿色。处于“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兵站是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兵站，气候酷寒，山上积雪终年不化，这里的自然景物中极其缺少绿色。常年驻守在雪域高原的天路官兵对绿色的渴望、爱恋、守护，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让这天宇之地多增一些自然的绿色，李金柏多方面查找资料和文献，寻找合适的方法为兵站官兵培育自己的绿色植物，这也是唐古拉山兵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老传统。他在附近武警的温室蔬菜大棚里育苗、从格尔木带熟土上唐古拉、在室内栽种盆栽……

终于，在李金柏带领其他官兵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后，唐古拉山兵站里长出了少见的绿色。在这里呆过的“老高原”们都知道，绿色对于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驻守在山上的官兵们更像是喂养婴儿一样精心呵护着这里的每一点绿。

当所有官兵在感叹这“云端”绿色的时候，他们对李金柏的敬佩之情更是难以掩饰，他们说：“有副教在，我们终于也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绿色的‘海洋’了。”唐古拉空气稀薄，植被的花叶容易发蔫儿，他就发动官兵在草场上去捡拾羊粪，自己出钱购买维生素，为仅有的绿色补充养分。在全站官兵的精心呵护下，这里的植物个个长得绿油油，花开的红火。

李金柏带给兵站的“绿色”还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身储存的知识，在唐古拉建立了特色的“绿色”文化。李金柏让官兵将一些名言警句和优美的诗词写在小纸条上挂在自己的绿色盆栽上，每一段时间把盆栽拿出来评比，互相交流养花心得，互相学习自己的

诗词警句。每逢节假日，李金柏就组织官兵进行简单的文体活动小比赛，为获胜的战友颁发小奖品。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接待间隙，组织官兵在营区用石头摆出“能打仗 打胜仗”的宣传标语。

和官兵互动多了，走得近了，官兵就喜欢和他交流沟通，一遇到什么烦心事，就找他谈心。李金柏也总是利用自己大学期间学习到的知识，幽默轻松地把一些问题解释清楚，这也让他在高原上有了“暖神”的称呼。

高原兵的爱情

高原不仅有特殊的苦，还有特别的爱。

李金柏和女友本来是让身边所有人心生羡慕的幸福一对儿。可是自从他来到高原、来到青藏线、来到唐古拉，他们的关系便开始出现了裂痕。

因为繁重的保障任务需要，他长时间坚守在这里，聚少离多的现状让本来恩爱的小两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在李金柏准备给她一个家的承诺时，部队接待任务却异常繁忙，李金柏考虑再三，决定推掉早已定好的婚期。

这样一来，他的女友积压在心里的种种委屈彻底迸发了，“一定要分手”，这是她给李金柏的答复。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李金柏默默地承受了，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解释都是苍白的。安慰一番后，李金柏又毅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没过多久，女友就瞒着他到了格尔木，一到目的地，她就彻底惊呆了。上山的当天，她头疼得整夜合不上眼，愁眉苦脸地盯着天花板，她沉默了很久，考虑了很久。后来，她哭了。再后来，她向他彻底“妥协”了。

临别时，她对李金柏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结婚，我都等你。”一个坚强的汉子，在女友说出这句话之后竟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像一个孩子。是的，李金柏需要发泄。女友的那句话让他像吃了“定心丸”，他终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尽情在这片热爱的青藏高原上挥洒汗水了。

青藏线的艰苦，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只有那些像李金柏，像千千万万个曾经戍守和牺牲在这里的“老高原”战士一样经历过的人，才真正懂得高原的苦与乐。

2000公里青藏线是辛酸的，又是神圣的，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青藏线军人在这里燃烧青春，释放能量。青藏线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一代代西部军人的血脉里。

这其中的感情，正如薛西语写的歌词：“为你做的梦，飞进最美的天涯；那无垠的蓝色就是你我的神话；唐古拉，我的爱人啊；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她”。

原载 2016年3月8日《中国军视网》

呼唤郭川，致敬英雄

杨悦笙

“中国航海第一人郭川”，在挑战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创记录航行中，于2016年10月25日15时30分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郭川团队、亲友、中国驻外使馆以及国际社会各方力量第一时间开展了搜救，但至今“船长”依然生死未卜。

2016年11月26日，郭川失联32天之后，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96级MBA校友发起、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MBA校友会、光华管理学院MBA项目等机构联合主办的“呼唤郭川”专题分享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郭川的亲属、其北航的校友、北大的校友以及部分媒体记者，一起回顾了与郭川相处的日子，他们呼唤“船长”能够平安归来，呼唤社会各界认识一个真实的郭川，也呼唤中国涌现出千千万万个“郭川”。



亲友们对郭川还有一个一致的印象——爱国，在他每次航海中，五星红旗一定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前中国奥帆委副秘书长朱悦涛讲述了一个细节：2009年6月，沃尔沃帆船赛组委会在圣彼得堡举行颁奖晚会时，郭川荣获“最佳媒体船员奖”，在郭川上台的瞬间，会场四周的大屏幕上全被郭川舞动着五星红旗的画面

覆盖了，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亲友们回忆起近十年来郭川获得的多次重要国际奖项、创纪录，每次都使得欧美各传统航海大国的选手、观众由衷惊喜：哦——中国人！甚至这次郭川失联后，欧美媒体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不少还作为头条推送，可见郭川作为中国航海家在海外的影响。郭川的表姐

据郭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时的同学郝广奇回忆，大学时的郭川是一个不太愿意说话的男生，但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郝广奇谈起大学时和郭川一起突发奇想卖牛奶“创业”的经历，认为“当年很多人不会去做的事，但只要郭川觉得有价值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去把它做成”。

孙萍说：“郭川作为草根，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用他这艘船讲好了‘中国故事’”。

英国著名探险家马洛里在回答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说过一句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郭川在2013年曾解释过“为什么要去航海”这一问题时说：“类似于问登山者，他们会说‘因为山就在那里’，你去问一个老外为什么航海，他会说‘这是我整个人生，我没法回答你’……当你在海上遇到风暴，你通过思考和操作去征服它，真的能产生一种快感，而且能使人上瘾。”

郭川妻子肖莉在哽咽中分享了郭川航行的三个愿望：让周围的朋友团结起来帮助自己；所有的人都能关注到自己的航行；分享自己的快乐让家人幸福。

提到郭川回来的可能，肖莉脸上又充满了希望：“我在等待着这个1%的可能，我们全家人包括所有的朋友们都在为这1%做着99%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为郭川聚在一起这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郭川很愿意为我们分享，他知道我们大家需要他，他一定会回来的。”

以下文字选自“呼唤郭川”主题分享会上的嘉宾发言：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是用来向往却又接触不到的，郭川便是其中一位。世界上已经有超过5000人次登上过珠穆朗玛峰，有超过500人次登上过太空，而完成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人却不超过200人，完成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人更只有一个，那就是郭川！单人驾驶这样一艘帆船航行，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从来不乏危险。

郭川的出现，回应了国家和时代的呼唤，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完美的弥补了我们的遗憾，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标志之一。

——北大校友会秘书长 李宇宁

英雄必然有其时代契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核心是精神的复兴、文化的复兴，“郭川现象”已超越了传统价值观。诚如郭川所言，

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进步会像物质上的增长速度一样快，也希望我的所作所为能激励更多的中国人，走向海洋，勇于冒险，不要輕易被安逸的生活所困，让我们共同努力，重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一志所向，不折不返”写就郭川校友的传奇，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共同期待郭川校友归航，续写传奇！

——北京大学MBA校友会会长 潘忠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有仰望天空，需要有面向大海、眺望大海的人，郭川做到了。郭川突破了国人对体育的定义，赋予了体育以新含义，他以40英尺的单人帆船、无动力、不间断环球航行，这样探索求知又不带任何功利的精神，给体育带来了一种大格局、大视野。体育不能仅仅局限在金牌，局限在胜负里边，体育里面有更高的境界，有更大的格局。

郭川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外表却非常谦卑的人，他让我们重新定义我们的人生。学历、学位、职务、住房……这些我们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郭川都曾经有过，但他最后都放弃了，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需要的英雄。

——新华社体育部主任 许基仁

如果说一定要问郭川航海有什么意义，这意义或许就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拓展精神，一段不断谋求超越的进取精神，一种敢为人先引领潮流的创新精神。如果人类没有这样的精神，一定还在茹毛饮血，如果我们觉得郭川们没有意义，人类就会止步当下再无任何进步。

——《中华英才》杂志副总编 高蓓

如果说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象征着国家在那个时候国力的强盛，今天郭川凭借一人之力，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到了，这也象征着人性的苏醒，追求自由，追求梦想。

——光华96级MBA、船级社江苏分社 范强

这个社会追捧脂粉气、娘炮、小鲜肉，但是我们这样的英雄，郭川这样的人物，中国历

史上都实为罕见，却没有得到大众的欢呼和喝彩，我觉得挺可悲的，所以这是媒体的责任。你怎么评价郭川，就折射出你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所以在这里，在呼唤郭川的同时，我也想呼唤一下社会的良知，呼唤一下中国真正的五千年以来的真正的男子硬汉的气概。

——新华社体育记者 杨明

沃尔沃帆船比赛中，他算是一个初学的航海的小学生，要跟世界冠军同船竞技，而且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压力非常大，患了抑郁症，可是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恢复了一大半的情绪重新走出去了！他的执着和毅力成就了他。

——郭川亲友 孙萍

郭川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通过他的航海事业，去一门心思去专心致志去科学的计划的周密的去完美的实现他的目标，再没有任何企图目的。这么多年我伴随着跟郭川一路走来，在宣传推广上，在社会赞助上，方方面面



郭川简介

郭川，男，1965年1月出生于山东青岛。1989年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1998年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学位。曾参与过国际商业卫星的发射。失联前为职业竞技帆船赛手。作为“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郭川在国际知名帆船赛事中获得诸多“第一”，如“第一位完成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亚洲人”、“第一位单人

帆船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中国人”等。

2012年11月18日，郭川开启“单人不间断帆船环球航行”之旅，经历了海上近138天、超过21600哩的艰苦航行，于2013年4月5日上午8时左右驾驶“青岛号”帆船荣归母港青岛，成为第一个成就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伟业的中国人，同时创造国际帆联认可的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2013年4月5日被青岛市政府授予“帆船之都形象大使”荣誉称号。

本文综合自中国西藏网、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

创业说

既然选择了前方 必定风雨兼程

——记上海宇昂水性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



(一)

王宇，70后，出生于湖北襄阳，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和上海大学，现为上海宇昂水性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成为北大创业训练营第四期学员。

第一次见到王宇，不太能把他与企业家的身份联系起来，他飘逸的发型以及出版的两册诗集，倒更像是一名艺术家或文学家。在他创业10周年之际，曾写了一首小诗：“十载磨一剑，依稀露青芒，寰宇谁与共，沧海我为王”。短短20个字，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霸气。

作为公司的创始人，王宇专注于他的专业——水溶性高分子领域的研发、生产及应用。

水溶性高分子听着特别“高大上”，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如化妆品广告宣传的

“保湿因子”、“锁水因子”、“美白精华”等，都需要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完成；在医药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的药品，只需3天服用1次，1次1片，也是使用了水溶性高分子材料让药性缓慢释放；很多国家自来水可直接饮用，也是使用了膜过滤技术，该技术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水溶性高分子……

水溶性高分子是一种特殊的可以溶于水的高分子材料，它本身最大的特点是无毒无害，绿色环保，而且可以自然降解，不仅能够替代现有的一些有污染材料，如石油化学衍生物，还能够治理它们的污染，在医药、化妆品、水处理、页岩气、3D打印材料等新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2016年7月17日，得知武汉遭遇暴雨，王宇调拨了价值12.7万元的水溶性消毒液，连夜送到武汉，发放给一线救灾人员。“用水溶性消毒液清洗伤口没有刺激性，二次感染率也较低”。

目前，水溶性高分子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的发展对能源生产、环境保护、循环经济都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成为水溶性高分子的生产大国，并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10年前，王宇准备投身这一领域的时候，中国在水溶性高分子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二)

据了解，2005年初，王宇放弃在斯坦福读书的打算，毅然回国创立了宇昂科技。从公司创立之初他就立下了一个愿景：要做中国水溶

性高分子的航母企业，立志和德国的巴斯夫，美国的ISP公司同台竞争。

当时，对于王宇的创业选择，他身边的许多人都不太理解。王宇则用自己写的一首词回答了这些朋友：“激昂如斯，英雄天涯自沦落。从来壮志未酬，何须书生意气，韶华忍蹉跎。借得青云力，换得旧河山。”

旧河山指的就是水溶性高分子领域几乎已被德国和美国瓜分殆尽的现状。尽管中国在这个领域才刚刚起步，王宇的目标则是要让中国的水溶性高分子发展为世界第一，能够与与德国的巴斯夫、美国的ISP这些行业顶级企业同台竞争，让这个绿色环保的材料更好地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

仅有诗人的豪情壮志，并不能让中国摆脱在该行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但王宇还有着深厚的专业学科背景，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跟着学科带头人严瑞瑄教授研究水溶性高分子的他，在这个领域的天赋和刻苦，让他自信会取得成功。

王宇依靠自己的学术背景，以现有的资源为基础，一边做贸易一边做研发，滚雪球式的发展积累。随着经验和客户的慢慢积累，到2008年上半年公司的经营才开始有了点起色，但此时危机却不期而至。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扩大，几乎波及到了全球，王宇的企业也自然受到影响。当时美元贬值得很厉害，从8.2贬值到7点多，跌幅达20%，这对一个小型出口企业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加上国外公司取消的订单，王宇的公司一下子损失了百余万美元。

为了应对危机，王宇奔波于欧洲、美洲与澳洲的客户之间，几乎马不停蹄。在去澳洲的时候，王宇感到喉咙剧痛，进而引发全身难受，但王宇没时间休息。企业、伙伴、未来、梦想，对，尤其是梦想，容不得王宇停下脚步。就这样，带着病痛，王宇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热诚，赢得了澳洲最大药厂和化妆品厂的合作意向。

回国后，王宇一下子病倒了，高烧43度，一周不退烧，烧得眼睛血红，全身打摆子。雪上加霜的是王宇又因外伤打了破伤风针，导致严重过敏——全身过敏性荨麻疹加亚甲炎。

对医学不通的王宇并不知道这个让自己全身打摆子及皮肤剧痛奇痒的病症，在临床上会发生昏厥和休克。熬不下去的王宇在半夜开车去了仁济医院，急诊医生检查之后说：“你这个病太严重了，而且可能引发其他更严重的并发症，我们治不了，你需要马上转院到华山医院。”

急诊医生准备安排急救车送王宇转院，王宇摇摇头，“我自己去，我自己去。”王宇不能跟陌生的急诊医生解释，是因为自己没有钱，是因为公司账户上只有两元钱。王宇打着双闪驾驶在高架桥上，他感觉到了呼吸困难，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尽管车里开着空调，但很快汗水就浸透了衣服，王宇的意识变得有些模糊。求生的本能让王宇不断提醒自己：“坚持住，我不能死，还欠一屁股债呢，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坚持住，壮士未酬，绝不能身先死。”渐渐的，王宇失去了知觉，一下子栽倒在方向盘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王宇首先庆幸的是，自己竟然能在丧失意识之前，把车开到了路边，没有影响他人的安全。

在华山医院，医生立刻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经过一周抢救，王宇终于缓了过来。医生都认为王宇能活下来是生命的奇迹，王宇几乎心源性猝死，但最终安然无恙。不过，他不得不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

然而祸不单行，就在王宇的事业跌到谷底的时候，爱情也离他而去。出院后，王宇数次徘徊在黄浦江畔，这几年创业中的各种艰辛他都一一体验，可得到的却是“人单影孤和身心俱疲。也许，江水就是我最好的解脱。”一向乐观的王宇想到了自杀，但是，每当自己走在黄浦江畔，自杀的念头如影随形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你的梦想呢？你

的世界第一的梦想呢？那是谁的声音？是老师的？王宇寻找着答案：是自己内心的！

现实的困难和梦想的坚持，彼此缠绕绞杀，最终还是梦想坚持到了最后。王宇认识到，自己和企业都需要救赎，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别人倒下而你还活着，就是赢了。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也由于王宇对澳洲及其它市场的开拓，宇昂科技起死回生。

在王宇的辛勤努力与战略布局下，欧美巨头在全球的PVP（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垄断已被打破，PVP价格一路下滑，最终形成了宇昂与另两家跨国公司三分天下的竞争格局。

（三）

2009年下半年，王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产品出口到以欧美为主的全球50多个国家，跟世界知名药企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但王宇始终没有忘记“世界第一”的梦想，作为高科技企业，研发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宇昂科技把很大一部分利润投入到实验室，“不做研发我很赚钱，做了研发就很穷，但是这个钱必须要烧下去，因为科研的领先要靠实力靠经济靠财力去烧出来的。”

一流的企业卖标准，二流的企业卖品牌，三流的企业卖产品。王宇忘不了面对国际巨头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傲慢，因为世界上的标准已经由他们制定了，而中国还没有相应的标准。要制定能够与国外抗衡的标准，就是王宇新的梦想和动力。

经过多年的历练，凭借多项具有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力，宇昂科技受全国功能高分子行业委员会的委托，完成了PVP全部系列产品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编制任务。此举是中国打破巴斯夫、亚仕兰等世界巨头在水溶性高分子PVP领域长达60多年垄断的重要工作，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水溶性高分子领域来说，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12年，国家证监会领导一行到宇昂科技考察，因为水溶性高分子技术过于专业与高深，来宾中有人提问：“怎么证明这个水溶性高

分子溶液是绿色环保的呢？”几十人的眼光全都投射到王宇的脸上，王宇想了一下，露出笑容，快步走到桌前，拿起容量杯，把杯中的溶液一饮而尽：“这就是绿色健康的。自己做的东西，虽然不是食品，却可以喝下去。”现场霎时掌声雷动。

王宇继续介绍：“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环保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从我们专业角度讲就是三个方面：一是废气的污染，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雾霾，现在北京的雾霾天气众所周知；二是污水处理，也就是废水处理；第三个还没有爆发，但实际上是大家都知道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的修复问题。这三个领域的治理都需要水溶性高分子技术。”

如今，宇昂科技公司已经成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功能高分子行业委员会理事单位，秘书处所在单位，水溶性高分子PVP国标撰写单位。2012年12月20日挂牌新三板，成为上海市首批新三板挂牌的企业。而王宇自己也已经成为全国功能高分子行业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十大青年创业先锋”、“创业中国年度创新人物”。

尽管取得了这些骄人的成绩，但在王宇看来，这只是企业通向“世界第一”这个梦想的必经之路。王宇天生属于仰望星空的人，他追求的目标，只要认准，再苦再渺茫也会坚持下去。

王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牵头组建行业协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国际水展，搭建产学研联盟，筹建国家水溶性高分子研发中心，尽全力制定水溶性高分子PVP的国家标准……这一切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行为。因为自己要做中国水溶性高分子航母，我以一己之力与欧美巨头在全球竞争，从产品的技术，质量，成本，品牌到标准全方面PK。个中艰辛，无以言表。但我坚信，只要企业能活下来，在当前国家大力扶持创新创业的时期，我一定可以实现成为中国水溶性高分子航母的愿景。

北大创业训练营供稿

留洋博士养牛记

龙茂乾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邓志峰是人们心目中的精英，但这位留洋博士回国后出人意料地走上了一条养牛的道路。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个“傻瓜”。但实际上，他只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努力实现着他的生态农业梦。

5月初的一天清晨，10辆大挂车满载着280多头黑牛，开出了北京怀柔。车上的牛，体格健硕，在阳光照耀下皮毛油亮，宛如黑色绸缎，神气十足。

这已是第二批出发的牛了。车队穿过燕山山脉，往内蒙古方向去了。在北京度过了冬天的牛群，要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度假”了。在那里，刚刚泛绿的牧草即将成为它们的美味，辽阔的草原等待着它们的回归。

这些牛可不一般。车上装的大多是冈根希勒牛，俗称内蒙黑牛，是内蒙古土生土长的土著牛。它们能耐零下30多度的极寒天气，吃的是专门从草原上运回来的天然生长的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地下水，体质极佳，凶猛好斗，每天自由奔跑超过50公里。而在几年前，它们几乎濒临灭绝。

它们的主人邓志峰更是不一般，他大概是

学历最高的“养牛人”了。

身高1.7米左右的邓志峰，来自湖南农村，37岁的他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农家大男孩，很腼腆，与人交谈时面带羞涩的笑。但是，有些内向的他，力气大得惊人，据说与人比腕力从未输过，一头重达千斤

的公牛被套上绳子后很难从他手中挣脱。

这位“牛博士”的经历堪称传奇。凭借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他于1998年保送北京大学物理系。2002年毕业后以全额奖学金赴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硕博连读，4年就获得博士学位。他研究的“超高精度磁力扫描显微镜”显示精度为15纳米，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并拥有“粒子束控制纳米管的方向”美国专利。

2006年，邓志峰回国经商，从事金融投资，同时涉足生态农业。

有些人天生就对生物有着热爱。得益于外婆的好手艺，邓志峰“从小舌头就被惯坏了”，为此萌生了要吃自己种的蔬菜水果的想法。他坚信，好的食品蕴含的营养可以激发人的智力潜能。他甚至把自己夺得物理奥赛金牌的原因之一，归功于母亲在比赛前给自己熬炖的一锅土鸡汤。在北大求学期间，他辅修的都是生物课。在斯坦福大学，他修完了人类生命科学、力学生物学、中医等多门课程，都得到A的好成绩。 he 可以从颜色形状或是口感上判断出果蔬是否施过化肥农药，甚至可以闻一闻

土壤就知道其是否铬超标，闻一闻炒好的菜，就知道咸不咸。

但是，养牛并非他的初衷。

回国后第一年，他斥资千万，在北京密云水库附近承包了2000多亩果林，准备践行自己的生态农业梦——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纯天然种植。梦想虽好，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到了秋季，原本可以收获数百万斤的果林几乎绝收。当时，他意识到土壤环境已被农药化肥严重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

改良土壤成为他的当务之急。这时，偶然读到的一本书——《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牛志》让他找到了突破口。这本记录了中国牛种的起源与形成历史的书，展示了中国丰富的牛遗传资源。他从书中了解到，作为中国牛主产地的内蒙古，却有越来越多的牛濒临灭绝，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冈根希勒牛（闻名遐迩的日本和牛就是冈根希勒牛的后代）。因此，他萌生了挽救濒临灭绝牛种的念头。既能保种育种，让蒙古黑牛继续繁衍下去，同时牛粪又可以改良土壤，这对他而言是一举两得。

“食草牛的牛粪是最好的土壤改善剂，牛粪中大量未经完全消化的有机质进入土壤后可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最佳的孕育环境。”邓志峰说。

从2009年起，他每年花大量时间，开着越野吉普，在茫茫内蒙古大草原寻找内蒙黑牛。有一次，为买下一头纯种冈根希勒母牛，他在牧民家软磨硬泡了半个月，最后不得已把牧民家50多头牛全买下。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国外品种杂交的牛，他不得不便宜卖掉，只留下了那一头纯种黑牛。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他的农场里已经饲养着近500多头黑牛，还有400多头内蒙梨花牛、虎斑牛、青牛、草原红等10多个珍稀品种。

市场上普通的肉牛只需一年就能长到1000斤以上，而一头黑牛从刚出生的小牛犊长到1000斤需要6年时间，生长极为缓慢，价格又卖

不上去，这在普通牧民眼里显然是不划算的买卖，这也是内蒙黑牛濒临灭绝的原因。在邓志峰的农场里，他不计成本的投入，使得物种保护成为可能。每头牛从小到大，光吃草的成本就超过6万元。尽管成本高昂，邓志峰还是坚持下来了。

黑牛肉温热入肾、补气血，是常年熬夜、体质虚寒、手脚冰凉的人极佳的进补食材，其营养价值远不是喂饲料圈养的牛的牛肉能比的。当然，价格也是不菲。

为了让牛吃上天然牧草，邓志峰在内蒙古草原租下了近3万亩牧场。牛在每年4月份被运到内蒙古，让其在草原上吃草，到了11月或12月份再运回北京。天然牧草每隔十天八天就从海拉尔运到北京怀柔，载重30吨的大挂车，每次3到5车，而900多头牛大约三四天就能吃掉一车牧草。牛一年之中，8个月的时间在内蒙古草原，4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内蒙古草原的冬天太冷了，牛待得住，人待不住，也怕丢牛，运回北京也能为果园提供牛粪。”邓志峰说。

因此，往返于北京和内蒙古之间已经成为邓志峰生活的一部分。过去几年里，邓志峰为牛搬草、喂水，没事还亲自嚼嚼喂牛的草，能第一时间判断出草的好坏。

除了生态农业，邓志峰还从事着纳米技术转化生产的研究与投资，他为汽车及大型动力设备的发动机研发的保养和修复产品，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邓志峰每年要投入上千万元到他的农场中，迄今也没有太多回报。“我现在还不图赚钱，想先要把这个物种保留下来。”经过他这几年的搜寻和繁衍，内蒙黑牛目前已经没有灭绝的危险了。

牛的加入，让邓志峰的生态农场在几年间形成了良性的农业生态闭环，生态圈、生态链已经初具雏形。原先严重板结的土壤，经过他这几年的生态恢复，已经变得蓬松而有活力了。随处可见蚯蚓、蟋蟀，田间还可以听到虫鸣、蛙鸣。

如今，果林里，穿插种着北京所有的水果品种和100多种蔬菜。因为他知道“生态的多样性，对防治病虫害是很有利的”。当不同的植物、虫子在这个环境里共生的时候，就会形成“食物链”，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人，都能各取所需。他会放养一定数量鸡、鸭、鹅用来除草和杀虫。

他说，对于这片不施农药化肥的农场来说，这是最好的自然保护法则。

早在2016年1月6日，1898咖啡馆的北大校友股东们就参观了邓志峰的斯坦福农场，见识了刚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返回北京过冬的900多头牛。

“牛人养牛！”流连在近千头黑牛群中的校友们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位洋博士学成回国后，养牛，养羊，养家禽，种果树，种蔬菜，种粮食……带着科学素养和爱钻研的精神，邓志峰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农民。

邓志峰的眼光足够长远，他准备花几十年的时间，改良土壤，构筑生态圈，保护生态链，实现他的生态农业梦。

不擅应酬，不跑项目，不拿补贴，而是自己默默坚持着，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个“傻瓜”。自傲也罢，不屑也罢，他只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他养的牛一样，他就是有这样的牛性格和牛脾气。

原载《北京大学校报》

邓志峰设在北京密云县的养牛场



学子回乡，复活古村古宅灵魂之美

吴志轩（北大光华硕士）

有时候，人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着？从2002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14年的奔波，辗转各地，只为追寻自己的梦想。6年前，作为婺源抢救最美乡村计划发起人，我跟三位朋友在婺源开了第一家本土文化度假宅院九思堂，这栋始建于1902年的徽商老宅，引领我踏上了回乡的路。这条回乡的路很漫长，但是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婺源被公认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没有大山大河的奇景壮丽，却处处流露着乡村生态独有的人情醇美。但在婺源6年，我亲眼见过许多古宅的悲情结局。6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寻访了不下两百个村落，经过与当地村民漫长的协商，共租下6栋值得并急需修复的古宅。宅子年久失修，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年，我时常觉得时间紧迫，我们的努力，远远赶不上老宅消失的速度。平均每天，婺源就有将近两栋老宅消失。我希望更多有志于保护传统文化的人们，能加入到我们最美乡村的共同建设中，让传统文化不再是遗产，而是你我都可以融入其中的寻常生活。让人和人之间不再意味着风险和防范，而是洋溢着友善和热情。让婺源这个中国最美乡村，成为我们现实中的精神家园。

2010年12月我到婺源找老宅子，眼见许多显赫一时的家族花费巨资，历经数年乃至十数年建造，屹立百年的宅第，如今沦落得荒烟蔓草，残墙断壁，甚至渺无踪迹。而诸多的古村落，也日渐颓败，人气日薄，落得个“空心村”的悲凉。



在面对这些古村古宅的时候，我时常问自己：“他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毫无疑问，建筑美学是重要方面，包括结构、材料、雕刻、风水等等。所以很多人将古宅买了去，另择地复原。许多人乐此不疲，四处搜购，充斥门庭。但我却对此感到一种悲哀，只觉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并不否认这种结果起码是保护了古宅的建筑之美，但却丧失了古宅的灵魂。

古宅是有生命的，它承载了家族的梦想，承载了乡土的历史，倘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家族，那只不过是一具标本，泥胎木塑而已。我在婺源看了这么多老宅，感觉最舒服最充实的就是坐在老宅里，听主人讲家族的故事和老宅的历史。那时你会觉得这个宅子是鲜活的，是会呼吸的，是可以和人交流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沧桑、厚重、智慧、豁达、宁静、和

谐等等诸多情感，而非在一个展览馆里的匆匆一瞥。

所以，古宅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建筑美，更重要的是依附于人、依附于地方的人文之美！

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古宅里发生的故事都是美好的，但总体而言，古宅代表的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严谨、

雅致、诗意、和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古宅里，曾经有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生活，也曾有过“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融洽邻里；曾经有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雅集文会，也曾有过“十年寒窗，一朝金榜”的孜孜不倦；曾经有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宗族伦理，也曾有过“红袖添香，琴瑟和鸣”的爱情故事；曾经有过“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闲情逸致，也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

所以，我们从九思堂开始，一直到倚南别墅、继志堂、蓦然徽舍、务本堂、云何堂，保护性开发的模式都是从其应有的生活方式入手，有选择地复原其特色的场景，在表现形式上或有一点变化，但生活氛围和内涵却尽量以其传承为主。

一栋古宅可能承载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如果将这些全部抛弃，转而只是关注建筑本身，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古宅如此，古村更是如此。如今开发的古村，很多都是采取景区的模式，其中大多数都逐渐地丧失了本来



▲ 倚南别墅坐落于中国影视名村——南屏村，建于清咸丰年间，距今约160年的历史。其上厅内雕梁画栋，描金绘彩，其楼板斗拱、雀替、莲花门等处工艺精巧的木雕，堪称南屏一绝。

面目，走上了千村一面的不归路。商业化的浪潮涤荡了所有的灵魂，只剩下依稀仿佛原来的躯壳。

而原本的古村，是有着和睦共处的邻里关系，有着克己复礼的道德规范，有着恬淡丰富的乡土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品格是基本的素养，文化是共同的向往。

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在千城一面的同时，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剩不多的避难所，倘若不能予以善待，使之能步入一个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我们的灵魂不知能安放何处？

尽管我不是婺源人，但我把这里看成我的家园，看成我们的家园。在这里，可以领略和提升此地的美好，让自己，也让他人能在这里静净心境，体味一种雅致诗意、自在无碍的闲适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这正是诸多奔忙于大城市中的人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开创了婺源古宅度假新模式，我们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在婺源虹关村尝试非景区化的“本土文化生活度假”古村落发展模式，让客人更加真实充分地体验乡土生活的魅力，让村民能

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让本土文化和生活内容能够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指引下得以保护和发展！

我们希望，能将虹关古村打造成一种新的模式，走出一条新的古村保护与发展之路！我们相信，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古宅古村的未来会更加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更加美好！

从这个目的来说，古村古宅是具有极高价值的，它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其契机便在于此。希望它们不再背井离乡，更不要轰然坍塌！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更代表着那些迷茫焦虑无奈的芸芸众生的精神家园……



▲ 婺源花园村九思堂，一座建于公元 1902 年的徽商老宅，2011 年，经过全面修缮和改造，成为婺源一座徽商雅致生活度假宅院，共设置 7 间客房及多处精心布置的公共空间，使人得以深度体验古老婺源，品味那洒脱自在、澄静宁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艺术。

作者简介

吴志轩，1975 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93 年考入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02 年北大光华硕士毕业。做过房地产开发，从事过企业管理咨询，涉足于温泉酒店经营，后决定在古宅生活度假领域创业。现为婺源抢救最美乡村计划发起人，尚逸轩（北京）旅游度假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戴威：共享精神成就ofo共享单车

戴威，ofo 创始人兼 CEO，青年创业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14 年与 4 名合伙人创立 ofo，提出了“以共享经济+智能硬件，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的理念，创立了国内首家以平台共享方式运营校园自行车业务的新颖互联网科技公司。

骑行中找到快乐更找到梦想

戴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9 级本科生，2013 年毕业后，和所有年轻人不同，他没有就业或者继续留在北大深造，而是选择到祖国西部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当了一名支教的数学老师。一年的支教时光清苦但是充实。由于东峡镇地处偏远，从那里到县城需要倒好几次公共汽车，且山路崎岖，每进一次城“骨头就像散架一样，非常痛苦。”

“后来我和支教的同事一起商量，在县城买一辆山地车，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当作便利的交通工具。这就像冥冥中的缘分，我一下子就爱上了骑行，基本每个周末都要骑车往返县城和镇里，有时还会骑去更远的地方。一年下来，我不仅教会了一群孩子代数和几何的算法，还骑车看遍了青海大部分的壮美河山，这段经历让我难忘。”直到现在，戴威每每想起那段西部支教的经历，仍然很激动。

也正因此，戴威成了重度骑行爱好者，在北京当年的骑行圈里还成了小有名气的领队。从西部支教回来，戴威继续在北大攻读研究生，他一边上学，一边继续着骑行。从开始自己骑，到三两个朋友一起骑，最后发展成一个拥有四五十号人的骑行组织。那个时候，戴威便开始考虑创业，希望用一种共享、愉悦的方式“经营”好骑行旅游，把绿色环保健康的骑



行运动推广给更多的人。

2014 年，戴威的骑行旅游组织得到了北大师兄的支持，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戴威“把爱好融入到事业里”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在一年的时间内，戴威成立了骑行领队团，开拓出近 10 条骑行旅游线路，发展骑行爱好者近两千人，组织了环台湾岛、环富士山、环济州岛、环海南岛等多次大型骑行旅游活动。戴威的骑行团在北京骑行组织里算是领队最专业、路线最丰富的户外组织之一。

好景不长，骑行团运转的第二年，戴威发现，尽管骑行爱好者很多，骑行户外的市场发展很大，但是对于资金有限的骑行社团组织来说，低频、小众、收入来源无保障、户外风险大等诸多不利因素，依然严重束缚其更好的发展。专业领队被更大的骑行组织挖走、路线拓展速度放缓、团员规模不稳定等问题频频出

现，让刚刚成长起来的骑行旅游团在“风雨中摇摆不定”。“那个时候，整个团的经费只剩下400块钱，留下的领队们聚在一起，想想渺茫的前途几乎崩溃。”戴威说，“好在我不是一个轻易说放弃的人，因为在我潜意识里，在骑行这个行业里一定可以诞生出更好的产业发展路径，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找到。”

果不其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关乎团队生死的两天两夜里，戴威和团队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看到了另一片世界。这个世界依然和自行车有关，依然和共享有关。

穷则变 变则通 把骑行换种方式去实现

“我们在读书期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校园大、校区多，要想方便快捷的进行校园穿行，骑自行车是最好的办法。但骑车也有些烦恼，比如说我，本科4年丢了5辆自行车，再加上平时有的时候会遇到车停在东门，我却从西门回来了的情况。遇到急事，自行车却不在身边，想骑又骑不了，干着急没办法。”戴威的几个核心团员都是刚毕业或者在读的大学生，有一天，大家继续聚在一起探讨社团未来的时候，聊起了这些学校里的尴尬事，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有共鸣。“能不能



借助移动互联网通过一种共享自行车的方式，去解决这些校园代步的问题？”大家的头脑风暴让在场的戴威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中国首个校园共享单车平台就在几个年轻人的聊天中逐渐有了清晰的模型。

说干就干。在与大家头脑风暴后，戴威随即用了3个月的时间寻找创业伙伴，要懂技术的、要懂产品开发的、要懂运营的、要懂市场的……想要一下子找到合适的人才并非易事，戴威靠着执着的信念和三寸不烂之舌，最终还是打动了十几位热爱自行车又具备一些创业经验的人。“ofo”共享平台冲破“生死3个月”后终于成立了。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就是ofo共享单车，解决的是人们最后1-2公里的出行问题。”在ofo共享单车整个项目孵化过程中，戴威和团队走遍了北京近20所高校，对学生的出行以及自行车需求进行了详细调研。随后，他们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车锁，并购买和回收自行车，进行统一改造。戴威说，“我们通过将每一辆自行车装上车牌以及共享硬件，就可以在校园里实现随取随用，不用寻找固定的停车桩。通过移动终端使用也极大的方便了同学们的交通出行，并且价格非常低，比自己买车要便宜很多。”

这就是戴威由爱而生的自行车事业，只不过他对自行车进行了“互联网+”升级改造，成为“互联网+自行车”模式，把共享的理念注入进这个古老的出行产品上。

ofo模式被称为自行车里的uber

项目成熟了，商业模式也就自然清晰。“ofo共享单车是一次创业，但是我更坚信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因为我们在做共享的经济模型，比现在世界上任何的共享经济模型都要复杂。”戴威认为，即使是共享经济的鼻祖airbnb、优步，他们的整个交易过程中也是有人的参与，有房东有司机作为媒介的，



而在ofo共享单车的交易过程中，是没有人的参与的。一个用户看到了一辆ofo共享单车，他只需要打开手机、输入车牌号、解锁、骑车，到达目的地以后锁车、支付，整个过程不需要第三方作为媒介搭桥，这套模式看似简单，其实在这样的共享经济模式里，如何通过机制的设计，以及互联网技术去解决效率和信任的问题，十分不容易。

“其实我们在整个ofo共享单车的机制设计，以及科技解决方案里，都是在分析这样的经济模型，在做一个探索，分析在未来的世界里，假如都是无人驾驶的汽车了，房子可能都不需要房东去开门了，那用户能不能像现在一样的遵守规则，能够有彼此的信任，去完成每一次的交易。”戴威眼里，ofo做的是未来模式的探索和尝试，共享单车现在解决了校园出行的代步难题，也让学生、老师们都参与到了共享平台上，共享他人的闲置资源以及提供自己的闲置资源，如果这一自循环能够顺利运转起来，那么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项目就不是难事。

戴威介绍，目前ofo共享单车已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近40所全国高校运营，累计服务在校师生超500万次，现有40余万的师生注册用户，校园普及率正在快速提升。不少人称，ofo共享单车就是自行车中的uber，大家在这个模型中相互提供需求，形成了一个生态。

共享经济实际上就是将闲置的资源高效地利用起来。你的钱你的知识你的时间你的物品都可以算在内，你有它的“拥有权”，而将“使用权”交给他人，从而获得一部分“收益”。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像今天这般发展的如此迅速，那是因为共享经济是一种双边发展的模式，一方面他需要具备有需求的用户，一方面他需要提供资源的共享者。从前制约这种模式扩张的就是供需的用户量以及快速的供需匹配，而今日的技术发展给共享经济提供了一条便捷路径，让它在近几年以非常快的速度扩张。我们相信，ofo在一群具备共享意识的90后创业者的带领下，能够拥有很长一段“骑”妙的发展旅程。

原载《齐鲁晚报》

少年爱乐在北大

刘雪枫（1979级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



大学时代的刘雪枫

田余庆师去世的前几年，我去先生家的次数多了起来。当然他老人家的时间从来都十分金贵，我不可能贸然叨扰，然每每听闻北大又有老先生仙逝，心中又不禁怆然，觉得今生能够受教于北大，有幸结识这些非常年代挣扎着活过来的师长，在他们生命的尽头，我总是生出见一次少一次的黯然喟叹。

经常有人问我作为北大历史学系专修魏晋南北朝史的学生为何最后走上音乐的道路，我其实都想说，如果没有北大的7年时光，音乐于我是已经被毅然决绝放弃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头一天我还在参演样板戏芭蕾舞剧《草原儿女》，那前奏曲的第一句是一段小号独奏（我是小号手），而第二天便一切都变了，“四人帮”被“粉碎”，宣布文革结束，我回到课堂继续初三的学业，人生目标从做一名职业

乐手转为考上大学。

上天佑我，我如愿以偿考上北大。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38 楼的邻居、考古专业的杨晓能是北大艺术团的团长，他听说我吹过小号，便力邀我加入艺术团，我虽最终婉拒，却因杨师兄的引荐，结识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他家里重新听到了古典音乐。必须说这是我北大爱乐经历的重要开端。田余庆师对我和俞先生持续20余年的交往是知道详情的，俞先生去世后，田余庆师多次劝我写一写俞先生，写他的音乐情怀，写一个当代知识界关于“知音”或者“忘年交”的故事。他说，这是俞先生一生中最明亮的一部分，是足可告慰其灵魂的宝贵抒怀，是少有人知但极有精神价值的记忆。我一则因为懒惰，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任何分享的欲望，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和俞先生最不

可示人的秘密。

上个世纪末，我把为音乐写下的第一本书送给了田余庆师、周一良师以及祝总斌师，他们接受了，而且田余庆师还从此很乐意与我谈论音乐方面的话题。我记得有一次和田师通了好长的电话，是田师打来的，他说起一个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观念，我略作思索，给出了并非令人满意的解读。田师期望我能够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古代音乐史，我说了一大堆困难，倒是令田师兴趣盎然，相约下次到家里详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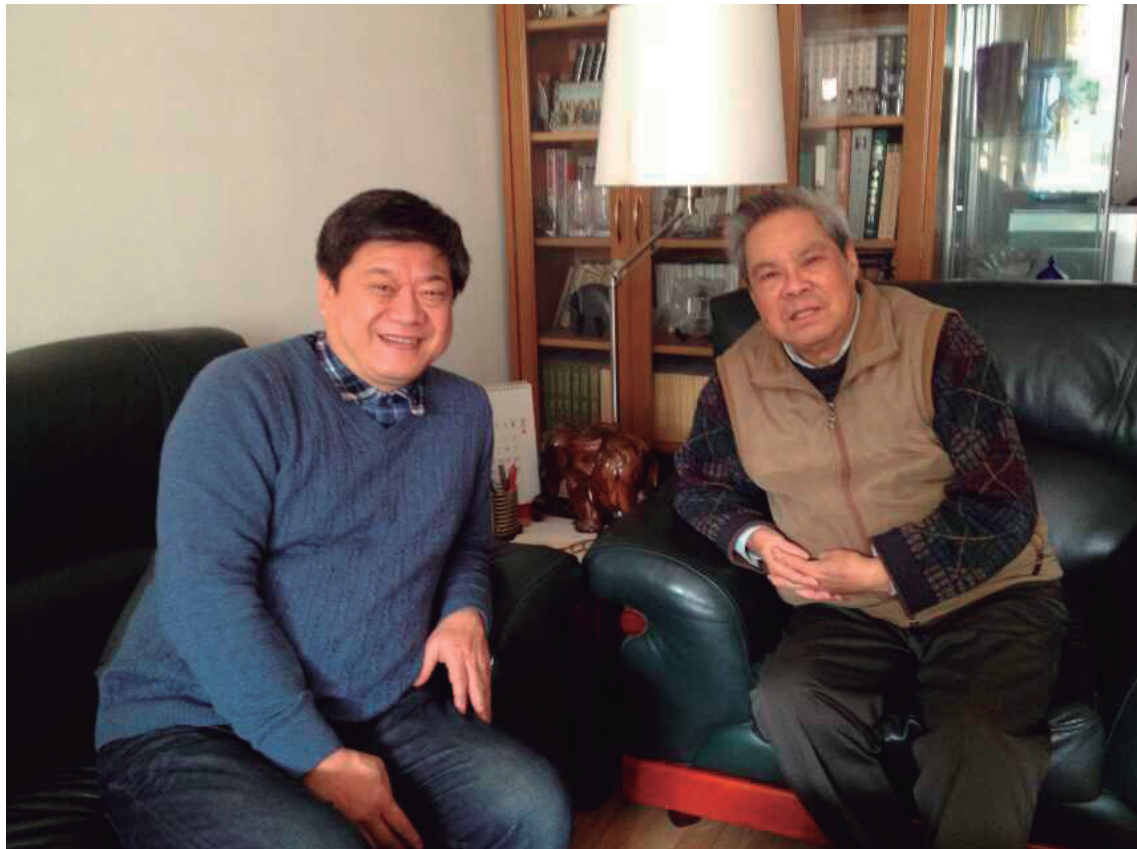
田师女婿陈勇是我同门师兄，毕业后并无多少来往，但少有的几次联系，似乎他是特意要解除我的“思想负担”或者“打开心结”，会有意无意地说起田师在不同场合对于我的“不务正业”都表示了认可甚至赞许的态度。前年底惊悉先生仙逝，在打给陈勇师兄电话中，陈师兄竟又提起田师生前数日还曾说过雪枫现在做的不错，不由使我悲从心来。

田师也好，周师也好，他们俱已远行，虽无音乐陪伴，却对我人生道路的“离经叛道”给予慷慨的理解和由衷的支持，这一点我真的是刚刚才领悟到。世人往往将我的音乐成长与北大分开，而我似乎到今天才恍然彻悟，如无北大的人文氛围，如无与俞先生的相遇，如无田师、周师及祝师的包容理解，且不说我的爱乐兴致是否有所进境，恐怕随着岁月的蚀磨，我的羞愧之心也要变本加厉了。爱乐虽为兴之所至，却总是本着做学问的态度去弄懂感兴趣的议题。记得在多年前的职称答辩会上，刘梦溪先生也曾问起中国古代历史学科训练对我研究西方音乐史有何借鉴价值时，我重点讲了时代的横向联系对研究一个作曲家的风格形成的意义，比如我在清华大学做的系列讲座，就是以作曲家及其时代为坐标，把音乐史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整体状况呈现出来。

还是接着说作为北大爱乐经历开端的我与俞先生的故事吧。我先是从俞先生那里录到了



几盘柴科夫斯基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磁带，我把空白磁带留给他，几天后他录好了给我，还为我磁带上歪歪扭扭地（俞先生文革期间触电自杀使双手拇指致残）写下原版磁带的外文信息。为了有资源进行交换，我每逢星期天便到父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料部工作的战友张明达家里，吃过午饭便是聊天。张明达叔叔是广播里世界名曲欣赏的主要撰稿人，算是我第一位正式音乐老师，他的知识结构和父亲完全不同，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如饥似渴呀！那时记忆力也是最佳状态，几乎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次来，我都会买一盒 10 盘空白磁带，好一点的是 TDK 和 SONY，大概6元一盘。便宜的便是国产“铁鹰”牌，录一遍或者听一遍掉渣掉的特别厉害，买过一盒便不再买了。曲目是我和张叔叔商量着来的，主要还是听从张叔叔的推荐，当然我那时也急于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因为是从电台的开盘带上往下扒，所以演奏的版本都比较老，但也正因此，我拿到的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施纳贝尔、瓦尔特、霍洛维茨的录音可以说都在北大的爱乐圈子里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应。记得有一次俞先生来 38 楼，我正给同学理发。俞先生惊奇地说：啊！你还会理



▲ 刘雪枫与田余庆老师在一起

发，也给我理一下吧。理完发，他才说出来意：听说你搞到了托斯卡尼尼，一定是好的不得了了吧？我们赶紧来听听。

1980年代初的北京还买不到进口原版磁带，我们音乐收藏的两大来源便是我的中央台资料加俞先生亲友学生从海外寄来或者捎来的原版。我不仅迅速地在大学期间便攒到了上百盘，还不遗余力地把它们扩散出去，好像每天都有别的系的同学来我这里转录，认识的不认识的，总之没多久身边聚集了好多那个年代的爱乐者。

我们也开始了听现场音乐会的热潮，凌晨去红塔礼堂排队购票，多买一张或两张就每天算计着该请谁来一起听，特别是遇到像英国BBC 这样的顶级交响乐团来演勃拉姆斯和布里顿，就更是幻想着一起出席这种神圣场合的另

一半是哪一位，那时的情感真是朦胧，也就是说并无直观的爱和亲昵，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梦中人能够在音乐中走入现实，其实当她真的接受邀请来一起听了音乐会，也只是夜晚一起骑自行车回学校的时候多聊几句而已。

我和俞先生的故事更多的是在他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之后发生的，我们进入舒伯特艺术歌曲的世界，进入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乐队歌曲的狂热之中，我们的话题核心是伟大的男中音菲舍尔·迪斯考，在短暂的三年里，我们穷尽了他的所有录音。音乐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快乐，而是深入骨髓的忧伤和悲戚。此时我与俞先生的交往，则是我的北大爱乐升级版。

原载2016年11月5日《音乐共同体》微信公众号

北大，带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戴永耀（1951级物理系）



寒门求学，一路北上

1933年，我出生在福建长汀的一个小村庄里。我的父亲是红军，负伤回家后，在村子里做了一名医生。家里兄弟姐妹有9人，我排行老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农民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成长的岁月中，贫困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带给我冲击，在父亲开明思想的鼓舞下，我暗下决心要离开村子，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一片生机。

1951年，在饥寒交迫中，我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当时全国统考要在上海、厦门等大城市举行，于是，我带着家里省吃俭用拼凑出的50元钱，去到上海参加考试。18岁的我，年少气盛，只希望能离开村庄，到外面闯一闯，却不曾想到，这一离开就是整整30年，再次回家竟是年近半百！“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再次踏上这片自己曾经想要逃离的土地，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所有的一切，包括家人，都变得无比生疏……

来到上海之后，我先到徐家汇团委报到。因为当时是高中生，而且还是优秀共青团员，徐家汇团委承诺我，如果考不上大学，他们会给我分配工作。有了这份承诺，我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当时统考前就要填好志愿，因为我从小就对物理非常感兴趣，并且对北大有深深地向往之情，所以我并不在乎考不考得上，只知道我一定要考，因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跟随自己的兴趣走。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楚的记得，当年郑重地在志愿书上写下我的第一志愿——北大物理系。“皇天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北大物理系的通知书，开始了我人生的全新篇章。

9月份，我从上海直接出发到北京。当时

与其他的北大新生一起坐火车，招生委员会还专门包了两节车厢给北大的学生。来到北大之后，我离家时所带的50元钱已所剩无几，庆幸的是北大当时不收学费，而且还有一些生活补贴，这让我不至于因为学费而辍学。此外，高年级的同学对我们低年级同学也格外关心，他们会细心地观察我们是否有困难，并及时给予帮助。我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我，对北方即将到来的寒冬没有丝毫准备，身上只有一件单衣，我也没有额外的钱去买件棉衣来御寒。当时，周帅先学长注意到这件事，于是他送给我一件棉袍，这件棉袍我穿了很多年，之后也保存了许久。此外，邓锡铭同学也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时常提供衣服和钱来帮助我，我想没有他的热心帮助，很多难关我都无法渡过。有了这些同学的热心帮助，我才能顺利的完成学业，他们也值得我用一生去铭记。

从红楼到博雅塔

1951年，我刚进北大时，校区还是在沙滩红楼。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就搬到了新校区——西郊燕园，也就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所在地。我亲眼见证了北大从红楼到博雅塔、未名湖的校址变迁。

当时为了响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号召，校方通知大家准备搬迁事宜，我们由校方提供的大卡车载到新校区。新校区有两个体育馆——南体育馆、北体育馆。搬到新校区后，因为宿舍尚未建成，我们就暂时住在南体育馆中。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我们便搬到了新宿舍，住在14楼。新宿舍比原来的宿舍大很多，每间可以住8个人，但一般只安排4-6个人住，因为当时的学生也没有现在多。我们班有三四十人，而我们51级大概有一千人左右，但那时研究生与博士生很少，所以总体人数也就相对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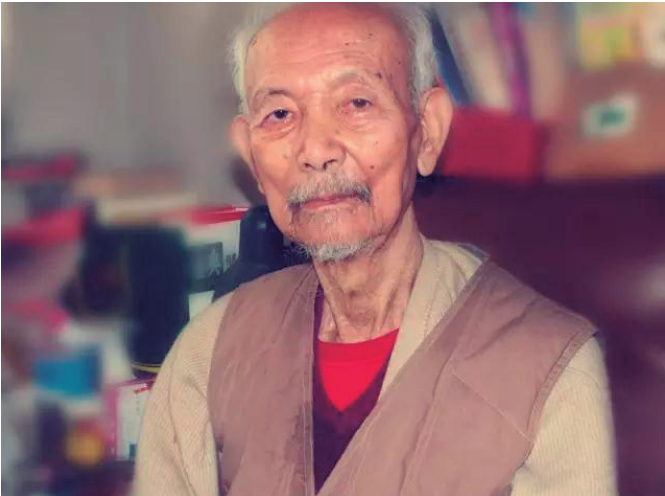
4年的大学时光，我在新校区里度过了3年，仅在老校区待过短短的1年，但这1年的时间，却是我念念不忘的。沙滩红楼、民主广场、灰楼、北楼……这些建筑依然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时的北楼曾经是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灰楼是女生宿舍，三院则是男生宿舍，而红楼是教学与办公的场所。此外，理学院的隔壁就是西斋，穿过马路便是景山公园。虽然时隔多年，但老北大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

我对老校区的感情要远远多于新校区，因为老校区有更多的内涵与历史的积淀。从五四运动开始，这里便是一个民主与进步的摇篮，中国近代众多进步人士都从这里走出，而这里的每一栋建筑也都承载着那段峥嵘岁月。此外，老校区的空气比较活跃，自由民主的氛围远比新校区浓厚。当时很多社团活动都在红楼地下室的一层举办，吸引了众多同学参与其中，极为热闹。

政治生活，反右运动

初进北大时，我并不是党员。自幼受父亲的影响，我渴望进步，也非常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入党是比较难的，要经过层层审查，还要到家乡去调查。当时周帅先学长觉得我的思想比较进步，于是向组织推荐了我。在他的引导与帮助下，一年后，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党支部大概有七八十人，部长与副部长每周都会做报告，内容基本是关于时事的，宣传进步的思想与言论。我成为党员不久，就被选为团委委员，负责留学生方面的工作。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是一位姓代的女老师，我和另一名党员同志一起协助她，负责给外国留学生安排中国的辅导员，来帮助他们尽快地学好中文。当时的留学生是4个人一个宿舍，每个宿舍要派一名辅导员进行辅导。这段



人物简介

戴永耀，福建人，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5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接触到很多外国留学生。

大学前3年的生活，学术氛围浓厚，大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学习领域。游行活动也很少，主要是国庆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天安门游行。但从1954年开始，政治活动不断的涌入我们的学习生活中。最先是1954年的春天，当时有一个“大鸣大放”号召，学校开会让大家对领导、对国家提出意见，校方会记录下来，以纠正现存的一些错误。

很多学生在这时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但没想到，几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揪出右派人物。当时很多提意见的学生被划为右派，我身边也有好几个这样的同学。这些右派的学生大多不是党员，划为右派后，有些在学校里接受批评，审查历史，同学们都不敢和他们联系、交流，在学校里被孤立起来；也有些右派同学被学校直接开除；还有一些则集中送到西北地区劳动，大概有上千人，这是我十几年后看了资料才知道的。反右运动在我大学毕业时仍在继续，我当时因为拥护党和国家的主张，没有提意见，所以只是目睹了这场反右风波。

北大情怀

1955年，我结束了在北大4年的学习生涯，顺利地毕业，并投入到学校所分配的工作中去。此后的几十年我都投入到这份工作中，为党和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退休后，生活状态比较稳定，我时常思考物质与意识的问题。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还藏着一个哲学梦。当年在填报志愿时，我的第三志愿便是北大哲学系，不过我也从未后悔选择物理专业，因为物理比较实在，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更需要这份“实在的力量”。现在退休了，我有机会去追寻我的另一个梦想，感到非常地满足。

相较于其他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的一生应该是非常的平顺。而北大则是我平顺的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我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偏远的农村走来，是北大带给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它不仅教给我丰富的知识，也带给我开阔的视野，更让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朋友。这是我生命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1986年那场青春，永不散场

——《博雅诗笺》序

汪浩（1986级物理系）



30年前的1986级校友

北大从来不缺诗。118年以来，从鲁迅、胡适、徐志摩、朱自清、周作人，到毛泽东、俞平伯、卞之琳、王力、吴小如，再到海子、西川、戈麦，前赴后继，屡屡脍炙人口。那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本诗集呢？这本诗集有什么特别呢？这是一部由北大1986级两千多名学子集体创作的诗集，诗中蕴含了他们对就学北大、同学情谊、青春岁月的深深怀念。当时我们“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30年后，偶然碰到了，谈起来，说着说着，心颤了，牵挂难断了，于是浓浓地酿成了这本诗集。

这本诗集也许是北大第一本人人都能参与的业余和专业诗人的作品集。诗歌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人心灵的流露、细心的感知和真实的表达，汇成了诗；诗人不是天生的，只要大家肯写，既能接受自己，又能互相接受，诗集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本诗集托了微信的福。网络把人的距离拉近了，让同学朋友们天涯若比邻。以前总得鸿雁传千里，现在却是一键联天下，很多实时的评价和赞美，让诗友们的创作过程富有骄傲

和共勉，诗集从无到有，只用了诗友们几个月的时间。

和诗一样，学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30年前，未名湖面闪过了朵朵云彩，汇聚了风霜雪雨；北大接受了两千多名1986级学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同学们能走到一起，多半出于偶然，却一起历经了一段历史的必然。接下来的4年里，我们吸收了北大文化，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北大是荣誉，是归

属，是青春的洗礼，更是珍贵的回忆。

最难忘的人物之一，是丁石孙校长。丁校长不仅继承了北大科学民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而且还把对人的尊重融合进来。他说过，北大的精神与风格，还应该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成长和自由发展”。他能够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诚信待人，为北大人树立了一个做人的典范。世上最难树的碑是口碑。30年后，当尘埃落定，噪音消逝，中国社会对丁校长的正面评价有增无减，证明他的风格大家是赞同的。这本诗集就是北大



2016年7月16日，1986级校友在办公室补办毕业典礼



1986级同学们献给现年89岁的丁校长的。

这本诗集是为1986级全体同学唱的赞歌。30年来，同学们的足迹遍及全球，历经风雨，多以北大精神自勉，把和平和欢乐带到了各自的生活圈子里。但遗憾的是有多位同学英年早逝。特别是本诗集作者之一——中文系的李静，在与癌症抗争数年后，在诗集的编写过程中去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她的诗篇，也留下了她永久的开朗笑容。从今年起，我们每年都会为逝去的校友献上生命的赞礼，以诗歌为重要形式。

这本诗集也是给北大师弟师妹们的一点心意，希望他们能从1986级师兄师姐们的作品里体会到一点东西。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既承担了独特的使命，也迎接了历史的挑战。这些平凡的诗歌里体现的是1986级校友们对生活和历史的洞察、描绘、感觉、反省、想象、创造和判决。这些诗，是北大人对世界真实的叙述、戏剧式的描绘、自由的抒情、与自然的沟通、对外界的体会、谦虚以及勇敢的教导，还有哲学的思考，以及偶尔的讽刺。

归根到底，这是一本普通人一起写的诗集。大家都具有足够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力量来写诗。每个人都有不断流动着的思念和感情，教育给了我们铸诗的模具，我们也理解了万物的联系，剩下的只是把诗写下来，敲出来，发出去，和朋友们互相点个赞，把把关，世界上便多了你我的诗。

人生丰富多彩，诗的形式多种多样。唐诗宋词，近代诗现代诗，都是表达诗意的形式。

30年后，1986级校友重相聚

诗意是关不住的。你看，甘地就是一首行走的诗：一个消瘦的长者，拄着长长的手杖，头发剃得干净，透过清澈眼镜的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微风吹过，白色的披肩展开，整个印度便飞了起来。

纵然——忆北大

汪浩

纵然是脚踏铿锵的火车轮
我还是个徒步的朝圣者
一步步迈向燕园那神圣的殿堂

纵然是肩扛盈满的旧书包
我还是个饥渴的求学者
一遍遍倾听图书馆无声的音乐

纵然是身处喧哗的闹市里
我还是个静思的读书人
一波波骇浪化作未名湖的涟漪

纵然是面对纷繁的新世界
我还是要拥抱那博雅塔
一点点风尘与艰辛就慢慢消失

纵然已吻别那美好的筵席
我还是要逗留在三角地
一阵阵波涛和使情会渐渐涌起

纵然时空已穿越江湖万里
我还是万千同学敬红楼
一颗颗赤子心总会与北大共鸣

选自《博雅诗笺》北大1986级同学入学30周年纪念诗集

洛兵：吟游歌手的“北大情结”

2016年11月5日晚，“洛兵吟游·献给北大”演唱会，在北京糖果雍和店隆重举行。洛兵1984年考入北大俄语系，曾在团委、学生会、美术社、书法社、燕新社、五四文学社担任各种职务。1986年，洛兵获得北大五四文学大奖一等奖、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后来的未名诗歌节）创作一等奖。同年，洛兵和同伴组织了北京大学第一届文学艺术节，邀请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残雪等人参加，举办了大量比赛、讲座、演唱会。那些时候，洛兵经常在草坪上和人查琴斗歌，彻夜吟唱。

离校后，洛兵进入演艺圈，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回来》《随心所欲》《开门红》《晚钟》《我知道你在》《湄南河》等等。从1992年至今，洛兵经常参加母校的文艺活动，5次担任北大年度十佳歌手总决赛评委。

当年，他被乐评人称为“洛一半”，因为在他的全盛时期，排行榜中的Top10的流行歌曲，几乎一半都标注着洛兵的词曲。洛兵的作品，生长、流传于那个“纯真年代”，没有当下的浮躁多元的风气影响，它们大多旋律优美，张力十足，更重要的是，歌词如诗，禁得起推敲和反复琢磨。这样的诗意，使得他的作品都具备经久不衰的经典力量。直至今日，《梦里水乡》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仍然在多个场合被翻唱，广泛流传。

曾有媒体采访洛兵为什么在没有去过水乡时就写出《梦里水乡》这样的作品，洛兵表示，他的记忆里，总有一泓清波，在夕阳下荡漾，在微光里闪动，那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小湖，他在湖畔奔跑，在湖上滑冰，在湖中捕捞石螺青虾——未名湖，才是他心目中最美丽的梦里水乡。

2010年，洛兵走上舞台，开始演唱自己的音乐作品。代表作为《天外》《喜欢一个人》《我这么多年没出来》《路过》等。2011年，洛兵开始在全国各地演出，并自我定位为吟游诗人，所有的专场，都命名为“吟游系列”。

2015年5月3日，洛兵率领参与音乐剧《天外众生》演出的北大学生歌手，出演“青春万岁”北大第一届草坪音乐节。在当年踢球、跑步、恋爱、自习过的大操场，热情如火，灯光璀璨。在他看来，为母校歌唱，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

2016年5月4日，洛兵邀请北大师妹邵夷贝，推出了一首沙画MV新作《表白》，献给母校。新歌推出后受到好评并打进了华语传媒排行榜。

从2011年到2016年，5个年头，洛兵吟游演出了25个专场。音乐长路，人生风雨，一切的灵感，一切的命运，都来自那火热的大学4年，来自梦萦魂绕的燕园。于是，洛兵决定，把自己的第26个吟游专场，也就是吟游5周年纪念专场，献给北大。



沙滩
红楼

新青年：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

洪烛 李阳泉



中国美术馆往西不远，故宫东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个叫沙滩的地方，有一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筑，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红砖小楼，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它就是北大红楼，现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见证了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岁月。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于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设立、又于1905年停废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续办。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

国度里的推行。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源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

据史料记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



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二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

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

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

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保守派。

胡适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参与《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

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钮岱峰先生曾说：胡适“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希望杂志暂时和政治保持远距离，为此他主张把《新青年》交由他一个人主办。”当然，这遭到鲁迅等人的拒绝。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胡适，就这样

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与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是从绍兴变卖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文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一直以青年为民族的希望，倍加爱惜。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

鲁迅与胡适，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是做书生，还是做斗士？是做改良派，还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天亡？是以笔为剑，还是解甲归田？真正的新青年，是不会老的，更不会退却。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头断流血，都不推辞。”用鲁迅的话即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属于“‘人’的萌芽”、“个人的自大”、“超过祖先的新人”。

三

北大红楼，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那一代新青年中，出了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他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蔡元培广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也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也自湖南赶来，了解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暂时落脚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恩师的寓所。青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否也穿一袭蓝布长袍、挟一柄油纸伞，大步流星（如同那幅“毛主席在安源”的油画所描绘的）？

杨昌济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将《新青年》介绍给毛泽东等进步学生阅读。在其眼中，毛泽东、蔡和森正属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前途无量。他预言“毛、蔡将来必是中国的栋梁。”他1920年病逝前给章士钊写信，还举荐毛、蔡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为吉安左巷8号），与另外六位年轻人（皆是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了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火烧得很旺吧？毛泽东曾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恐怕已构成他青年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30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达、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探讨中国的出路问

题。天寒地冻的北京，曾燃烧过他们火热的青春。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

毛泽东在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两度踏上北京的土地：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则是1919年12月，他率领湖南各界“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请愿团，顶着严寒北上，投宿在北长街99号（今为20号）福佑寺后殿——次年4月，他南下去上海。他与北京再见面，要等到29年之后了。

29年之后，昔日的热血青年，已是这泱泱大国之领袖。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既是面对操练的士兵（阅兵式）以及欢呼的群众，同时，也是面对昨天的自己……弹指一挥间，他由客人变成了主人。

原载《北京A TO Z》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严复与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

谈起严复，就不能不说到北京大学。严复与北京大学可谓有着不解之缘。其因缘关系，可溯至大学的初创年代。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是光绪皇帝“废八股、兴西学”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在此一年前，严复出于对维新新政事业的热心，大力协助友人张元济在京师设立通艺学堂，不仅为学堂命名，还积极为学堂引荐师资，他的侄儿严若潜是该学堂的常驻教员，他自己也在学堂作“西学门径功用”的专题讲座。

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离京，通艺学堂被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应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自然而然就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长。虽然严复真正掌管北大的时间很短，仅8个月之

久，但在北大的百年史中，这几个月的意义却事关生死存亡甚为关键，严复为北大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复刚接手京师大学堂时，正处在清政府统治危机的浪尖上：校舍先被义和团改为神坛，后为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关闭，师生流离，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存款仅有万金，处境艰难，大学堂名存实瘫。严复曾在家书中说：“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不给，岂能为无米之炊？”无奈此时民国政府新立，国库一贫如洗，严复尽所能自筹，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得7万两款项。

可是这7万两仅仅是杯水车薪。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袁世凯加紧搜刮民脂民膏，缩减其他部委经费，全力支持其军队建设，扩大其亲信部队的力量，以此来巩固他并不牢靠的统治基础。因此，教育经费成了第一个牺牲品。1912年6月，财务部发布通令，宣布京外各衙门及学校教职员月薪在六十以下者，一律照旧支付，而在六十元以上者，一律暂支六十元。这一通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北京大学已有数月领不到经费，办学情况岌岌可危。

除去缺少办学经费外，由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派别斗争异常纷乱，接着便有人在报纸上造谣攻击，再加各种运动差事，严复感到难以自全，“极难对付”。他一方面采取了归并科目，精简机构等措施来缩减开支，并通过再次借款来保证日常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他上书议会，反对财务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紧缩办学经费。他提议，“为今之际，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

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

孰料，7月7日，教育部下达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称“大学校自开办至清末，凡历十余载，中间更经丧乱，因陋敷陈”，“学生之班次虽增，陶植之成绩未著”，“政体既变，各方对大学咸有不满之意”。同时，教育部还颁行“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决定学生提前毕业，不授予学位，一律不招新生。

教育事关国运，不可不办。在英国留学的数年，严复已经认识到，欧洲坚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契约，保护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使之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而教育，正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为了传递有效信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为了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更为先进的社会文化。

严复写下《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直呈当局并向社会吁请支持北京大学办学。他认为：北京大学自创办以来，集中了当时的最好人才与最大物力，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才获得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一旦轻心调之，前此所糜百万帑金，悉同虚掷，十分可惜”，办大学既为造就人才，也为“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至于办学程度的问题，世界上文明国家各有著名大学十几所，乃至几十所，我国仅此一所尚不克保存，岂不令人痛心！而北大设立的各种学科，“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者起见”，“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与此同时，严复还写了《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呈给教育部，详细阐明创办新式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想，要使北京大学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

严复为寻求北大生存与发展所作努力，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的同情与支持。北大文、法、工、农四科的学生代表，联名提出说帖或请愿书，抗议停办北京大学，支持严复意见，有的甚至提出北大脱离教育部自行办学的

意见。在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下，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撤销了拟将北京大学停办的原决议，并参照严复的意见，提出九条解决办法。为了解决财政的困窘局面，严复又一次为筹款奔波，终于从华北银行借得20万两银子，使北大再次渡过难关。由于严复的学问和声望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同年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的学历。北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由此奠定。

在严复的主持和领导下，北大的办学和改革一时颇有起色。然而，因为派系斗争等种种原因，严复于1912年10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离开了北京。在同年11月严复为预科学生所撰写的《大学预科＜同学录＞序》中，似乎可以看出严复当时的无奈心情：“天下之理，非年时之学所能尽；一国之事，非一哄之众可得专也，敬告吾党慎之而已。”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议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但是他的爱国之情和忧患意识始终未变。1916年严复写给好友熊纯如的信中提及了这种感情：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

原载《学习时报》

陈平原：西南联大之精神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

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

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



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

即便是思想激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基于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

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渗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

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金岳霖——编者注）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形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世人谈及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喜欢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常委）入手。其实，三人中长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贻琦，而梅发挥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阅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会的权力与决策之果断。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忍不拔），合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清华贡献最大。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

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世人之所以喜欢从三位校长说起，除了这样“讲故事”线索简单，效果很好，我怀疑还有“官本位”的潜在影响。查阅大量档案公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散文小说等，逐渐展开五彩缤纷的历史场景，你会发现，战争中西南联大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性作用。

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教授大都是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

比起教授之合作无间，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我曾引用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怀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把这段话略为引申——放长视野，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原载《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友网

20世纪建筑遗产——

北大图书馆：读书，也读你



北大图书馆新馆正门，建于1998年

由燕园东门而入，首先映入眼帘的必是那被列入燕园“一塔湖图”之景的雄伟楼阁——北京大学图书馆。近日，图书馆又加桂冠，荣列“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北大图书馆，宛若一位大唐盛世穿越而来的女子，大方端庄，腹有诗书，与未名湖相邻，与博雅塔相望，见证着燕园的风风雨雨，朝朝暮暮。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历史沿革，看一看她的雍容美丽。



北大图书馆阳光大厅

1898年，她还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居所地为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梳妆楼，条件相当简陋。但是，年轻的她雄心勃勃。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她也随之更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在馆舍西侧增建了一座西文阅览室。

1918年10月，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她迁入沙滩红楼一层，并且增加了两处分馆，馆舍条件得到改善。同时计划在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筑新馆。

1935年9月，新馆终于落成，她以崭新的面貌开始正式接待读者，这是北大图书馆拥有比较现代的独立馆舍的开始。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成为了她的新家。燕大为她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可是，这一间小小楼阁已经容不下她的心。

1975年初，新的图书馆在燕园中心落成，她终于不用再蜷缩在狭小的空间之中，开始出落得落落大方，全国几乎没有谁能比她拥有更大的空间、更优越的条件。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邨教授担任新馆总体设计师、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的新馆（东楼）落成。

自此，东楼成为了她最夺人眼球的部分，仿唐风格的主楼巍然屹立，古色古香的大屋顶



大气磅礴，却又不乏现代气息；南北配殿分位两侧，与主楼相映成趣；南北两侧的连廊层层而上，将东楼与原有的西楼紧紧相连。东、西楼整体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大型建筑。

“从平面上看，新馆紧靠旧馆扩建，两个长方形建筑显得紧凑集中；从正面看，新馆主体设计为较高的凸型大楼加上大屋顶结构，遮掩了旧馆主体，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馆舍形象；从

北大图书馆新馆南侧连廊

侧面看，新馆两侧设计了爬山廊式的室外斜廊，在构图上将新旧馆连成一个整体，并取得了较强的装饰效果。”

一次成功的改扩建，使得她在百岁之时旧貌换新颜，愈负盛名。

21世纪以来，随着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并入、昌平校区远程储存图书馆的建成，她的总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文献资源累积量达到约1,100余万册（件）。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及优质的读者服务，她让大家自由地徜徉书海、享受阅读。一如既往的美丽之外，她内在的功能也是愈发强大。

背景链接

“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于2016年9月29日在北京公布。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未名湖燕园建筑群、北京大学红楼、北京大学图书等98个项目入选。

见证燕园初建时



燕园初建时的未名湖北岸男生宿舍夜景

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老照片征集启事发出后，在社会上和北大校友圈产生了广泛传播。不断有校友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珍藏的老照片捐赠给母校。

在这些征集到的老照片中，有一组来自校外人士捐赠的原燕京大学初建时期的老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本源于“PHOTO SECTION JOURNALISM DEPARTMENT YENCHING UNIVERSITY”（燕京大学新闻系照片部）的图片册。

图片册除了封面和封底，共有21页，每页上的照片，从两张到四张不等，总计有46张（其中有一张疑为重复）。大部分是燕京大学初建时期的校园及校园建筑图片，也有少数人物图片。每张照片下面都用英文标注着拍摄者的名字，旁边还有编号，这本图片册是从101号开始编排的。



▲ 未名湖湖心岛及石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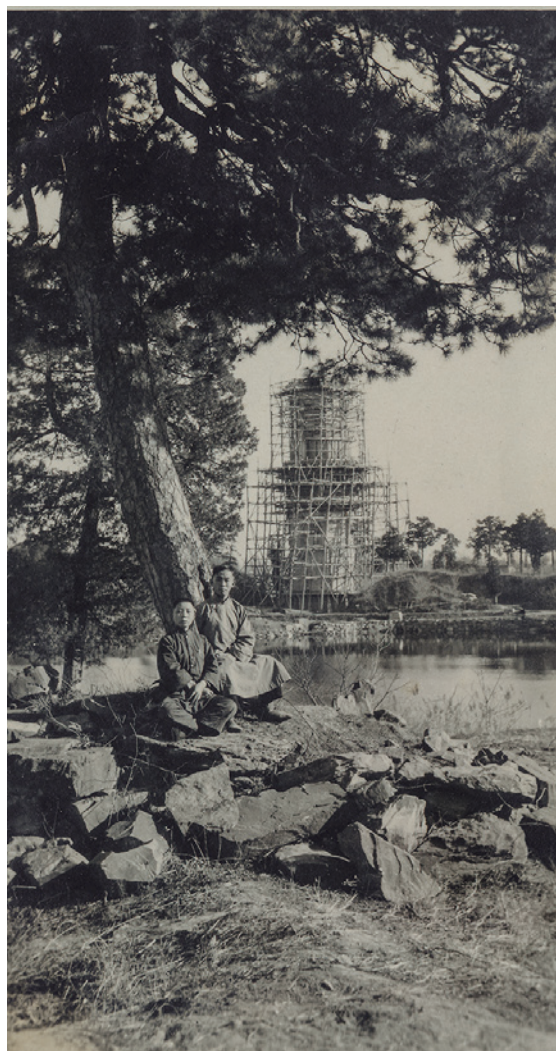
▲ 朗润园中的朗润桥



▲ 慈济寺山门与未名湖



▲ 燕园一角（石碑待考）



▲ 博雅塔位于未名湖东南隅山地上，原为水塔，建于 1924 年，与玉泉山上玉泉塔遥相呼应。塔主要由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叔父捐资兴建，得名“博雅塔”。上两图为在建的博雅塔。



▲ 燕京大学女生在打篮球



▲ 燕京大学办公楼及周边建筑



▲ 燕园雪景



▲ 南阁及六院



▲ 燕京大学女生

读书

买书这“病” 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俞敏洪（1980 级西语系英语专业）

在微信里看到好文章，或者标题很好但当时没有时间阅读的文章，我就会随手存入收藏里面。但一旦存入，通常就不会再去阅读了。久而久之，收藏里面保存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却很少去阅读。

如果口袋里有钱，女人买东西的时候，通常不会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而是觉得喜欢，不管家里有没有会继续买。所以女人常常会有上百双鞋子，或者上百件衣服。如果遇到打折，女人立刻进入非理性状态，滔滔黄河也阻挡不住她们买东西的热情了。

男人常常笑话女人都是购物狂，其实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男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常常也是非理性采购的。我有朋友搞收藏，几

乎搞得家破人亡，一旦听到什么地方有他喜欢的东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实际上拿到了想要的东西，把玩几天后，往库房里一扔，就再也不去碰了。

我不买奢侈品，也不收藏东西，但我看到喜欢的书就会没命地买。从大学开始把一半的生活费用在买书上，到今天买书不用担心钱不够，就更加乱买了。结果家里堆满了书，连墙角都被占了。今生今世就算把自己泡在书里，也不一定能够读完的。很多书都是买了就买了，放在那里就忘了，常常出现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一本的情况。

但我还是继续收藏读不完的文章，买一辈子都不一定去读的书。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病，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了。人一旦贪婪和任性了，被什么东西所媚惑了，就很难治好了，就像女人停不住买没用东西，贪官攫取很难花出去的钱，明明知道不对，也停不下来。今天北京是雾霾天，不能出去游荡，所以我决定在家里治治自己只收藏文章不阅读的毛病。我终于把收藏的文章，一篇篇输入网页版，在电脑上开始阅读。一天下来，阅读了几十篇文章，发现里面不少文字真值得一读，满眼珠玑、琳琅满目的感觉，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情感、教育等等。一天下来，各种观点碰撞交锋，不亚于请了一帮智慧朋友品茶论道，体会了一把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畅快淋漓。

人的特点，总是看着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好，媳妇是别人的好，工作是别人的好，身材也是别人的好。我们对于自己拥有的东

西常常会视而不见，手里拿着金钥匙找不到门，眼睛总是盯着门外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拥有的东西从来不去使用，就不会产生价值和意义。

那些从来没有被阅读过的文章和书籍、那些从来没有被穿过的鞋子和衣服、那些从来没有被关心过的藏品和珍宝，一定每天都在孤独地哭泣，体会着被冷落的寂寞感。

就像今天的几十篇文章，一旦被阅读，就

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正如王阳明看花时说的一段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所以，不管是东西还是朋友，一旦拥有，百分珍惜，也许我们的生活就会一时明白起来。

2016.12.16

原载《老俞闲话》微信公众号

如何培养读书习惯： 多读熟读细读

吴小如（北大历史学系教授）

青年朋友每问我读书有什么诀窍。其实答案很简单，只是多读、熟读、细读六字而已。

多读

所谓“多”，多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我是搞古典文学的，当然这里说的读书的主攻方向是指读这一专业的书。但从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源流来看，最初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这就要求治古典文学的人多少总要把经、史、子、集这四大部类古籍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读一些。《论衡·谢短篇》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就我个人说，我国近、现、当代文学诚然不是我研究的范围，但我并非对它们全无兴趣。对外国文学亦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上中学时起，直到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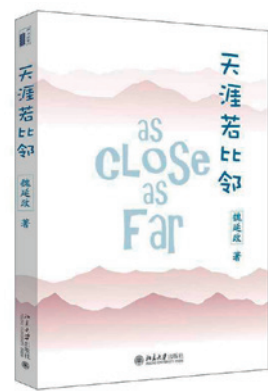


天，只要有时间，我总是见缝插针，有时有系统、有时无系统地读一些。说到古典文学本身，又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门类，当然应该有所偏重；但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只顾“单打一”，恐怕也不行。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一个演员本领再高，只会唱一两出戏，总不能算是表演艺术家，



怎样让人生的幸福感最大化？

魏延政（1994 级计算机学院、经济学院双学士）



两年前写过一篇题为《系统化思维》的文章，是我在企业 and 大学里讲《怎样与西方CEO交流》的一个核心模块。

上个月复旦哲学大会开幕式

上，我作《向死而生于斯为盛》的人生意义主题演讲，讲到如何最大化幸福，这是一个哲学思辨的系统化思维的方法，只是许多人在忙忙碌碌中忘记了要不时的扩大自己的格局和眼界，竟然浑不觉的放弃了很多本应属于自己的幸福、或者从来都不曾知道还有那样一种幸福的存在。

所以，我在哲学大会上讲的不仅仅是生死，而更是如何思维的哲学。以下我把大会演讲中的一个片段摘录成今天这篇文章。

—

任何人终归难免一死，此生之后，人与人、人与物，又有什么区别？那么人生终究有意义吗？

我们不妨先用世间人们最常用的数字来衡量一下人生，先不必纠缠这样的衡量方法是否合理。打个比方说，你做事为生都很顺，你目前有1个亿的资产。假如你家有5口人平分这一个亿，平均每人得到2千万；假如你家只有你夫妻俩，你俩平均每人拥有5千万；假如你到50岁

还是黄金钻石王老五，一个人独得这1个亿，比一般人来说，你很有钱。

被除数分子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除数分母。假如有一天，医生宣告你的生命只有30天，那么，这个分母就变成了“0”。

分母变成0，就是说，你这个人没了。但是那1个亿还在，对于你这个除数为零来说，就是小学数学里说的，除数为零无意义！

如果用高中数学来说，这个数学式子还是有意义的，那就是除出来的结果等于无穷大。这代表着，你的那一个亿回归了整个社会——人尽财散。

在物理上，这个式子也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着，你的躯体的亿万个细胞分散开来化作无穷多个分子原子散落在无穷大的整个宇宙中。在哲学上，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天合一”。

那么叫花子的情形又是怎样？

叫花子和你的情形只有一个不同，就是他的被除数没有你那么多，他没有一个亿，可能他一辈子的全部资产仅仅只有路边捡来的一分钱。当他生命终结，0.01除以0的结果和1亿除以0的结果，在数学意义上完全一样，等于无穷大。

在物理意义上也完全一样，1分钱回归了社会，他的整个身躯的所有细胞化作无穷多个分子原子散落在无穷大的整个宇宙中，和富翁不分彼此的融合在一起。在哲学上，这个叫花子可能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子哲学的“人天合一”，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终究会和那个至大无外的整个宇宙人天合一。多么崇高的终结啊，一字不识的叫花子竟然也能毫不费力的就达到了。

作者简介

吴小如（1922.9.8 ~ 2014.5.11），原名吴同宝，安徽泾县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吴小如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于194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受业于朱经农、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著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跟随俞平伯45年。历任津沽大学中文系教员，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及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小如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吴小如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等，译有《巴尔扎克传》。

2014年5月11日，吴小如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更形成不了艺术流派。从事书法、绘画艺术的人，不但要临摹，而且要博览；不但要亲自动手，而且要大开眼界，读书做学问理亦相同。

熟读

说到“熟”，当然是相对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快刀不磨黄锈起，胸膛不挺背要驼。我十几岁时背通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以及《毛诗》《论语》《孟子》之类的线装书，有的早已忘掉。但忘掉也不要紧，它们毕竟使我养成浏览古书的习惯和识文断句的能力。关于能力的培养，这里想多说几句。“知”与“能”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知而不能，终非真知。上面引述的刘勰的话很可玩味。他不说“听”千曲而后晓声，而说“操”千曲，可见他是主张实践出真知的，即能演奏千曲的人才真正体会到钻研音乐的甘苦。至于下文的“观千剑”，应该指有比较鉴别的能力，而不是走马观花。“识器”的鉴赏家必须见过“千剑”才有发言权。

细读

所谓“细”，就是反复钻研。其中自然包括博采众长和独立思考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应该是经验之谈。《礼记·中庸篇》谈学问之道，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步骤，我以为，可能同我这里所说的熟和细的意思差不多。另外，“熟”和“细”原是“水磨功夫”，不宜急于求成，更不要急于自创一派，自成体系。那样只有自己吃亏，最后可能一事无成。1949年我初入大学教书，只能“以述为作”，“述而不作”；进入60年代，在课堂上偶然谈一点心得体会；近年讲课，则只谈个人一得之愚，此势所必至，非力可强而致也。

原载《新湘评论》



所以人活着的时候不必追求那些崇高的人天合一，你终究会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达到那个哲学终极高度，不管你是亿万巨贾还是不名一文的叫花子，也不管你情不情愿，你俩最终的高度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任何人的起点和终点都完全一样，都是那个人天合一的无穷多个分子原子，我们生前死后又都会归结于这个无穷的宇宙幻象中。色即是空！有吗？没有。没有吗？有！我们确确实实来过这个世界，临了，又好像没来过，似乎如同来过，这就是“如来”的含义，如来-佛，就是那么个如同来过又似不曾来过的色空不二的一体。

二

既然殊途同归，那么人生终究还有意义吗？毕竟我们来过这个世界，人生终究是有意义的，意义就在于起点终点之间的这个过程。既然人生终究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归结到同样的人天合一的高度，既然一字不识的文盲最终也会人天合一，那么这个崇高的境界对任何人都不值一提。对于芸芸众生来说，用人天合一这种哲学思想来指导普罗大众的人生未免不合时宜。我们不妨换一种哲学思考方式，借用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可取方法，来衡量我们人生的意义。

西方人的哲学观在形成之初就和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本质区别，西方人没有人天合一这种玄而又玄的观念，他们讲究“我”和“我以外的自然界及社会”分离开来观察宇宙万象。他们注重发掘我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他们先于中国发展出自然科学，而我们往往喜欢从起点直达终点人天合

一，忽略中间的种种过程，相应的自然科学就落后于西方。

对于人生来说，如果把“我”和“非我”分离开来，再看起点终点之间的过程，那么问题相对比较明确，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两方面：对于“我”来说，对于普罗大众的每一个“我”来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我”要幸福，就这么简单；对于“非我”来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每一个“我”能对“我以外”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影响些什么，就是乔布斯说的“make a dent”。

关于“我”这一部分，我也不想把问题复杂化，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幸福。这篇文章就只讨论这一个话题。

说到幸福，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章开头说的用钱衡量人生意义的那种方法，收入和成就感能带来幸福吗？能，也不能，或者说不可持续。收入和成就不能带来持续的幸福。你不会因为这个月发了几万块奖金而一直高兴到下个月，也不会因为今年的升职而高兴到明年；当你拿到2千元的人生第一笔月工资，你很幸福；当你有一天拿到100万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很不幸福，因为你马上会意识到以你当下的能力足以拿到1000万，可是你却只拿到了100万。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幸福？

幸福是一个哲学思辨的问题。幸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没有绝对值，只有相对值，相对于你能够看到的格局视野来说，如果你能够看到你所能动用的资源和能力的全局，那么你现在的处境是幸福还是不幸，你对自己的评价就会客观清晰一些，并且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还能更幸福一些。相反，你看不到全局，你在走迷宫，你会恐惧、没有方向、肯定不幸福。

如果你考虑事情总是丢掉几个重要因素，你做事、生活、为人处世一定不幸福；如果你能把每件事从时间维度的前因后果上、空间维度的内外制约因素上都操作的得心应手，说明你系统化的考虑清楚了这件事，你就会少留下遗憾，即便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上你的资源和能力不得不做出某些放弃的时候，你也不会因为这点放弃而遗憾，在这个全局观上，你潜在可能达到的最大幸福已经达到了，在当下这个时候你最

幸福。有了这样的全局观，而且，你不会在盲目的追求更大的但却达不到的幸福，人贵在自知之明。

另外，要学会接受不完美、接受失去。

如果某一刻，你的资源全集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我，人生途中得了癌症并且因之失去了一条腿，这就意味着我的全局范围缩小了，比如我不能像从前一样跑跳参加很多体育活动了。我必须接受这一点，否则我只能跟自己过不去而烦恼。

人生该怎样支配才有意义？我想起一首歌，张国荣唱的——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焰火。焰火，就像他的人生一样，稍纵即逝，短暂的；但又颜色不一样的，对于张国荣来说，颜色非常绚丽，那就是他的幸福。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包含着很多数学、经济学、哲学的含义。

三

既然我们的人生无法达到极致的完美，一个对于所有人都行之有效、且门槛又最低的途径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多读读书吧。在古今中外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尽可能多的体验你这一辈子永远也无法亲身实践到的别人的不同人生；看看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活法，从而提高自己的格局和视野；尽可能的把自己潜在的有可能达到的全集尽早的全部挖掘出来，以便在有生之年最大化自己的幸福，而不留下遗憾。

读书不仅仅能最大化的提高全局观意义上的幸福感，在每一件单一的事情上，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认识层次，也会带来不同层次的幸福感。

比如，我看过好几遍《阿甘正传》这部电影，但我最近读了一本《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的美国历史书之后，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样看这部电影，最近一次看的收获的喜悦和幸福感大大超越以往。

比如说，电影开篇阿甘介绍自己的身世，说他的祖上是个Ku Klux Klan，然后影片中出现一个全身盔甲的蒙面骑士带领着一群人去做什么了。没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知道了KKK是歧视暗杀黑人的白人地下组织，

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统一了南方并解放了南方黑人奴隶，在法律上肯定了黑人平等的经济法律选举等权利，因之白人有了心理不平衡开始搞各种歧视暗杀迫害运动。阿甘介绍自己出生在南方的阿拉巴马州，以前看这部电影我听到这个地名从来没有意识到阿拉巴马是南方黑人争取解放斗争运动的火山焦点。

阿甘参军入伍踏上军车，里面白人不给他让座，最后只有一个黑人给他让了座，这些都体现着当时美国南方社会种族观念的紧张气氛。后来阿甘和丹中尉一起捕鱼创业的艰辛过程中，有那么几次他俩一起出现在一个除了他俩全是黑人的教堂中的特写，后来他俩发了财，他还捐赠了一个全是黑人参与的教堂、给让他座位的死去黑人战友的母亲一笔不菲的捐赠。不了解美国历史之前，从来没有在意为什么导演会安排那几个黑人教堂的细节特写，最近一次看这部电影，当那几个镜头飞快掠过，我也飞快的意识到，KKK和黑人教堂都是符号象征，后者象征着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解放运动最鼎盛的那个时代，马丁路德金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成立了南方黑人的基督教教会组织（SCLC: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从而使从前一盘散沙的黑人在各地都有了精神和组织上的团结运作的平台。

电影的导演和编剧有意不提马丁路德金，以避免碰触黑人曾经被迫害的那根神经，而是通过傻子阿甘对黑人教堂捐赠这样的安排，巧妙的避开了美国长达几百年的黑人种族歧视的争议，淡化了美国60年代白热化的主要针对黑人的种族运动的负面情绪，而是从一个天生呆傻的善良的白人对黑人的友善捐赠来表达种族之间本应平等、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夙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让欧洲以及全世界唾弃的黑人奴隶制度、长达300年以来对黑人歧视迫害的深深忏悔和致歉。

当然，读书要读有意义、能扩展人生格局和视野的书。读书也有读书的方法，总括来说，“读”未必是桌前灯下、“书”未必是白纸黑字、要读书和实践知行合一；读书要思考、要联想、要触类旁通。

摘自《天涯若比邻》魏延政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20校
庆征集

捐赠 | 钱伟长：《忆龙翔教授》

2016年3月19日，在“纪念张龙翔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张龙翔长子张元凯先生、次子张景怡先生向北京大学档案馆捐赠了钱伟长先生手稿《忆龙翔教授》等纸质材料25卷（件），以及照片和底片共65张。

现在，我们为读者呈现其中的钱伟长先生《忆龙翔教授》文章，重温两位学术巨人的治学风范、高尚人格。

龙翔教授和我是30年代清华的同学，我在物理系，他在化学系。1933年以前，清华的数学、物理、化学三系同在科学馆，数学系在一楼，物理系在二楼、化学系在三楼。每班同学不多，并能跨越系选课，所以我认识了许多化学系的同学，也选读了许多化学系的主要课程，如张子高教授的普通化学、高崇熙教授、严仁荫教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萨本铁教

授的有机化学，黄子卿教授的物理化学、李运华教授的工业化学，以及所有的实验课，其分量几乎占总学分的40%。因此不仅和本班化学系同学如陈新民、汪德熙、张光世、陈彬以及当时化学系的研究生张为申、张青莲诸位都很熟悉，而且和其它班级的化学系同学如张龙翔、谢和声、陈冠荣、武迟、曹本熙诸位常同堂听课也都相识。但我和龙翔教授交谊甚熟，应该说是自1939年我们同期考取第七届中英庚款公费生后开始的。

8月发榜，共取公费留英学生24人，其中清华毕业生有8人：张龙翔、林家翘、付承义、欧阳子祥、段学复、陈遵祈、靳文翰和我。9月3日我们集中自昆明出发，经海防赴香港，抵港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运停止受阻而返昆明。1940年1月得通知改派加拿大，在上海英界集合，乘英国海轮经日本去温哥华。我们上船后，发现有庚款会英方买办在护照上经由日本签证，注明可在神户登岸参观。当时我们群起反对，义愤抗议，宁可不去留学，也绝不能接受侵略我国的敌人签证的耻辱，大家一致坚决弃证下船，各返原地。到8月初第三次接到通知，再到上海集合，终于乘“俄国皇后号”邮轮启航成行。9月中旬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后，得知我的妻子在重庆产一男儿，由外公和叔祖父两位老人选名元凯，寄企盼抗战胜利凯旋之意。当时龙翔就很欣赏这个名字，6年后他得一男儿，也取名元凯，这是我们两家特殊的情谊。



▲ 钱伟长《忆龙翔教授》手稿



▲ 钱伟长先生（左一）和夫人孔祥瑛（左三）到北大燕南园 56 号看望老同学张龙翔夫妇（1991 年 5 月 1 日）

我们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他在生物化学系，我在应用数学系，虽都忙于学习和写论文，但住处邻近，时相时从。龙翔和段学复、林家翘、沈昭文同住赫隆大街107号，我住在克拉锡克大街20号，两处相距不到20米，真可算是近在咫尺了！我们经常在赫隆大街107号相聚。在日机偷袭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和国内的信件邮递更困难了，也更增加了我们去国思乡的情怀。聚会时离不开谈世界战局，国内抗战情况，以及各人辗转迟到的家书中的多种报道。在日渐加深的接触的过程中，使我了解到龙翔教授是一位心怀祖国，笃志向学，谦和待人，有素养的学者。

当时有不少加拿大的留学生转去美国，龙翔和我都认为毕业论文进行得顺利，决心读完

博士再考虑以后的安排。在多伦多两年半的时间里，留学生们有很多活动，我们曾结伴访问过尼古拉大瀑布、渥太华和蒙特利尔等地，以了解加拿大的风物人情。我们也曾相互参酌购置一些工作上生活上需要的物品。龙翔和我一同选购了打字机和照相机等。打字机曾伴随我半个世纪，打印了许多篇科普论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红卫兵的“勒令”下才舍我而去。至于那架

照相机，却另有一番启迪：1960年困难时期，儿子染上肝炎，不能上班不能念书，我把照相机给了他，使他休闲养病。谁知从此他就开始学照相，进而研究摄影，研究照相机，并自学精密仪器、光学等有关学科，积三十几年不懈的钻研和实践，现在已跻于摄影学界，在摄影理论和照相机设计方面是自学成才的专家。正是由于龙翔帮我所选购照相机的赐与，使受我“错划右派”之累，虽成绩优异而“不宜录取”拒之于清华大学门外，背着重负当了二十几年工人的儿子，竟探索出一条意想不到的研究新路，真是说不清的机缘。

抗战胜利后，我们相继返国回到清华，迎了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时，我留在清华，龙翔到了北京大学。以后虽几经风雨，但我们都是满怀忠诚矢志不移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努力



▲ 张龙翔(时年25岁)摄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41年3月13日)

钱伟长简介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工作。80年代间，龙翔教授荣任北大校长，更是恪守厥职，为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贡献。1985—1986年间，我们曾共同接受香港爱国人士王宽诚先生的聘请，担任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留学生考选委员会的委员。在那期间曾举行两次考选，共录取88名留学生（全国报名近万人，参加考试的逾6000人），先后送往美、英、德、法各著名大学攻读博士。龙翔教授在决定考选专业，决定几百门考选课程的命题、考试、评选，以及派送学校、向国外著名导师推荐等事项，都

能从国家的需要全面考虑而提出建议，为祖国培养人才倾注心力。此后，他还几次主持选派生物化学的研究生，都是缜密考虑精心选拔的。

龙翔教授终身从事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他所悉心关注的是祖国科学人才的培养成长，是祖国的兴盛，是祖国跨世纪的前途，是深刻体现了科教兴国的精神的。

龙翔教授已离去，他奉献于科教兴国的精神长存。

原载《张龙翔教授纪念文集》(1998)

口述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



民尊重和爱戴的总理，非常谦虚、伟大的领导人。当周恩来总理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领导人，只感到他是一个善良和朴实的长辈。

参加国庆招待会时我还不不懂中文，由我们代表处的翻译人员帮助我。当时我正准备回

北大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北大底蕴、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校友取得了突出成就。2018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校庆，为展示形象、讲好故事、推动发展，北大启动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其中，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是口述史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述留学生校友的“燕国情”和“中国故事”。

周总理鼓励我学中文

1971年10月，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中国政府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就在这次招待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后来我又在类似的场合中多次见到过他。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总理对人特别友好，又非常诚恳。每次宴会进行时，他都绕着所有的桌子同每个人干杯，喝一点酒，欢迎客人并和他们说几句话。所以我要说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总理，也是我们所有亚非人

到前线，在给我的领导的信中，我说中国很友好，但我不习惯，我不会说中国话，不想当外交官。周恩来总理走到了我所在的那张桌子前面，通过翻译得知我是巴勒斯坦外交官，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想要回巴勒斯坦前线去。我还提到了阿拉法特主席和中巴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对我讲，你应当利用在中国的机会深入地学习，学习中国语言也很重要，中文可以作为连接中国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一座桥梁。其实我也很赞同他提出的关于学习语言的建议，而且我也很喜欢学中文。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一年，我多少也学会了几句中国话，而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就是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最初缘由。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之后，我决定留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

现在我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还能为中阿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要特别感谢敬爱

的周恩来总理，当年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才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中文。

我在燕园收获了跨国爱情

我进到北大学习后不久，燕园又来了一些外国留学生。我的越南同学告诉我，在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中，有一位是从老挝来的姑娘，她叫索拉达，在西语系学习英文。这位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中文说得也非常好。

我和她逐渐成了好朋友，后来开始与她谈恋爱。

我和她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一起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和思想教育活动，一起参加专门为外国留学生组织的旅游和参观古迹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关系也不断地升温。每当我参加学校足球比赛的时候，她都到场观看，为我加油。

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我们的学业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都从爱情中得到努力和进取的动力。我们在取得了自己所预期的学业上的成功之后，决定在爱情上也更进一步，朝着建立充满幸福的可以生儿育女的爱巢，朝着努力搭建两国人民之间联系桥梁的方向走下去。在美丽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我们时常漫步在未名湖

畔这个终生难忘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甚至湖里戏水的鱼儿，树枝上驻足的鸟儿，甚至那甜美的空气，都见证了我们彼此忠贞不渝的爱情。

我与北大的不了情

我在北大讲课的起源是与我在中国的学习和工作紧密相关的。现在我教北大外院阿拉伯语专业学生口语课，主要就是用阿拉伯语讲中东问题、中阿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我在中国长期从事中阿关系方面的工作，并进行相关课题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的四十多年正是中阿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一個阶段，而我在这个阶段恰恰是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时候，当年我重启了阿拉伯大使委员会的工作，并成立了新闻宣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直到现在还在运作，我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阿文化等领域关系的发展，我向大使委员会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每个月安排一位阿拉伯国家大使去比较重要的大学给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们讲课，内容是介绍本国的情况或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通过这样的讲课，不仅能提高学生们的阿拉伯语听力水平，而且也有助于他们了解中阿的双边关系。如果每个国家的大使都能来讲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这对阿拉伯语专业的师生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毕竟学习阿拉伯语是为了将来能参与中阿关系方面的工作，所以语言能力是必需的，但增加相关知识储备也非常重要。就这样，我是第

一个到北京大学阿语系讲课的阿拉伯大使，我给北大学生讲课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北京大学对我来说不是一般的大学。我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多大的才能和多少的知识，对世界也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学习也很困难。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除了打仗和打游击，就是一门心思要解放自己的国家。在北大学习了那么多年之后，我逐渐认识到，解决巴以问题可能有比打仗还好的办法，主要是要有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也就是通过磋商、对话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正是在中国和在北大，我认识到了武力不一定是解决国家和国家之间争端或任何国际事务问题的唯一方式，还可以通过对话和磋商来处理任何争端和任何国际事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原载《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Moustapha Saphariny），巴勒斯坦籍，1971年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1978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在该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斯塔法·萨法日尼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92年至2002年担任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现任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任教。

北京大学120周年系列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华诞。这将是北大全体师生、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共同纪念和庆贺的重要历史时刻。为烘托校庆气氛，展示北大精神和学校形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面向社会和海内外校友，发起了“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系列征集”活动。

目前已经开展的“北大120校庆征集”项目有：“北大120周年校庆标识”“北大120周年校庆口号”“北大120周年校庆活动项目”“北大校史文物”“北大老照片”“我与北大的故事（口述史）”“纪录片《与北大同行》创作素材”等。

上述各项主题征集活动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有意参与上述征集活动的校友和社会友好人士，请登录“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官方网站（<http://120.pku.edu.cn/zhj.html>）或关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微信公众号、微博，查阅各项征集的时间和具体要求。也可以直接与“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方式：

电话：010—62750628

邮箱：bestofpku@pku.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西馆101室（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邮编：100871



▲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在北大授课

老照片 | 80年代国家男女排进北大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的成功夺冠引发了全民族的沸腾。在此契机下，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陆续收到了80年代毕业的校友发来的很多有关中国排球与北京大学渊源的老照片。



▲ 1981年3月29日中国男排来北大参加庆祝活动，主攻手汪嘉伟被学生们抬了起来。



▲ 1985年，中国女排获得四连冠后，王岳龙（1982级中文系，戴校徽者）作为校广播站编辑采访主教练邓若曾。



▲ 1981年中国女排来北京大学交流（一排左二为郎平）



▲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战胜南朝鲜队后，北大学生热烈庆祝。在当晚的游行中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 1981年11月16日，北大万名师生在“五四”操场举行了盛大篝火晚会，热烈庆祝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杯”冠军，并向女排致贺电。

聚焦校友会

北大校友会第八届第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京举行



20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校友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校友会会长林建华，常务副校长、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吴志攀，校友会副会长邓娅、高超、黄怒波、彭兴业以及一百余位校友理事、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长、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李宇宁主持。

林建华会长代表母校欢迎校友们回到燕园，并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近年来发展改革的情况。他指出，所有这些成绩，都离不开广大校友的支持和奉献。2017年，北大将与全球北大人一起，继续坚定地走在守正创新的路上。

吴志攀副会长从北大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成果、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筹资发展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向与会校友理事和代表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建设情况。之后，他还介绍了北大120周年校庆的筹备情况。

北大校友会秘书长李宇宁在会上作了秘书处年度工作及财务报告。报告简要回顾了第八届理事会成立以来校友会的创新工作和服务；详细介绍了过去一年里校友会的新思路、新服务、新举措；展示了校友会在组织建设、发展创新、活动开展、创新创业、信息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果，汇报了校友会财务收支情况；并重点介绍“燕缘”校友网络平台上线、试运行以及备案校友组织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各项工作。

随后北京大学新疆校友会会长张野作了关于“2017北京大学校友会第九届校友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一次校友工作研讨会”筹备情况的专项报告。

会上，部分院系、地方和行业校友会的代表进行了校友工作经验分享。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广西校友会和金融校友联合会分别就校友会组织建设、选调生扎根与发展、基金如何支持校友组织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和汇报。

“北大校友企业服务联盟”正式启动 “燕缘”社区新增重磅服务项目

2016年9月10日，非凡酒店、法拉第国际酒店及度假村集团、住友酒店集团、尚逸轩、漫宜生活共5家酒店类校友企业，为校友推出了涵盖不同消费特色的北大人专属酒店优惠，这标志着由北大校友会毕业季品牌项目“北大毕业帮”发展而来的“北大校友企业服务联盟”正式启动服务。

“北大校友企业服务联盟”（简称“服务联盟”）由北京大学校友会发起，北京大学校友网、北大创业训练营、北大校友创业联合会共同承办，北大企业家俱乐部、北大MBA校友会、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以及海内外百余家备案校友组织提供战略支持。

“服务联盟”利用北京大学校友网络平台，由校友企业、北大校友共同参与，校友企业向校友提供产品优惠或专属服务，校友网络平台向校友做活动推广，校友享受优惠并可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点评及分享传播，三方共同形成良好互动，形成互惠互助、健康文明的校友生态圈。

“服务联盟”已经推出9期服务项目，涉及酒店旅游、运动健康、电影娱乐、教育培训、医疗保健、酒类食品等多个大众消费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校友的关注和认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校友企业报名参与。

“服务联盟”是“燕缘”社区的核心服务项目。“燕缘”社区是北京大学校友会着力打造的专属北大人的网络社区产品，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该社区于2017年1月1日正式上线。“燕缘”为全球各类校友组织和校内院系搭建了129个子社群，在数据存储、会员管理、校友服务、活动组织、数据分析、小额捐赠等领域大大提高了校友服务的信息化和协同化，未来将成为校友，校友企业，校友组织，在校师生共享的重要线上北大生态圈。



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在深圳举行

10月29日，“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暨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年会”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论坛主题为“融入世界的中国金融”。千余名来自海内外学界、政界、金融实务界的北京大学金融校友和嘉宾齐聚深圳，共议全球和中国金融业的机遇和挑战。论坛由北京大学校友会和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共同主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北京大学深圳金融校友会联合承办。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

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海闻教授在会上致辞，他希望全体北大金融人共同努力，为中国金融的改革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做出北大人应有的贡献。

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分别在上午的

主论坛发表了主旨演讲。

当天中午，部分主旨演讲嘉宾和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执行理事、北京大学金融家协会理事出席了由樊纲教授主持的闭门午餐会。余永定教授与中国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上海纽约大学教授、波动研究所所长王建业担任主讲嘉宾。

下午的四场分论坛主题分别为“资本寒冬下的投资与创业”、“财富管理：中国和世界”、“创新的金融合力”和“新形势·新投资”。智囊传媒CEO傅强，中信鼎峰基金执行董事秦逸飞，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玉才，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中石油政研室副主任王震等做了主题发言。

（撰稿：绳晓春 摄影：金鹏 谢凤）



第七届北美校友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

由北京大学校友会主办、北京大学芝加哥校友会承办的第七届北京大学北美校友代表大会于2016年9月24日在美国西北大学Evanston校区召开。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一行和来自北美近20个校友组织的200余名校友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

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丽梅、北大芝加哥校友会会长林牧分别致辞，校友会秘书长李宇宁作工作报告。北大校长林建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美国洛克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夏廷康校友，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校友，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庆先生分别为大

会作主题演讲。

下午共设有两个分论坛。第一分论坛为“在美国工作、生活及投资的法律风险和规避”，第二分论坛为“医学和人工智能”，Warranty集团高级副总裁Teri Santos、Sanchez Daniels & Hoffman公司Yifan Xu Sanchez、世界知名超导专家郝小星校友、明尼苏达大学心胸外科终身教授廖康雄校友、路易斯维尔大学犹太医院麻醉和围术期医学科教授黄佳鹏校友、Citadel对冲基金定量金融分析师刘琪校友分别在两个论坛发言交流。

北美地区近20个校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还就北大12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北美地区校友

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专题研讨。

24日同期还举办了“燕园留痕——邱明斤校友北京大学文献收藏北美巡展”，北大校友

跨洋举办北京大学文献收藏巡展尚属首次，也是北大历史上的首次。会后，巡展还在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陆续展出。



亦庄健康产业大会2016在京召开



2016年7月10日，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北京大学校友会主办的“亦庄健康产业大会2016”，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大大厦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陈竺专门为大会发来了贺信。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何维，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梁胜在会上发言或作主旨演

讲。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俞敏洪为与会观众作了精彩的分享。

大会还举行了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亦庄基地的启用仪式，并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经济开发区分别授予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新锐人才培养基地”和“众创空间”铜牌。

第六届校友企业招聘会暨创新创业校友分享会举行



图为创新创业校友分享会现场



图为第六届校友企业招聘会现场

11月11日，由北京大学校友会、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第六届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暨创新创业校友分享会在北大举行。千余名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到场应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易车网、北大创业训练营、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中钢设备有限公司等114家校友企业参加了本次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近千个。

当天上午，创新创业校友分享会暨首场北

大创星沙龙在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创业咖啡角举行。北大党委副书记叶静漪，校友会秘书长、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李宇宁，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张莉鑫等出席分享会。分享投资合伙人王会民、网录科技CEO吕旭军、德青源人力资源总监覃浪洲、苏州晶云药物科技创始人陈敏华等校友与十余位致力于创新创业的学弟学妹进行了互动交流。

本次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北京大学MBA校友会、燕聚学生交流协会和工学院研究生会的大力支持。

老校友新春联谊会



图为书画爱好者的现场泼墨被老校友们收藏

2月19日，时值元宵佳节前夕，2016北京大学校友春节联谊会在农园一层大厅隆重举行。97岁高龄的李忠学长及500多位老年校友，欢聚母校“回家过年”。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吴志攀，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丽梅出席本次联谊会。

2017校友新年音乐会圆满举行

2017年1月4日晚，恰逢蔡元培校长履职北大100周年纪念日，由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主办，北京大学校友爱乐俱乐部承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协办的2017北京大学校友新年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精彩上演。

此前，北京大学校友会通过“写祝福，回母校，听交响”的形式向全球校友发起活动邀请，得到了广大校友和在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北京大学电视台也特别制作了北大2017新年视频。本场音乐会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了全球同步直播，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1987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李莹校友应邀主

持了音乐会。

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代表学校致辞。吴校长指出，北京大学校友音乐会自2010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今年更是增加了新的亮点，一是增加了校友和母校的互动环节，校友可以手写祝福在线上传递问候；二是增加了现场直播环节，海内外校友都可以收看此次音乐会。最后吴校长对参与捐赠、推动学校美育教育的校友们、对关注本次活动的校友们、对远道而来的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国家模范交响乐团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随后，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北大校友会副会长蔡武、彭兴业、高超为1979级历史学系校友刘雪枫、1987级东方语言文学系校友李莹、1986级社会学系校友吴新芳以及2011级国发院EMBA校友朱晖等支持音乐会的校友企业代表颁发了感谢奖杯。

北大校友会秘书长、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李宇宁代表北大校友会接受了北大校友书画协会献上的书法作品贺礼。北大校友爱乐俱乐部会长、著名音乐评论家刘雪枫校友为现场听众作了精彩的导聆。



本次音乐会由北京大学博雅艺术发展基金提供支持。音乐会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万石画艺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校友“博雅艺趣”微信

群、“八四群英会”微信群、“七七八八未名湖”微信群、北京塞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校友企业和群体的大力支持。

2016年北京大学校友会备案组织达114个

2016年北京大学校友会新增备案校友组织4个，其中院系校友组织3个，海外校友组织1个。它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友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校友会和北京大学缅甸校友会。

截至目前，北京大学校友会共有备案校友组织114个。其中院系校友组织25个，地方校友组织（含港澳台地区）49个，海外校友组织27个，行业类校友组织9个，兴趣爱好类校友组织4个。

同时，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处积极支持和鼓励各地备案校友组织在属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北京大学云南校友会、北京大学贵州校友会分别在2016年完成了登记注册。

2016年也是备案校友组织的换届大年，海内外有河南、鞍山、山东、江西、广西、厦门、海南、珠海、台湾、新疆、新英格兰、休斯顿、蒙特利尔、全英、悉尼、新加坡等地20余个校友组织顺利完成了组织换届工作。



回馈母校

我给母校发红包，北大明天更美好



2016年北京大学校友会策划了校庆日和毕业季的“微信红包”捐赠活动，得到了广大校友、毕业生和北大之友的积极响应。

5月4日，北大迎来了第118个生日，“红包君”横空出世，携带着对母校的生日祝福，从燕园发出。短短24小时内，近万名校友和北大之友，用行动感恩母校，总计发出19万份红包；超8万人关注了本次活动。

7月毕业季，北京大学校友会在校庆红包的基础上，又组织了“2016届捐起来”的活动。在活动预热期间，“微信红包”针对在校生的特点，详细介绍了校友基金的历史、用途和管理方式，并设置了捐赠用途投票环节，广泛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参与微信捐赠的毕业生还可得到自动生成的专属微信纪念徽章，

7月5至6日，当“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唱响在邱德拔体育馆时，场外捐赠活动的气氛比天气还要热。毕业生们顶着炎炎烈日，使用微信或现金等捐赠方式，表达对母校的祝福。截止到7月8日，“2016届捐起来”共收到1248人次26558.20元捐赠款。

发红包为母校捐赠，在国内各高校尚属首次，北大人又一次引领潮流。校友企业北京无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小小红包汇聚你我他的情愫，更好的北大，与我们一同成长！

捐赠说明

本活动捐赠金额及名单将会在北京大学校友网上公示。所有善款注入北京大学校友基金——“我爱母校”项目。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统一管理。

“我爱母校”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于2003年校庆期间启动，每年捐赠与母校建校周年数相等的人民币数额，用于致敬恩师、奖助学金、爱心救助、各类校友活动等用途。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基金章程及相关规定，报基金管委会审批并送基金会备案。



“我爱母校”项目捐赠名单

（单位：人民币元）

23.5636万元	马耀徽	邱曙熙	阙祖传	丁 琰
“发红包” 6826人	500元以下	纪亚木	张义燊	王亚军
22.77万元	蔡子楚	曾寿清	张 越	孟令辰
“中银北大卡” 9027人	陶大江	杨孔庆	刘 皓	阎凤桥
2.7849万元	王宜峨	洪成得	贺 岩	张 闯
2016届毕业生等1438人	赵匡为	苏季蒨	姚树发	廖观荣
1000-5000元	张茂清	陈立柱	杨 帆	赵哲伟
刘艺兵	赵泽五	张 熙	翟荣凯	许璿文
顾 清	段宝林	刘 钰	戚斯昕	左以文
张遵修	谭明祥	宋 佛	陈如宏	许志俭
广东北达经贸专修学院	高清会	张兰馨	冯海涛	马德程
胡明晓	张友图	黄莺英	葛俊明	苏金鐸
孙应帅	吴思齐	李 莉	胡连伍	陈宏铭
盛殿魁	李稳信	俞庆水	朱明明	黄秀桂
于 京	陈子明	刘显生	李 锋	陈界明
马晓霞	李 超	白彦飞	郑育东	翁凯立
许爱东	何文学	郑郁钊	廖小泉	郎志仁
俞辰初	曾享麟	檀雪菲	陈云帆	林佳颖
李平安	王宜峨	苏洪钧	易卫卫	支黛妮
500-1000元	张道坤	陈著峰	李文涛	林志哲
孙 燕	李荣慧	陈兆龙	邢全宁	赵秀英
马晓松	丁 毅	蒋邦本	章 钰	王焕中
李中政	龚荣仙	吴康铭	沈继年	庄鸿铸
李玉萍	郑昌学	杨庆曾	金启宏	胡晓兰
陈 蕾	石自光	楼开炤	宇 博	陈 纯
潘 峰	曹 翀	王 喆	李 波	俞庆水
李怀林	张艳艳	许文青	赵京慰	李 赫
胡乾尧	魏庆鼎	刘显生	陈著峰	鲍 铭
邹 燕	姜贺琳	陈 凌	李 柱	徐建硕
王 宇	周远明	马丽云	钱晓江	吴泽文
刘光辉	王志东	黄闻新	程红富	任光远
李平安	牟显福	杜晓明	林宏海	蔡丽珠
刘祁涛	李振群	王 宇	徐人仲	胡 菠



胡继瑗	马丽云	陈祎玮	韩恒湘	张冲威
李树恬	张 晴	陈 亮	刘瑞珣	韩文秀
陈秋农	杨庆雪	何欣若	李 颖	徐慧琴
崔学恒	王俯民	张淑英	康海群	钱时毅
王 励	蒋兴仁	宋建国	丁雅秋	唐 云
宋 煜	罗先汉	刘 慧	陈惟某	郑保勤
周胜明	黄有兴	孙亦丽	王守信	韩学林
郑 昊	柳 哲	刘淑琴	万沪生	韩元秀
王文海	胡晓宇	贾 某	王良邦	宋学敏
飞 雁	戴甚彦	张兰馨	李宝源	黄莺英
杜 琳	何自成	马金石	郭嘉耀	杨联康
姚鲁南	谢荣世	顾开道	佟天池	王文贵
汪荷青	李若峤	王致瑜	陈宝华	苑东许
王俯民	谢玉兰	朱广廉	宋学信	米晓雨
许秋云	张 翼	许定科	孟某峰	李舒群
李晓玲	卞东江	谢炳贤	袁 刚	

小舍大家宿舍文化基金捐赠名单

520—2003元	巴 赫	范斯腾
贺 晟	徐丹丹	薛 胜
杨东杰	120元及以下	孙 鹏
田 强	李嘉祈	管晓宁
刘 畅	余嘉鹏	段利久
孙铭徽	侯 枕	姜晓刚
500元	黄斌熙	关智华
解 华	张 翎	吕国富
董 峰	赵天翼	
李玉萍	陈思丹	
陈十一	柴宏博	
燕 翔	赵 楠	
张 菁	张 勇	
汪 波	李金生	
施 燕	郑 雯	
刘曦励	张 冉	

“北大人”项目捐赠名单

1000—1500元	姜瑞生
周云汉	胡乾尧
苏双碧	庄鸿铸
王宏志	王焕中
200—500元	江丕桓
李本善	吴奎罡
孙建民	张 明
100元及以下	
张明惠	
徐纪贵	
吕震亚	
林开铭	
吴宝华	
翟荣凯	
朱聘儒	
吴奎罡	

博雅艺术发展基金捐赠名单

5万元	莫达勇	张亚南	林 琳	郭九苓
北京盈之宝	王太力	张美贤	林雪梅	黄家强
百利生葡萄酒业	马 豫	庄武英	刘雯婷	刘 纲
音乐之友	李怀胜	李 志	曹志宇	孙 浩
布丁酒店	张 伟	陈 谷	赵挹彬	王进杰
1万—4万元	朱明明	钟 洋	张建平	袁荣昌
刘语眉、施坚	张庆天	陈益勇	周燕军	孙 焘
卢绍强	刘学红	郑姣姣	董生辉	陈小英
“七七八八未名湖”微信群	李发顿	杨 壮	500元及以下	苏冠蓉
1000元	陈 欣	张向英	王耀寰	杨 莉
叶朝云	万格格	刘文韬	胡建江	杨 书
陈愉生	彭 艳	蔡海珍	李 玲	胡姁霞
刘军霞	王岳龙	邹洪波	徐晓博	刘 彦
杨 健	张 莉	王依群	张召堂	吴 鹰
苏 丹	罗 敏	梁建宏	周学农	陈 华
滕德京	张亚莉	傅珊珊	吴志攀	冀 业
丁晓诚	翟静宜	王 亮	杨 锐	颜学庆
李 希	童智敏	袁 娅	刘海林	操 云
陈 越	张世强	关 键	叶 征	黄 英
娄 健	任大岭	陶 红	杨 光	刘 歧
曾 永	宋 芳	许晓英	陈汝君	罗 雄
王旺桂	张雯婷	何 薇	邵冰寒	王 玮
崔志平	于彤舟	刘金志	陈 博	
柳 茵	方 琳	张树宇	张历宁	

九一基金捐赠名单

30万元	北京营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祝志军	刘国鹏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张 熙	Ning Yan	于晓凤
1万—3万元	黄 飒	王雪松	蔡明阳
孙 川	刘玉发、刘学玲	1991元及以下	蔡港树
许 庆	孙玉冰、张智霞	费 斌	陈 林
刁卫方	Xing Jianhua	郭殿升	林木木
1992—7000元	金 剑	李 樱	许家移
李云香	许 岗	霍 娜	陆 昱
生科杨鲜梅等校友	黄黎明	李 勤	陈 洁

Julia Tung	朱丹阳	周 烽	吴德全
Song Qian	朱向炜	赵以宝	王文彦
Yu Jinsong	程雪松	赵树彬	孙秀丽
Zhao Lu	黄慧靖	张 勇	严优、杨晨
Zhang Lizhao	蔡 艳	尹毅宁	石青山
Gao Wenlian	江 岑	杨红菊	刘贺飞
Wang Bingling	尹 力	杨国胜	刘海涛
刘 红	熊 英	金 剑	张 浩
Xia Qianghua	胡海昕	蒋晓峰	闫志梅
Chen Xiaofang	曹 飞	韦长江	陈 雷
张小四	陈 刚	文艺璇	钟吉鹏
Xia Li	李光辉	童朝伍	李春晖
刘 俊	陈 旻	唐远贵	高 翔
董 逊	李彩练	杨 青	林 灏
陈冬雪	金立鸿	宋铁维	薛志强
张 强	李海红	沈培盛	王祝兰
Jiao Hua	生玉海	齐东祥	尚俊杰
孙银娥	赵 岩	程 颖	李 若
郑国珍	胡 俊	黄 英	计 凌
刘晓荣、苍建华	熊 怡	张久珍	段春卉
Yang Sixian	陈旭盛	张春波	王 宁
Li Junfei	程汝刚	秦 璐	深圳市承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姜 华	党书国	刘宇晖	赖江临
陈良友	李 丰	武欣中	邹 惠
宓民洪	韩会永	林宇生	张宇东
Chen Xiaonan	刘 慧	孙军荣	王太力
王 芳	王 耀	胡 静	唐贾军
孙智利	范文奇	方 辉	连 伟
刘 勇	阎志涛	马正勇	鞠玉翠
刘永翊	康晓蕾	程文浩	金赛男
李 炜	万基虎	刘宏举	王筱迎
李宇宁	孙胜权	周广辉	童自明
李志宏	赵豫虎	张锦姬	刘 兵
殷雪松	李洪波、向农	于泳胜	董云飞
张西峰	黄秀梅	杨云高	张晓东
梁会军	何聪纯	徐晓东	张国梁
李 琳	冯向前	徐 涛	叶章淦
王 珏	朱能武	熊志超	杨蔚颖

王 飞	蒋大志	王素蓉	刘晓丹	左起祥
沈百玲	黄磊东	王 晖	刘继峰	裘 强
马剑辉	何瑾辉	孙易安	李光昱	扈晓丽
刘志波	郝春雷	孙 健	韩圣龙	张 锐
刘 君	陈炜喆	刘向武	谷 棣	张建生
林 震	陈 君	刘静波	方 琳	王 青
胡韶华	陈 刚	林 巨	董跃辉	胡海岚
丁 伟	陈垂锋	孔祥劼	单小虎	杨慧燕、李纯强
丁 宁	陈 晨	姜永红	陈金荣	邵 峰
党淑平	周跃勇	贾红辉	陈 江	邵维超
陈建洪	赵 锋	黄传军	周 濂	邱文生
张杏超	陈 东	胡 彬	张长春	张 某
叶良新	赵 冰	何富强	谢 超	李向锋
晏为力	张治坤	郝建奎	王小迪	贺 锋
廖洪恩	于 静	邓嘉伟	任信荣	冯 欣
李骁军	尹春莓	程永红	回 颖	曹红蓓
李 克	邢观斌	陈 烨	洪 阳	洪 强
李剑东	魏中鹏	陈 鹏	何军立	夏咏秋
邹金明	未 名	曹亚利	朱 磊	崔文生
朱立明	刘 岩	叶丽榕	易 芳	刘 莉
朱海波	贾 波	刘 宁	孙培宁	李 平
钟 华	付广义	李京徽	梁 冰	李 倩
赵兴国	陈学文	季清辉	李义军	Zhou Tianyuan
杨智良	朱永杰	何 菁	焦杰英	许 岗
庞姬桦	赵丽君	别立谦	张伟强	孙金永
卢 琼	张亦萌	杨志涛	王 辉	姚志鹏
刘 磊	张金宏	徐智和	欧玉晖	
刘春滨	张红英	吴 蓓	罗晃浩	
李 勤	巫忠泽	秦 海	蒋云峰	
净 观	王银英	刘晓华	白利君	

说明：

本期捐赠名单大致涵盖从2016年1月至12月校友工作办公室统计到的数据，捐赠金额刊登在校友网上。

由于捐赠入账以及数字统计受学校财务工作周期的影响，以及杂志的排版、印刷、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而有部分已经进行了捐赠的校友（或单位）名单有可能没有刊登在当期杂志内，但下一期杂志仍会进行刊登。

感谢亲爱的校友们对母校事业的大力支持！

公告栏

“我爱母校”年度捐赠项目



母校，是我们共同的牵挂。当我们从燕园走过，我们的一生都会萦绕着未名博雅的故事。2018年，母校建校120周年，北大努力率先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百年梦想，这也是每位校友的梦想，也更加离不开校友的帮助。

“我爱母校”校友年度捐资，每年捐赠与母校建校周年数相等的人民币款额（2016年118元、2017年119元……），主要用于致敬恩师、奖励学金、爱心救助、各类校友活动等用途，所有捐款将注入北京大学校友基金统一管理。参加捐赠，您将得到一枚精美的捐赠纪念章及相关纪念品。纪念章虽小，却寄托着美好的北大记忆，也记载着您对母校的深情回报。博雅塔高，未名水长。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你我共同的光荣与梦想。

小舍大家宿舍文化发展基金



老宿舍楼的一砖一瓦，附近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太多的燕园故事，浓缩了太多的北大情怀。北京大学校友会与基建工程部、基金会、标识办、公寓服务中心共同启动了北京大学“爱归燕园，砖注奉献”项目，精心策划、制作了“老楼之砖”系列纪念品，纪念砖来自您本人居住过的宿舍楼，它们曾经听着您的欢声笑语，感染着您的喜悦和悲伤。通过“捐款赠砖”的方式，每一个对老楼饱含深情的你、我、他，都可以直接参与新楼建设，成为新楼的“主人”。以砖为媒，我们可以与未曾谋面、却共享“北大人”身份的师弟师妹们联结在一起，纪念老楼情怀、传递宿舍文化、回馈母校、助力新一代北大人的成长。

博雅艺术发展基金

丰盈校园艺术，陶冶师生情操
共创一流大学的一流艺术氛围

基金用途

- 资助每年两场北大品牌系列音乐会（五四和新生音乐会）
- 邀请知名文艺团体，举办年度文化艺术类演出活动
- 在校园内推广经典艺术，举办艺术讲座沙龙
- 丰富在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 支持校园原创文化艺术发展和学生品牌文化活动



鸣谢方式

- 捐赠校友名单将在校友网或《北大人》杂志上公布
 邮寄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开具的免税收据
- 赠送纪念品和《北大人》杂志
- 定期推送校园讲座和演出信息
- 组织参与主题沙龙活动
- 邀请参加母校重大活动等
 （详见北京大学校友网捐赠栏目）

微信捐赠

扫描下图二维码，输入捐赠信息进行捐赠。如需捐赠发票，请在附言里说明。



我爱母校



宿舍文化基金



博雅艺术发展基金

其他捐赠方式请参阅北京大学校友网 <http://www.pku.org.cn>

校友服务

校友卡



凭卡可出入校门；进入校图书馆阅览一般图书；优惠使用学校体育设施；免费参观校史馆；在北大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书店购书享受VIP优惠待遇等。校友卡办理事宜请参见北大校友网 (<http://www.pku.org.cn>) 和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服务号。

中银北大卡



中银北大卡是北京大学与中国银行联合发行的集身份标识、信用消费、回馈母校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双币种校友专属信用卡，详情请查询北大校友网和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服务号。

中银北大白金卡



中银北大白金卡是北京大学与中国银行联合推出的升级版银联信用卡，持卡可享受银行金融服务功能、出入校门和图书馆、优惠购书和礼品等增值服务，详情请查询校友网和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服务号。

校友聚焦



《校友聚焦》是北京大学校友网的新闻资讯类电子期刊。每期为您精选北大、特别是北大校友近期的新闻资讯、采访实录、活动报道，并通过邮件的方式，把制作精美的页面推送给您，让您及时知晓北大及北大校友的最新动态。订阅方式请在北京大学校友网 (<http://www.pku.org.cn/>) “校友聚焦”栏目查询。



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处

校友邮箱



为广大校友提供性能稳定、容量2G的免费邮箱，校友可到北大校友网申请使用。

北大校友网 <http://www.pku.org.cn>



为校友、在校师生及所有关心北大发展的人提供与北大相关的讯息及强大的互动交流平台。

校友刊物



《北大人》和《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使校友及时了解母校的近况及发展。主要以校友赞助赠阅的方式，发行范围遍布海内外。北大校友网同步刊登《北大人》网络版。

北大校友企业服务联盟



“北京大学校友企业服务联盟”利用北京大学校友网络平台，由校友企业、北大校友共同参与，整合校友企业资源，校友企业向校友提供产品优惠或专属服务，校友网络平台向校友做活动推广，校友享受优惠并可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点评及分享传播，三方共同形成良好互动，形成互惠互助、健康文明的校友生态圈。

欢迎关注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服务号，注册燕缘会员，参与服务联盟。

感谢校友多年来对母校的关爱和支持！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将竭诚为您提供更加多元和便捷的服务。

地址：北京大学43号楼225室
电话：86-10-62758419
传真：86-10-62763363
邮箱：pkuaaa@pku.org.cn
网址：<http://www.pku.org.cn>



北京大学校友会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大学校友会官方微信服务号